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7

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国防大学 2 060 1171 4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邢济萍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清华大学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50 千字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7000 册

---

ISBN 7-80023-537-8/K·515

定 价:4.50 元

# 目 录

## 文 献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问题的指示…………… (5)  
中财委关于全国进出口会议的报告…………… (6)  
新中国外贸方针的制定 …………… 之 恺 (9)

## 回 忆 录

- 我当牺盟会特派员的回忆…………… 曹 诚 (34)  
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 段伯宇 (48)  
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回忆…………… 楚图南 (77)

## 人 物 介 绍

- 叶剑英的革命诗篇创作…………… 张廷栋 (96)  
延安整风前后的张闻天 …………… 程中原 (114)



## 专题资料

###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

..... 许翰如 仲秋元 梁泽楚 (148)

###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组建新四军

中的特殊历史作用 ..... 贺琦 洪建军 (185)

争取昆明起义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3)

## 会议介绍

1958年北戴河会议 ..... 韩钢 (206)

## 史实订正

### 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部分史实

的订正 ..... 郭述申 刘震 刘华清 陈先瑞 (240)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

(1949年2月16日)

由于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都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我们与世界上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未建立这种外交关系以前的对外贸易，自然只是一种临时性质的贸易关系。这种临时性质的贸易关系，只要不违背对我有利及严格保持我国家主权独立并由政府严格管制等原则，是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的。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决定：

(一) 向华北人民政府提议：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在山东及其他地区是否需要设立对外贸易局，应根据情况在中央批准后设立。

(二) 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目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害或害处不大的某些贸易，应该在国家管制之下允许私人经营。所有私人经营出口及进口贸易者，除开照章报关纳税外，须事先将出口或进口货物的种类数量等报告对外贸易局，并经对外贸易

局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方得进口或出口。在本条以法律形式公布后，所有未经对外贸易局许可之货物，均不得进口或出口，私自出口或进口者，以走私论处。

(三) 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该允许那些愿意和新中国进行贸易并愿意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外国的商业机关派遣代表或指定其代理人来和我方接洽，并允许这些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设立办事处。至于外国政府派来之商务代表，暂时还不应接待。国民党目前统治地区的商业机关向我派遣之代表，亦应加以接洽。

(四) 所有由外国商业机关派来之代表，暂时经由地方政府外侨事务处证明介绍，归对外贸易局接洽。在审查这些代表的可靠性之后对外贸易局即可与这些代表分别讨论双方的货物交换及有关贸易的各项事宜，并了解各国和我进行贸易的范围、种类、数量和条件等，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可能和需要，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分别地订立货物交换的合同。这种合同在签字之前，一律须经中央批准。所有在新中国境内的公共机关及私人机关须从外国购买货物或向外国出卖货物者，均须报告对外贸易局，由对外贸易局代为接洽，或由对外贸易局介绍他们与外国代表接洽。但一切公私机关与外国商业机关订立之贸易合同，均须经过对外贸易局之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五) 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局得向外国派遣商务代表并在外国设立商务机关。新中国的公私商业机关须向外国派遣代表者，须经对外贸易局之允许和推荐，由

地方政府签发出国护照。

(六)对外贸易局在了解对外贸易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以后，须制定适当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计划，送交中央审查批准。在这种政策和计划上，应该确定：1、允许进口，高税进口及禁止进口之货物的项目；2、允许出口，高税出口及禁止出口之货物的项目；3、出口和进口货物之临时税率表；4、根据出口与进口之可能和需要，向国内生产机关和贸易机关提出要求和建议；5、根据出口进口和外汇的情况及国内经济上的需要，提出出口和进口的计划，并决定和哪些国家的商业机关进行哪些贸易的计划。

(七)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必须宣布中外船只进口，沿海沿江中外船只停泊及其卸货装货的办法，码头租借使用的办法，海关报关纳税及检查的办法，管理外汇及结汇的办法，以及违反这些办法和走私漏税的处罚办法等。对外贸易局必须立即研究过去的这些办法并准备加以修改或改订，由人民政府宣布。并须立即研究过去出口和进口货物的税率表，准备加以改订后宣布。在人民政府尚未宣布这些办法前，过去的办法可以暂时沿用。

(八)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和某些通商的外国口岸，建立邮电关系。华北局应即研究过去与外国通邮通电的办法，并在可能条件下建立这种邮电关系。对于外国商务人员的入境和出境及在新中国境内有关地区进行业务活动的临时办法，华北人民政府外国侨民事务管理处亦须从速制订和宣布。



(九) 为了进行对外贸易所需之外汇，规定汇率及进行结汇、押汇和买卖外汇等业务，应由国家银行经理。其他银行不得经营外汇及买卖外汇。对外贸易局应即研究过去管理外汇的办法加以修改后，由人民政府宣布新的外汇管理办法。

(十) 进口货物在国内市场上推销时，须遵守人民政府之法令。私人进口之货物，对外贸易局有优先购买之权。对外贸易局对出口商人及任何公私机关在国内市场上收买出口货物时，应加以密切注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可能的和必要的指导和限制，以便保护与发展国内的生产。

(十一) 为了争取出口，发展经济，各地政府必须立即注意提高某些重要物资的生产。例如棉花、大豆、煤、盐、花生、烟叶、蚕丝、猪鬃、皮毛及某些可以出口的手工业品和工业品。各地对外贸易局、内地贸易局、银行、合作社等，必须在春季发放贷款时，用足以刺激这些物资生产的适当的比价，向农民及生产者预购这些物资，以便能够提高这些物资的生产，并便利在收获时的收集，用作自己工业生产上的原料，或争取出口。

(十二) 经天津及秦皇岛等海口对国民党目前统治地区的贸易，亦得依照上述各项规定在对外贸易局管理之下进行。

(十三) 华北局及天津、北平两市委对于这个指示的意见及执行办法，望即电告。平津两市外事机关应集中注意研究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各种问题。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问题的指示

(1949年2月16日)

华北局，彭真、叶剑英、黄克诚、黄敬并林彪、罗荣桓并告东北局：

(一) 兹将二月十六日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真、叶剑英、黄克诚、黄敬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你们接洽的情况望随时电告。

(二) 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

# 中财委关于全国进出口会议的报告

(1950年8月7日)

毛主席、中央、各分局、各中央局转各财委，各军区，各野战军转各后勤部：

兹将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如下：

此次会议主要目的，为调整进出口贸易中的公私关系问题。到会的有私商代表四十六人，依其经营业务能力共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规模较大资金大部在国外的进出口商，他们在国外有分店，业务专门范围广泛，历史悠久。第二类，一般进出口商，在国内营业较久，资金大，有相当的国外关系。第三类，小进出口商，在国外无特殊关系，亦无固定的专业，经营范围小。会前私商代表对自己的经营前途一般是怀疑的。其原因除了对我之政策认识不清外，还由于我过去在批汇上抓得紧，合同条件严，价格和汇价政策掌握的亦不够妥当。国营贸易机关个别地方有抢夺私商国外关系，不守信用，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因此许多私商虽有经营的能力和资金但心存观望。

私商对我们的专业公司、贸易管理机构、银行、海关、税务机关提出不少意见，其中大部分意见是对的值得我们检讨和改进的，其中有关经营范围，分配外汇，和私商组

织等大问题在会议中都得到适当解决。

(一) 公私经营范围的划分问题：

国家除办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方面，准备对几种主要出口物资经营其中的一部分。在进口方面除经营国家所需要的工业器材和军用器材外，对民用器材的经营，以能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出入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在国家经营的部分中，还可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代销。

(二) 出进口商组织起来的问题：

为克服私营出进口商盲目竞争的现象，便于在国营贸易领导下，步调一致，恢复和开展国际市场，争取及时进口重要物资，贯彻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并做到分工合作起见，决定采用“国际贸易研究会”，“同业公会专业小组”，“联合经营”三种形式，按照各地不同情况自行组织起来。

(三) 进出口商申请外汇问题：

凡已登记的进口商，和私营工厂得申请外汇，办理进口。各地外贸局，应视市场和生产的需要，予以批给。但私营工厂购入物品，不能转售。进口商必须将进口货品销售情况，按月报告公会，汇转外贸局，以便对进口物品进行管理。

(四) 公私营订立出进口合同问题：

公私双方：均须忠实执行合同，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外，均应负赔偿对方损失的责任。遇有纠纷时，可按合同进行



协商、仲裁，以至向法院控诉解决。

大会经过反复讨论，公私双方达到一致的认识，即单靠国营或单靠私营，都不能完全担负起我国出进口贸易的全部责任，必须把私商组织起来，在国营领导下，步调一致地，来恢复和开展国际市场。会议批评了个别干部“顾公不顾私”或把公私兼顾只看做是“为了照顾而照顾”的错误思想。也批评了私商中某些不顾生产和物价，单纯营利，盲目竞争，和投机取巧的不法行为。

有两个问题大会未作结论，准备在中央批准后，再作最后决定：

(一) 易货问题：

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和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

(二) 中南区公私双方一致要求，允许汉口开放问题。从目前我们自己航运设备能力有限，而汉口外销物资又很多（主要是桐油、蛋品）的情况来说，允许有油柜和冷藏设备的外轮，在经过特许，指定时间，指定航线，和严密监督管理下，到汉口装货，直放国外，是有利的。在主权上，也说得过去。

上述两问题可否？请中央批示。

# 新中国外贸方针的制定

之 愷

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就对外贸易问题制定了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实施国家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并针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及时调整了贸易方向，在坚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贸易往来的同时，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这些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今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热潮中，重温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做到昔为今用，有助于我们把当前的改革开放工作做得更好。

## 一、平等互利通商原则的提出

为了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的斗争就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进步人士和组织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援。不仅如此，解放区也努力与国外建立通商关系，并希望进行各种经济合作。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进行了多

次谈话，提出了希望中美两国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思想。他说：“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sup>①</sup>。但是，这一希望长期没有实现。1948年3月10日伦敦方面曾表示考虑派林迈可来解放区，代表英国建立关系，贸易部长威尔逊和粮食部长斯特拉齐也考虑与解放区建立贸易关系。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于3月31日通过当时在香港的乔冠华，对英国政府的通商意愿表示欢迎。同年5月，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已经就外汇管理、对外贸易管理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系统的阐述。

1949年初，由于天津及其它重要海洋口岸的解放，许多外国商业机构要求和解放区开展贸易。于是，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16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政府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只是一种临时性质的贸易关系。中共中央指出：“这种临时性质的贸易关系，只要不违背对我有利及严格保持我国家主权独立并由政府严格管制等原则，是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的”。中央对于对外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给

---

<sup>①</sup> 《毛泽东思想论坛》1990年第1期。

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中共中央向华北人民政府提议，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并准备在山东及其它地区设立类似机构。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规定：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国家目前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害或害处不大的某些贸易，应该在国家管制之下允许私人经营；对外贸易局应就商品进出口、海关、外汇等管理，制定适当的政策和计划；为了争取出口，发展经济，各地政府必须立即注意提高某些重要物资的产量。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3月15日颁布了《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针对对外贸易的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了对进出口商的管理制度和进出口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度。接着，华东解放区也颁布了《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贸易券的使用办法以及对进出口货物分类管理的详细名表。

由于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人民政府的及时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的对外贸易即已恢复。就天津、上海、青岛三个海关的情形来看：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2月中旬天津即恢复对外贸易，从3月至6月，海关税收数额逐月增加；7、8两月由于季临淡月，加以海运有阻，外贸数字减少；8月中旬长山岛解放，9月以后贸易进展显著，税收激增。上海自1949年5月25日解放后，



因港口遭国民党军队封锁，海运停滞，对外贸易受阻，海关税收不如以往多，但全年收税仍达人民币 327.36 亿元（旧币）。青岛自 1949 年 6 月 2 日解放后，人民政府于 6 月 15 日宣布其为对外贸易开放港口，并鉴于与其它国家尚未建立外汇关系，采取“以货易货”方式进行贸易，但由于港口船只被国民党军队劫持，一般商人由于不明了政府的政策而犹豫不前，至 7 月份航运与海关税收尚无大起色。8 月中旬长山岛解放，海运畅通，一般商人对政府的政策逐渐了解，对外贸易突转频繁。由于上海港被封锁，青岛成为华东重要的吞吐港，沪商所订购洋货多改由这里输入，而且由于津沪两地都同时实行结汇办法，青岛仍沿用“易货”方式，津沪商人纷纷来青岛经营进出口贸易，所以贸易额逐步增加，到 12 月，进出口关税呈空前旺盛的状态。1949 年各海关解放后的关税收入情况反映出了人民政府接管后对外贸易是正常发展的。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在建国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就明确地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内外交流，互通有无，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定了下来。

1949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发回的电报指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

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sup>①</sup>。这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通商的愿望。

## 二、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内外交流

### （一）近代中国两种性质、前途的对外方针

中国是一个有着对外开放思想传统的文明古国。除了1840年以前，清王朝出于防御和维护自身统治，一度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对外开放的思想和主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封闭性的。

16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科学发生了飞跃。这改变了以往中国经济、文化居于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是在社会经济文化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下同西方交往的，是在西方国家不断侵略扩张，而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下同西方扩大接触的。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成为中国独立自强、跻身于世界之林的必要条件。这使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直至中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开放主义”的响亮口号。先进的中国人呼吁开放，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不容许富饶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开放已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近代的开放问题失却了古朴交流的单纯积极有利作用，呈现出两种性质，展现出两种前途。一种是殖民地式的开放。这是按照帝国主义者意志实行的开放，使中国的海关被外国侵略势力所把持，中国的内河一任外国军舰游弋，中国的通商大埠划隔出帝国主义统治的租界，外国人在华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使中国日益丧失主权，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另一种是独立自主的开放。这种开放以保持中国的主权为前提，由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主动地进行。其中包括平等互利的贸易，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中国行政和法律的管辖下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经营谋利等。这是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开放。这种开放才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条件。

近代中国 100 年来，这两种对外开放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的卖国者，竭力要使中国按着殖民地化的道路“开放”下去；而中国的爱国者则大声疾呼、前赴后继地反对这种殖民地式的开放，争取实现独立自主的开放。孙中山主张：实行开放主义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以获“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之短”，尤其以不损害中国主权为前提；认为“发展之权，操

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他的这些真知灼见，把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并且要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动手实践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为此，共和国政府首先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

## （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对外经济贸易既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中国反对“禁运”、“封锁”的外贸斗争是同外交战线反对美国孤立中国的阴谋相辅相成的。因此，探讨对外贸易方针的制定需简要回顾一下当时中国的外交原则及其实施概况。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30日即宣布愿意考虑同各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接着，毛泽东于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sup>①</sup>。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54条集中概括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則：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0页。



“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sup>①</sup>。这些原则规定及其实施，既体现了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贯彻独立自主精神，又反映了中国打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意愿。

有鉴于建国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当时中国将发展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出于对新中国如何获得国际承认和援助问题的考虑，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了“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周恩来在建国前夕强调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立场”，“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sup>②</sup>。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排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9日明确地提出了两条

---

① 1949年12月2日《人民日报》。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322页。

原则，即：第一，这些国家必须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第二，要通过一定的谈判手续来确定建立外交关系<sup>①</sup>。这一重要的外交方针又称为“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曾通过前美国驻北京领事馆正式照会美国，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sup>②</sup>。美国却一度对新中国采取怀疑观望态度。1949年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当局，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不但自己不承认新中国，还策动别的国家同美国保持所谓“共同行动”。1949年5月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即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向驻在国外交部强调：“任何主动承认（中国）的行为或者发表官方言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谋取承认的行动表示欢迎，都是有害的”；“有关西方大国对此应保持统一的阵线”<sup>③</sup>。但是，美国政府孤立新中国的企图并没有得逞。

中国首先同苏联、东欧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苏联第一个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了同国民党当局“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欢迎建交并互派大使。10月27日，新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中国建交。其后的1

---

① 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② 参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1期。

③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7页。

个月内，同中国建交的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阿尔巴尼亚。1950年1月18日，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中国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紧接着上述国家正式承认了新中国。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先后有缅甸、印度、锡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承认了新中国，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巴基斯坦也于1951年5月21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西欧、北欧一些同中国有经济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与我国较早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5月至10月，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均与中国建交。英国于1950年1月9日承认了新中国，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承认中国最早的一个。1950年4月4日荷兰也承认了新中国。但是与英、荷的建交问题当时均未解决。

到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时，中国已与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有25个国家公开承认了中国。

在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还在国内肃清帝国主义的特权，并注意妥善对待外国在华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在当时被称

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的同时，新中国还实行了一些保护国家主权、杜绝帝国主义特权的措施。如加强海关管理，颁布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办法；停止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又无优惠协议的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的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规定外侨户籍管理办法和外国侨民旅行和申请入境、出境办法，对于无外交关系的前外国驻华外交人员作为外国侨民看待等等。

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新中国妥善对待外国在华企业。解放初全国共有外资企业 1333 户，其中进出口业 500 多户，其它商业 324 户，工业 143 户，职工共计 12 万余人，资产 12.32 亿元。这些企业不同于帝国主义特权，但大部分是这种特权下的产物，有的甚至是这种特权的载体。新中国在取消它们的特权后，允许它们在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营业<sup>①</sup>，《共同纲领》规定了守法外侨得到政府保护，外国从业人员只要遵守中国政府法令，均受到政府保护的条款。

综上所述，新中国所制定和贯彻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既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完整的正确立场，又

---

<sup>①</sup> 1950 年，美国政府无理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相应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从此在华美商全部停业。其它洋商在 1951 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部禁运后，大都陷于瘫痪状态，陆续放弃经营、申请歇业或作价转让给中国政府。1950 年中国境内有洋商 540 多家，进出口额占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进出口总额的 6.52%；到 1955 年底，只剩下 28 家，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仅占 0.005%。



体现了发展与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联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的开放方针和服务于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总目标。这也是新中国制定对外贸易方针的基础。

### 三、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

5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系，相应地对外贸易实行国家管制，这与单一公有制成分下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统制有所不同。直至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独立国家都不放松对外贸的国家管制。但管制的性质、方式、范围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国家管制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保障其商品在国内外的竞争能力，获取高额利润；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贸易管制主要是为了反对外国资本对本国市场的控制，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以独立自主地发展国民经济。我国能够行使国家主权，自主地管制对外贸易，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首先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体系，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管制全国对外贸易的法令和法规，并制订了有关的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1949

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贸易部，内设国外贸易司。同时，在贸易部统一领导下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1950年，贸易部在国外贸易司下设立了经营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口公司，经营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以及中国畜产、油脂、茶叶、蚕丝、矿产等国营外贸公司。这些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全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逐步统一经营对资本主义市场重要物资的进出口业务。1950年国营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1952年上升到92.8%。国家对外贸易部门会同海关等有关部门，采取商品分类管理、进出口许可证、外贸企业审批、外汇管制、出口限价、保护关税、货运监管、查禁走私、商品检验等行政管理措施，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并逐步加强计划管理，把全国对外贸易活动置于国家集中领导、统一管理之下。在此基础上，实行“进严出宽”的保护贸易政策。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主任陈云强调：“进口什么东西，要严加管制；出口的东西要放宽尺度，凡是能够出去的东西，不管鸡毛蒜皮都可以出。这样我们就主动了”<sup>①</sup>。同时，国家注意立足于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建国初期我国面临进口需求殷切而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对外贸易管理部门和各国营对外贸易管理公司，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把恢复和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作

---

<sup>①</sup> 《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为首要任务，协助重点生产单位解决困难，改进收购方式，便利和支持生产，通过增加出口货源，提高产品质量，逐渐改变出口商品的构成，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归纳起来，当时管理对外贸易的目的和方法，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保护和发展国内工业，依此制定税则、税目、税率，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许可制度，改变全国解放以前以输入非必需品和消费品为主的状况。1950年工业装备、工业原料及交通器材的进口已占总进口的第一位。在对苏贸易上主要是换入工厂装备及原料和交通器材等，日用品（主要是煤油和白糖）仅占从苏联换入货物总值的3.1%。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如对捷克和波兰的贸易，工厂装备和工业原料占80%，轻工业品占20%。这就是说，中国国内能自足自给的，就不进口。

2、用各种办法增加出口同时也按需要增加入口。“奖出限入”不是单纯地争取出超，而是争取大量的输出和输入。

3、管理外汇，严格而又合理地使用外汇，以保证必须急需的原料与货品进口。

4、对私营进出口商进行行政管理，并由国营外贸公司领导其经营。50年代初期，我国主要通过政策法规对私营进出口企业的对外贸易加以监督和控制。这与1956年包括私营进出口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

完成以后，对外贸易一度完全由国家统制有所不同。当时，国家对外贸领域的公私经营范围作了明确的划分，实行公私兼顾、区别对待的政策，采取对私营进出口商以经济调节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领导方式。

在国家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下，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部署了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外贸管理机构，统一外贸管理制度，设立国营外贸公司和利用、改造私营外贸企业。这些工作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加强对外经济斗争，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 四、网开一面，积极发展与苏联的贸易关系

##### （一）“一边倒”方针的提出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这个方针随着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而公布于世。

这个方针的诞生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分不开的。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曾提出了战后中美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很快就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



期美国日益公开地扶蒋反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破灭了。这可以说是产生“一边倒”方针的最直接的原因。其次，美苏两个大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形成冷战的国际格局，迫使中国等国不得不对两个大国做出选择而倾向于一方。第三，产生这一方针的“中心问题始终是怎样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策略”<sup>①</sup>。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结束某些大国操纵中国命运的时代，为中国的和平、统一、独立自主、繁荣富强创造条件。

为了这个目的，中共领导人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公布抉择。1949年4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时，周恩来派了学生时代认识司徒雷登的黄华到南京处理对外事务。黄华以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晤。其间，中共中央指示黄华，对于溥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sup>②</sup>一点，不要表示拒绝态度。后来，为了尽力争取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共中央于1949年6月还表示欢迎司徒雷登按照过去的惯例来燕京大学度过他的生日，并要与他会晤。但在美国决策人的干预下，司徒雷登未能成行，随后离开了中国。中美之间这一段微弱的联系，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割断了。

---

① 章百家：《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指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执行着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且大力扶植刚刚进行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这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考虑国家安全、国际承认以及从哪里有可能得到支援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方针，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sup>①</sup>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外交方针。此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7月7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也接受了这一方针。

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未反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往来，更没有主张在经济上关起门来搞建设。他认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及其追随者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封锁和全面经济封锁，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则给予中国有力的援助和支持。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证明了：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的外交方针和对外贸易方针是有先见之明的。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经济的恢复发展，1949年7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希望新

---

①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1、663页。

中国成立后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并商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寻求经济援助。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当年8月，斯大林就派了以科瓦廖夫为团长，有200多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到中国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新中国诞生不久，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同盟的核心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防止其侵略中国。而当时美国正大力扶植日本，因而问题的实质是防止美国利用日本侵略中国。这个条约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的重新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这个同盟条约的签订，局部调整了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的基本战略，表示了苏联对亚洲首先是中国负有义务，不能听任西方主宰这一地区。这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这个条约也规定了两国处理一般关系的原则，即：“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按照这个原则，两国又签订了处理中苏之间旧矛盾的协定，包括苏联对大连、旅顺及中国长春铁路（原称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使用权或共同管理权归还给中国，以及苏联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等协定。

这样，新中国对苏联的外交方针既体现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又保证了中国在艰难的国内外条件下，赢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为中国在遭受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封锁”、“禁运”的困境中有了网开一面，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生机。

## （二）外贸方向的变化

在旧中国长期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与中国交往的各个国家、地区进出口数量有起有伏，但是排在前几名的大部分为香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从1949年开始，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调整了对外贸易的方向。

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中共中央并指示华北局及彭真、叶剑英、黄克诚、黄敬，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讨论贸易问题，以便首先了解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同时，中国即与苏联开展了贸易谈判。4月19日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孟什可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间的贸易



协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同外国政府间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它使中苏两国正式建立了贸易关系。同时还签订了货物交换议定书、贷款协定义定书、过境货物议定书等文件。谈判中商定 1950 年我国对苏出口总值约 14323 万美元，对苏入口总值约 9477 万美元。出口物资主要是大豆、钨、锑、锡、煤、盐、牛羊肉和食品、花生油、种子、皮毛、茶、猪鬃等等。进口物资主要是：工业和铁路设备器材、交通通讯器材、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纸张等等。

中苏两国贸易为易货贸易，由两国国家银行结算。货物的价格按世界市场价格以卢布计算。当时进出口货价是公平合理的。

中苏贸易协定签订之后，1950 年，各国与中国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进一步发生变化。苏联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首位。在贸易额方面，1936 年苏联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 4%，到 1949 年占 8%，而到 1950 年则占 29.8%；从绝对值看，1936 年为 170 万美元，1949 年为 2630 万美元，增加 14 倍，到 1950 年则为 24190 万美元，为 1949 年的 9 倍多。1950 年中国对苏贸易额也呈增长趋势。1951 年，在美国加紧“禁运”、“封锁”的形势下，中国与苏联的贸易进一步发展。1951 年 3 月 14 日，两国签定了《中苏铁路联运协定》，以方便货物运输。同年 6 月 2 日中财委决定，凡由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朝鲜等国进口的货物，按最低税率征税。经过双方

的努力，1951年中国对苏联出口及转口总额比1950年增加121.91%，占全年出口及转口总额的42.25%。

1952年的中苏贸易总额在1951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比1951年又增加23.71%，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49.97%。从1951年11月起，中国派出74人的大型贸易谈判代表团赴苏参加1952年的贸易谈判。全团分综合、进口、出口、设计、新疆、旅大船渠6组；其中进口组分成五金、机器、机床、交通电讯、化工、杂品、特殊订货等8个小组，设计组分成鞍钢、机械电工、电力矿冶、轻化纺、技术援助等6个小组。组团的规模反映了中国当时对与苏贸易的重视和莫大希望。贸易谈判是在平等互惠、友好合作、相互协商的原则下进行的，易货范围和易货数额都比以往扩大了。但作价原则改变了1951年少数商品价格可有所变动的状况，而是完全按1950年的合同价格计算，新增加的商品也按1950年4月19日中苏贸易协定签字时的国际市场价格作价。这种一次订死的办法潜伏下长期的不合理。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使中苏贸易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物价波动的影响”，实质上是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僵死的办法所形成的价格不合理带到了国际贸易中。

1952年中国还与苏联、芬兰开展了三边贸易，按照3400万卢布的金额，由苏联供应芬兰，由芬兰供应中国，由中国供应苏联。

经过上述努力，1952年中国对苏联贸易出口额为14.78亿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55.88%；进口额为11.79

亿元，占全部进口总额的 46.82%。对苏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以后，苏联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同时提供了价值 3 亿美元（折合 2.7 亿卢布）的贷款，以便中国进口经济建设所需的设备和器材。

1953 年 5 月，由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5 月 15 日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 141 项工业企业，1954 年 10 月 12 日苏联政府又同意增加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 15 个项目，两者合并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著名的 156 项重点工程项目。这些工程所需贷款、进口设备以及设计费用等都是通过贸易途径进行的。后来，苏联还陆续同意增加了一些援建项目。50 年代，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定的协议，苏联先后共承诺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项目 304 个和 64 个单个车间及研究所的全套装置。至 1961 年 6 月 19 日，这些项目中完成设计、设备交货的有 122 个，设计基本完成、设备交货的有 27 个，正在陆续开始交付设计、设备的有 89 项，尚未开始进行工作的有 66 项；64 个个别车间和研究所中，已交完设备的有 29 个。后来有 155 个建设项目和 35 个单个车间、研究所被撤销。

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禁运”的严峻形势下，中苏贸易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对于中国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加强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历年供应中国的大量物资，象各种工作母机、机械、钢材、有色金属、电工电讯器材、精密仪器、石油、化工原料等，都是美国对中国“禁运”的物资。

中国对苏联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项目和贷款援助，都是通过贸易途径，以等值的物资偿还，并支付了利息。对成套设备支付的金额约为18亿新卢布。对各项贷款，比协定规定提前一年，于1964年偿付全部本金和利息，共计14亿新卢布。同时，在苏联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1953年至1957年还向苏联提供了1.56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资，不仅有苏联人民生活需要的大批农副产品，而且包括许多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需的重要矿产品，还通过转口向苏联提供了价值3.3亿美元的橡胶、黄麻、椰子油和黑胡椒等，支援了苏联的生产建设。

为了满足苏联等国的需要，中国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国内交通尚未畅通，许多传统出口商品还没有恢复生产，中国对苏联出口的商品以华北和东北所生产的大豆和粮油为主。到1952年，中国逐渐增加了钨、锑等有色金属、茶叶、生丝和肉类等农畜产品的出口量。这些物资补充了苏联当时比较紧缺的食品供应，提供了苏联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是中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苏联的巨大支持。为了保证对苏联等



国的出口，突破美国的封锁，回击美国的“禁运”，中国制定的出口原则规定：战略性物资如钨、锑、锡、锰、煤炭、焦炭不准输往资本主义国家；次要战略物资如铁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考虑少量输往资本主义国家，以换回中国所急需的物资；少具战略性的物资，如桐油、猪鬃、生丝、粮食等尽先输出苏联、东欧和其它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的需要，在国内市场供应偏紧的情况下，1955年初，国家计委一度做出内销服从外销的决定，并对外贸部经营的丝绸、茶叶、畜产品等商品制定内外销平衡计划，对其它商品也排了队。如猪肉的出口量是14万吨，加上4万吨猪肉罐头，共是18万吨，相当于全国生猪屠宰量的6%，鸡蛋出口量大约等于全国全年产量的1/10。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完成出口任务，当时全国人民都付出了代价，做出了努力和牺牲。

在50年代初期，中苏双方还成立了4个合营公司，即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和中苏造船公司。4个公司的股金分别为630万、1035万、945万、3150万新卢布，中苏双方各占50%。这些公司曾经对中国开发矿源、发展冶金、民航和造船事业起了积极作用。1955年1月1日，苏联将合营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移交给中国。其股份的价值由中国以向苏联出口货物的办法偿还。此后，这4个公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有企业。

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方针的指引下，通过国家管制外贸，实行保护贸易的原则实施，新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禁运”面前，积极发展同苏联、东欧等国的对外贸易，努力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使建国初期的外贸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5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工业化的转变。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奠定，都与这个时期实行正确的对外经贸方针、成功地进行了对外经贸工作密切联系着。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然能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 我当牺盟会特派员的回忆

曹 诚

1937年2月，我到太原军政训练班第十二连学习。连里的军事生活很正规，政治生活也很活跃。当时全连每个人都自觉地填表参加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表示有牺牲救国的抗日决心。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实际上是由薄一波等共产党员领导的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不久，阎锡山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山西的活动，以争夺群众，又在牺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我们经党内动员，又参加了“抗先”。从此以后，我们每次开“民先”或党的小组会，总是说在开牺盟或“抗先”小组会。在这种形式掩护下，党的活动几乎是半公开地进行。

尽管在太原可以公开地、合法地进行抗敌救国活动，但它毕竟是国民党阎锡山的统治区，受到阎锡山的种种限制。因此，当时连里有不少同志想到延安去，在人们的思想上，总认为在太原不如到延安“革命”。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志被约定到饭堂里谈话。不一会儿，薄一波同志来了。大家听他讲过课，都认识他，但不很熟悉。经指导员介绍，薄一波同志直接了当地说：听说有些同志想到延安去，延安

当然是个好地方——革命的灯塔，但是，革命不能都到延安去。我们不能只要一个延安，我们要的是全中国。现在山西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不坚持这个阵地，叫谁坚持？山西地处前线，形势这么紧迫，眼看着日本人步步侵略，这里急需需要我们，我们能丢下不管吗？能向后走吗？希望你们认真考虑考虑，在小组里认真讨论讨论，看到底哪个正确。薄一波同志讲的话不多，但语重心长。我们在小组里讨论过多次，最后完全同意薄一波同志的意见。在此之前，我们连里约有20人要去延安，在这之后，再没人提去延安的问题了。大家基本上安下心来，自觉自愿地听从组织安排。

1937年5月，我被调到七队——牺盟特派员训练队，学习了1个多月。学习期间，我被介绍参加了“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是阎锡山1936年迫于形势，将他所属的群众团体合并起来，统一组成的高级核心组织，阎自任会长。当时，在我们党内动员大家参加。据说，参加后到县里凭组织介绍信，可以与县长、公道团长编在一个同志会小组，便于开展工作。

1937年6月，我在训练队的学习结束，被分配任孝义县牺盟会县分会特派员，同时任中共地下党孝义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去的还有张希康同志，他是山西介休县人，我们同在十二连当兵，同到特派员训练队学习，同时任孝义县牺盟会县委会特派员。

我们从太原乘火车到孝义县，满希望能够顺利地展开



抗日救亡工作，没想到孝义虽离太原市不远，情况却大不一样。孝义县在旧政权和反共组织公道团的统治下，不仅不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对抗日活动进行阻挠和压制。据说，孝义县很早就有党的活动，是有革命的光荣传统的。1936年红军东征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都到过孝义，许多孝义青年参加了红军。1937年春，村政协助员高星照等17名同志到孝义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轰轰烈烈地工作了3个月，很有成效。问题是他们工作结束时全部撤走，一个人也没留。他们走后，县长、公道团长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所以县城里冷冷清清，连个抗日救亡的歌声都不容易听到。

我们到了孝义县，先到县长那里报到。县长安排我们住在文庙前院3间小平房里，后院便是公道团团长、副团长的住处，我们开会、来人谈话很不方便，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旧政权和公道团的冷落排挤。

七七事变爆发后，县城里召开了抗敌救国动员大会，县长、公道团长和我都讲了话。我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实行合理负担等等，这引起了公道团的反对。他们散布说牺盟会“言论偏激”，并监视我们的行动，常常派人调查我们做什么。我们经常出去访问学校、机关、家庭，他们便劝说人们不要接近我们，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阻碍。孝义在外地工作的职员、工人或学生，回到家乡搞抗日宣传活动，也常受到公道团的打击。敢于接近我们的只有少数进步教师和学生。他们劝

我们搬家，免得群众来牺盟会受到公道团的监视。我们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搬到一个停业的商号——永顺魁，住宿、办公都在1间屋子里。

公道团是1935年阎锡山在山西省各县普遍建立起来的群众性反共团体。孝义县各区村都有公道团，区有区团长，村有村团长、村防共自卫队，此外，全县还有防共保卫团，自成体系，互有联系，反动势力是很大的。

我们在县城的工作很难开展，决定分头下乡。我先到三区兑九峪。区长尹娴邪支持抗日，我就住在区上，到兑镇学校作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兑镇高小校长已参加牺盟会，表现进步，我可以到学校讲话，教唱革命歌曲，发展牺盟会成员等。以后我又到二区。与县城工作比较起来，区里的工作好开展，群众抗日积极性很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无不愤恨，问题是受到压抑，没人领导。

有一次县教育局在城里集训小学教师，我想借此机会讲讲抗战形势，动员教师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却遭到公道团的反对，县长也不同意。我们想召开座谈会，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们不同意；我们想建立和健全各区、村、学校的牺盟会组织，发展牺盟会会员，他们阻挠；我们想训练自卫队骨干，组织游击队，他们不给房子、粮食、经费；宣传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光我们讲，他们不动。总之，抗日救亡工作因受旧政权和公道团的压制，很不容易开展起来。

孝义县县长韩致温是一个老官僚，年老体弱，思想保

守；公道团团长王正表是五台县人，阎锡山的老乡，自恃根子硬，态度顽固；副团长侯俊德鬼点子多，到处钻。他们都靠反共起家，一贯打击进步人士，欺压人民群众。

一天，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传达指示，叫孝义县与介休县的中共地下党成立特委，由我任书记，负责建立通往晋东南的地下交通线，并领我到介休与地下党的负责人见了面。我们共同认为：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群众条件是根本。我们决定先分头准备。当晚我就回到孝义。

形势急剧变化，日本人已打进山西了。眼前的工作怎么办？我心急如焚，迫切需要请示上级，遂决定到太原一趟，向牺盟总会请示。到了太原，前去牺盟总会的时候，在大门口碰上杨蕴玉等同志，她领我到大礼堂听周恩来同志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报告，徐向前同志也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感到非常兴奋，听了他们的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散会时，已经深夜了，杨蕴玉同志送我到戈力同志处住了一夜。

第二天找到牺盟总会，他们对我反映的情况和所提出的问题很难具体答复。太原不断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我心里非常焦急。回到孝义后，即到汾阳，找到教二团政训处主任刘玉衡同志，同他谈了孝义的情况。刘玉衡同志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叫我用“孝义人民打倒王、侯二贼团”的名义来惩治公道团，这使我高兴极了。

我赶回孝义和张希康等同志商议后，得到他们的积极

支持。孝义县公安局有几十名武装警察，我们怕他们在斗争公道团时受县长指挥出来干涉，就几次去公安局做局长、巡官和警察们的工作，争取他们中立，不出来干涉，或干涉而不当真，以利斗争公道团大会的顺利进行。我们选定利用孝义县城赶集的机会召开斗争大会。头一天晚上我们干了一个通宵，准备好传单、标语，组织了两个抓人的战斗小组，并选定了联络员、宣传员，准备在抓人成功后，紧急通知各学校、团体，整队到县政府前广场上开大会。另外，我们还与汾阳教二团约定，请他们第二天派人赶来参加大会，给予支持。

第二天早晨，教二团郭实甫等同志背着冲锋枪，骑着自行车来到孝义县牺盟会。早饭后，联络员继续观察情况，两个战斗小组分头进入文庙公道团团长、副团长住室，“请”他们去开会。他们看到势头不对，问开什么会，说着就去拿墙上挂的宝剑。战斗小组的同志们扑上去夺下宝剑，抓住他们的手腕扭到背后，拖到文庙的大门外，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那天县城里赶集的人很多，宣传员们一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一边张贴标语、传单，群众争先恐后地赶来观看。队伍走到县政府前的广场停下，搬了几张方桌当会台，群众越来越多，总有好几千人。批斗会开始，公道团长、副团长戴着高帽子，低头站在台子前边。张锡九等同志讲话，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打进山西的暴行和我们的任务，揭露了公道团团长、副团长打击抗日进步活动的罪行。会



场上口号声不断，群众情绪高涨。批斗对象集中指向王正表和侯俊德，不牵涉任何别人和公道团组织。教二团的同志们背着冲锋枪，在会场转来转去，给群众助威。我到会场看到秩序很好，公安局根本没人出面，才放了心。批斗会开了两个小时，会后群众将团长、副团长交县政府看押。开始新来的县长刘怀伟拒不接收，张希康同志代表牺盟会出来说：你不接收，群众打死他们你负责。县长当然不敢负责，只好答应先找个房子，由群众派代表看管。几天后，我们不派人去看管，完全交给县政府，实际上是县政府将他们保护起来。我们适可而止，就不再过问了。

这次批斗会后，把公道团几年来在孝义反共、反人民的气焰一下子打下去了。随着日本人的疯狂进攻，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反共分子再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抗日救亡活动了。1938年，公道团与牺盟会合并，这是给阎锡山留个面子，也是给他一个台阶下，因为阎锡山是公道团的总团长，实际上是解散公道团。从此公道团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地降低了。

我们批斗了公道团团长、副团长以后，抓紧时机通知各区来人开会，加强抗日宣传教育工作，放手发展牺盟会组织，培训各村抗日自卫队骨干，发展抗日自卫队，成立了孝义县武装抗日自卫队（即游击队）。抗日救亡的高潮很快在群众中掀起，牺盟会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我当牺盟会特派员期间，除坚持与公道团的斗争外，还开展了与旧政权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孝义县老县长韩致温被调走，新来的县长刘怀伟是山西寿阳人，原在山西省政府财政厅任科长，约三四十岁。他虽表示支持抗日，允许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但当我们要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抗日自卫队和游击队时，他却不给经费，不给粮食，更不发给武器。斗争了公道团后，虽然形势好多了，但经费只能从商会临时筹措。

9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战斗胜利。10月下旬，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率总部机关一部分人员及总部随营学校到达汾阳、孝义一带，进行群众动员工作，“为创造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拓道路”。当时傅钟同志是总政治部民运部长，他带着党的关系，直接到孝义县牺盟会找到我。他穿着兰灰色的棉军衣，臂上戴着八路军臂章，左胸前挂着总政治部颁发的圆型金属纪念章，风尘仆仆，亲切和蔼地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希望了解情况，与牺盟会密切合作。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太高兴了。他给我们带来平型关作战及前方的很多情况。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和八路军驻孝义的兵站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延安发行的《解放周报》及其它一些书报、宣传材料。从此，我们得到了八路军的直接支持和领导，工作也好做了。

11月初，太原失陷前，日军进逼平遥县城，离孝义县城只有几十里路。平遥牺盟会特派员李文炯带着平遥牺盟会干部和游击队，随平遥县长到了孝义。当天下午，孝义县长刘怀伟通知我说，日军快到了，准备晚上撤离孝义县

城南下。我要他给游击队发枪，他不答应。这天，傅钟同志住在孝义城西关八路军兵站，我立即去报告他。他指示，县长撤走后，打开监狱，释放犯人，特别是政治犯，并召开群众大会讲话。我们都照办了。

刘怀伟听说我们把监狱门打开，放走犯人，很不高兴，找我质问。我说：总不能将中国人送交日本人杀掉。刘怀伟走后，我们发现他将带不走的枪、手榴弹扔到井里，非常气愤。当夜，我们带着游击队尾随刘怀伟到了下堡，向他提出抗议。

在下堡我们见到邓小平副主任和傅钟部长。傅钟同志指示我们和刘县长谈判，劝他留下坚持抗战，与汾阳、平遥县政府合署办公，成立汾、孝、平联合办事处，推举办事处主任。我们在其中成立秘密党团，叫我任书记。还说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留下坚持抗战，就请他们把公款、枪弹留下。当天下午，我们和刘怀伟谈判，刘顽固坚持要去找阎锡山，实际是要带着家属和县政府的人员逃跑。我们提出把公款留下作抗日经费，把枪支留下武装游击队，他不答应，我们就缠住他拖时间。与此同时，总部随营学校晚上加强岗哨，实行戒严，防止他们夜间逃跑；还派来八路军干部带领游击队利用开会方式，和平地巧妙地下了公安局的枪，武装了游击队，并扣留下公款。第二天下午，由我主持，在下堡小学召开会议，斗争刘怀伟，揭露他大敌当前，擅离职守，弃地逃跑，把武器丢到井里，不发给抗日自卫队、游击队，破坏抗日的行径。这时，平遥县长也

已被李文炯同志缴械。其后，随营学校发现县长给大麦郊打电话，说八路军扣留了他们。大麦郊离下堡六七十里路，驻有阎军 1 个旅。这样一来形势就严重了。随营学校立即切断了他们的电话线，加强了侦察、警戒，作好了战斗准备。游击队也立即整编、扩大，加强训练，准备迎击阎军。县长既不愿留下，就放他走了。公安局的人，愿参军的参军，不愿参军的资遣回家。这件事，当时被阎锡山称为“曹诚事件”，下令旧军准备“围剿”，一时气氛非常紧张。根据傅钟同志指示，我随部队行动，重点抓部队工作；张希康同志回孝义县城，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

小平同志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的大局，不影响八路军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将我和李文炯同志叫去。他说，阎锡山从太原撤退，路过大麦郊，要我俩赶快去大麦郊向阎报告，说明县长擅离职守，弃地逃跑，把枪弹扔到井里，几经劝说仍不留下守土抗战。所以我们将枪支、公款留下，将人放走。并说，阎锡山可能将你们抓起来，党会营救你们。我们连夜步行到宋家庄，离大麦郊还有 5 里，小平同志派骑兵通讯员追上我们，告诉我们阎锡山已离开大麦郊，叫我们回来。回来后，小平同志让我们发电报给阎锡山，并亲自为我们起草电文。以后据李文炯同志告诉我，他去离石开会时，听到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同志当面讲，要不是电文来得及时，就打起来了。阎锡山正和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商量“围剿”我们的问题，经牛荫冠和梁化之说明情况，又见到电报，局势才缓和下来。



当时，第二战区里阎锡山的县、区长听到日本人打来的风声，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打、骂、抓夫，往往距日本人还有几十里就逃之夭夭。旧政权瓦解，新政权没有建立，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吃没吃，喝没喝，伤兵没人抬，到处骂街、告状。阎锡山对此也很恼火，痛恨他们不争气，不给他“守土抗战”，不给他留面子，使他没法向蒋介石、中央军交代。阎锡山出于无奈，只得一批又一批地批准牺盟会特派员担任县长。这样，阎锡山对我们也就没再追究，只要我们把公款（主要是大烟）交他了事。小平同志指示我将公款亲自送到阎锡山指定的中阳县城教二团团部。我用牛车拉着，亲自送到中阳，交给教二团政治处主任刘玉衡同志。送交的公款，有大烟7箱，现洋3万元，经刘请示阎，转交给工卫旅旅长郭挺一了。

1938年1月，我们带游击队到赵城，见到决死二纵队政治委员张文昂、政治部主任韩钧。他们叫我见梁化之（阎锡山的心腹，派到牺盟会的负责人），当面报告扣留县长的问题。梁化之听到了后，叫我随他乘车到土门见阎锡山。到土门，我先见到牛荫冠同志，由他引我去见阎锡山。他先向阎介绍了情况，阎问了我几句，看了我几眼就走了。之后，梁化之要把我“留下”。张文昂、韩钧说，把曹诚留下，这个部队就散了。这样梁化之放弃了“留”我的意见，但仍然说：以后有机会把曹诚“换了”。

我从土门返回赵城的路上，搭乘阎锡山民政厅长丘仰竣的汽车。丘以为我是“自家人”，在车上闲谈中说：我们

最大的失策是提出“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被八路军利用了”。我觉得很新鲜，先后把这件事报告给傅钟和林枫同志，他们都笑了。可见阎锡山提出“合理负担”，只是为了欺骗人民，而共产党、八路军真的实行了，他们就认为是被“利用”了。

1937年11月8日，日寇占领太原，进抵平遥后，即收缩兵力，从平遥撤退，以巩固太原，没有马上南下。孝义县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团、工作组的领导下，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以后，刘怀伟又回到了孝义县城。我也进城看了看，在县政府见到了他。刘怀伟虽然回来了，但县政府的旧法令已经不起作用了。由总部派人领导并组织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开始活动了。我们可以经过城镇、区、村、政权和牺盟会组织，放手组织自卫队和扩军，人员食宿不经过县长、区长、村长就可以办理了。我们所到之处，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很受群众拥护。

不久，傅立民同志到孝义县任县长。有一天，介休县“牺盟县长”张德含同志到了孝义。在县政府，他跟傅立民和我畅谈牺盟会工作的经验，以及如何当好“抗日县长”的问题，我们谈了一个通宵。孝义县政府的工作，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汾、孝地区的抗战局面，在邓小平、傅钟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938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来到孝义。孝义及晋西南的抗战形势更加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更加有了依靠。

回顾我在孝义当牺盟会特派员期间所经历的这两件事——斗争公道团和扣县长，都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比较大的两个问题。不斗争就不能打开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若一味斗争就会影响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共同抗日的大局。我们高举抗日大旗，紧跟着形势的发展，充分利用日军进攻山西，攻占太原、平遥的紧急而又十分严重的时机，狠狠地打击了反共顽固势力，推动了形势向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由牺盟会出面，用人民群众的名义比较有利。这就是：要拥护阎锡山当牺盟总会会长，拥护阎锡山“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进步主张，参加牺盟会的组织，以牺盟会会员的身分、地位，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既要团结阎锡山及其领导下的旧机构、旧势力，争取他们进步抗日，又要斗争、打击其中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严重影响形势发展的反共反人民势力；利用形势发展的有利时机，冲破障碍，放手发展革命力量，以推动阎锡山进一步与我们合作，共同抗日。合作时间越长越有利。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最有利最正确的办法。牺盟会的胜利，就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回忆1937年春初到太原时，不愿“戴阎锡山的帽子”，不愿在阎锡山地盘工作的想法，正是由于不理解民族战争中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及其重要性所致。当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所取得的胜利，与八路军挺进山西，坚持抗战，创

建根据地，是密不可分的。从我到太原军政训练班到当牺盟会特派员，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每次回忆起来，总是感到无比亲切，并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



## 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

段伯宇

鲁迅在中国人民倍受苦难的时期曾写下这样的浩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想借用鲁迅的诗句，来表达解放战争时期我利用在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即侍从室）任职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斗争史。

### 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

抗战开始后，我离开保定的书报杂志社，带领几个人上太行山寻找八路军。当时未能找到八路军部队，迫于形势，撤到豫北，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在爱国将领周思诚（1940年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1938年春，三十二军移驻豫中许昌、叶县一带休整，我借机请假探亲，去西安北上到了延安。在延安，经任白戈介绍到抗大学习。7月，学校通知我回原部队。8月初，我赶到了湖南长沙三十二军集训地。不久，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员王兴刚约我谈话，我汇报了去延安学习的经过，并提出入党要求。8月中旬的一天，王兴刚通知我，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由他作介绍人，指定时间地点，由湖南省委的聂洪

钧带领我宣誓入党。聂向我讲了党的纪律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注意事项。当时我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作。

1938年秋，三十二军开赴江西，在参加了赣北战役打退日军的进攻后，三十二军被整编。1939年初，我由十八集团军南昌办事处介绍转到重庆办事处，由周怡领导。我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主任为李济深）。不久，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他让我做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我在国民党任职的有利条件，在工作中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反动派。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共产党员主要的一条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最后，周副主席再三嘱咐我要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为党的事业把工作做好。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始终牢记着周副主席的教诲。

1941年我所在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结束。这时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招生。国民党军队中凡师以上的参谋长和军事机关主要人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我为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决定报考陆大特七期。经过认真准备和考试，我于1943年10月考入陆大。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我便在同学中广交朋友，联系爱国的进步的同学，为今后开展工作准备条件。

1946年3月，我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当时我的弟

弟段仲宇问我毕业后的去向，我提出想到华北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仲宇建议我到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几个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仲宇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参谋，他可以推荐。我考虑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便同意了。

1946年初，仲宇利用他调动工作（到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机会，向军务局长俞济时推荐，由我替补他走后的遗缺。当时俞济时在陆大将官班学习，于是同意了。同年3月10日，陆大特七期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三军统帅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他一一检阅了特七期每个学员，到我面前时，我施注目礼，当时他上下打量我，我感到很突然。待典礼完毕后整队休息时，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说校长要召见我。我当时很紧张，想仲宇和我讲的事可能生效了。这时我猛然想起周副主席曾嘱咐我的：“遇事要冷静，沉着”，于是我从容地去见蒋介石。敬礼之后，蒋问到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简历表，蒋又有意地问了一声“令尊的姓名”，我回答之后他又接着问了我父亲早期的学历，当我答道：“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时，蒋站了起来，以指扣额，连声说“好！好！好！”事后我回到家中，仲宇告我蒋接见就说明可能同意了。当我讲到蒋一再询问父亲的情况时，父亲告我那时蒋也在速成武备，名叫蒋志清，与我父亲不同班，他是炮科学生，以

后留日了。我这才知道蒋为何一再询问我父亲的学历。

蒋召见之后不久我即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报到。当时正是侍从室准备改为军务局的过渡时期。4月间我到侍从室报到，地点在嘉陵江右岸的上清寺。在那我见到了第四科科长张国疆。我与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时就认识，另外他又是仲宇的同班同学，因此对我很欢迎，也比较尊重我。他告我侍从室要改为军务局，原第六组改为第四科，正在准备迁南京，嘱我安顿一下家属，等候通知，搭机飞南京后再来上班。

4月底我接到通知，搭机先飞南京。这时侍从室已改为军务局。我到南京略事安顿后即去军务局上班。上班之后先由张国疆带我去见俞济时局长，随后又去二科（作战科）拜会了高级参谋杨振兴。杨是陆大教官，又是我的同乡，我自然希望得到他的照顾。这样，我到军务局后有了一个小环境，便于我在机要部门站住脚。

关于军务局的成立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适应美军的要求，改组了军事委员会。蒋决定撤销侍从室，另在国民政府内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主管军事的部分划归军务局。军务局的特点是规模不大，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军事机要部门，犹如满清时代的军机处。这时我才体会到仲宇说的：“是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便于开展工作”。

有了这样的工作岗位，当时首要的问题是得到党的领



导。当我得知周恩来副主席于5月3日与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飞抵南京，就住在离蒋介石总统府不远的梅园新村时，便决定冒险去梅园新村见周副主席。但是几经冒险不得接近，真是咫尺天涯，情意难通，所谓望夫子之门墙而不可及！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星期日我在值班，在检查第四科的文件档案时，偶然见到里面房间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木匣，上面积满灰尘，像久久无人动用过。我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收集的我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顿时好似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当时无比兴奋。第二天上班后我问张国疆：我们办公室内为什么有共产党的文件？他告诉我是研究共产党的对策的，可由我保存。这样我取得了合法阅读的地位，于是我日以继夜地学习，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是我在蒋军内部开展中共地下工作的依据。

## 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日本投降后，我党为了避免内战，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接着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但是蒋介石却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撕毁政协协议，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在此情况下，我遵照党的指示，在蒋军内部酝酿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斗争。

当时我在陆大联系的一批进步同学，分配到南京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从国防部到南京守备部队均有。这些同学

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他们是万建藩、贾亦斌、刘农峻、宋光烈、宋建人、王海峽、董嘉瑞等。当时万建藩是国民党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副手，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我们时常在他俩的家里借着聚餐座谈、联谊、叙旧、漫谈形势，各述见闻。三载同窗，异地相逢，倍感亲切。聚会时我多半是听、问或插话，主要是介绍在军务局看到的一些材料，以事实说明八年抗战之后又打内战是多么不得人心。当时同学们反映很强烈，均不同意八年抗战后再打内战。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陆大同学的深思，同学们忧愤满怀，纷纷寻找光明，籍以报国。

1947年，我党发表《双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当时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种种欺骗，我在同学中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共反人民的真相。经过一个时期的座谈、讨论，同学们在事实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为日后组织武装反蒋奠定了思想基础。

## 军务局内的斗争

### （一）利用职务掩护同志

**掩护广东东江支队安全转移** 1946年，蒋介石利用军事调处，企图把华南我广东游击队（东江支队）转移到华北地区，以便巩固他在两广的后方基地。当时国防部规定了广东东江支队北上的路线。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就想不能

再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当我了解到国防部的意图是害怕东江支队沿途散播革命种子，所以规定行军路线便于防范（当然不能排除沿途截击的可能）时，为了掩护该支队的安全，我提出将支队4000余人水运北上，既避免沿途与群众接触，又可便于监视。我的主张得到军务局内稳健派的支持和局长俞济时的同意，报蒋批准。这样就确保了我东江支队北上的安全。东江支队于1946年6月30日由广东乘船北上，于7月5日安全到达了烟台我解放区。

**掩护王启明起义后安全到达解放区** 1947年3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张国疆交我一份秘件电报。我接过一看，是报告王启明于3月中旬在河南汲县率部起义。这种案件本应立即呈报，因为正好是在星期六下午，张国疆早下班了，我便借机放在抽屉里。第二天是星期日，这就晚报了两天。这样既掩护了王启明安全到达解放区，我也避免了纠葛。

**营救万建藩之弟** 1947年夏，贾亦斌和我谈到万建藩（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弟弟在苏北担任一个兵站分部的负责人，因涉嫌给解放区供给物资被扣押，案情严重。万建藩只此一弟，怕被老母知道出事情。贾亦斌同时也转达了万建藩的意思，要我设法营救，并告我“万之弟可能是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我决定冒险尽力营救，一则是搭救同志，同时也为团结争取万建藩，当时陆大同学聚餐多是由他相约。为此，我特意接近第六科主管军法的何专员。何是蒋家的亲属，也是俞济时的亲属，为人较忠厚，

讲情面，我以个人身份和他接近是有可能的。我们初次交谈，泛泛谈及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经过谈论，我给他留下了个好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渐渐谈及到国民党对待共产党嫌疑一类的案情问题。何说了实情：有些是事实，但很多属于涉嫌，也有不少属于虚构，此类案件颇难处理。谈到投机处，何竟向我征求处理此类案件的意见。我例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请他参考，并乘机问到万建藩之弟的案件，并说万建藩是现任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其弟竟陷入“共嫌”案情，家有老母，万的心情沉重等等，还谈到了万是我陆大同学的关系。我请何慎重考虑，妥善处理。我们谈话之后，何专员对万之弟签署处理意见为：“撤职考查，待另任用”。这样即保全了同志，也团结了万建藩，为尔后开展工作取得较大的便利。

类似上述情形在我经手的案件中还有一些。每次遇到这种事，我总是在合法条件下设法掩护，为之开脱。如云南的朱家壁同志我也掩护过。

## （二）斥 敌

处在敌人的机要部门，在工作、环境中总是险境丛生的。1947年夏，张国疆告我第三科来了一位高参，可能是三十二军的尹国祥，问我是否认识。我一听有些疑虑，因为我考陆大特七期时，借用了商震先生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证件，当时遭到尹国祥的反对。现在他也到军务局，引起我的警惕。当时该局副局长毛锦彪与尹国祥气味相投，沆瀣一气，更引起我的注意。果然时隔不久，军务局后楼



我的宿舍被检查了，书桌上抽屉里均被翻乱了。不久我因事到俞济时局长办公室，俞不在，遇到毛锦彪，他突然盛气凌人地叫住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不好好干我把你关起来。”我佯装不知何事，他拍着桌子大吼：“你干的事，你明白。”当时我想在反动派面前绝不能后退，于是反唇相讥，指斥毛锦彪：“你不讲理，老子不干了。”我愤懑地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把脚一跺，回到四科办公室，当即向张国疆提出：“我干不了，不干了，请向局长报告，辞职撤职都可以。”说完想抽身离开军务局。张国疆处事较稳，冷静地对我说：“你先回家休息，此事由我妥为办理。”我借机出总统府回家后，当夜嘱家中收藏好家中的马列书籍，焚毁有关材料等。我闭门不出，做了最坏的准备。过了几天，接到张国疆电话，约我去军务局。见面后他告我已向毛锦彪作了疏通解释，并向俞济时报告了我努力工作，为人正直的情况，嘱我照常上班，安心工作。这样事态平息了。不久在一个纪念会上，局长俞济时讲话时有意提出：“军务局同仁应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不要随意指责，更不要把青年逼上梁山。”俞济时意有所指，同时也为我开脱。不久毛锦彪调国防部工作了。

### （三）. 结婚与释疑

经过和毛锦彪的这场斗争，尹国祥以往那种小人得志的姿态反而收敛起来，不敢再兴风作浪了。但这场风波惊动了关心我的同学好友。特别是联勤部的黄警华及宋光烈、刘经霖等同乡、同学均很关心我。他们向我提出，应当结

婚，以免议论纷纷。并以实情告我：“在重庆陆大读书时，有人就怀疑你何以不结婚。”1947年冬，经刘经霖（时任南京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介绍认识了他的表妹敏如。经相互了解，双方都认为很合适，1948年3月我们在杭州结婚。

婚后我们回到南京，我趁假期约同学便宴，依次访问诸友。为了报答黄警华的关怀，我偕敏如先行拜访；又承贾亦斌举办舞会与同学相见。经过连日周旋，我结婚的消息自然传遍了军务局。又经张国疆、杨振兴先生的解释，对我的怀疑明显地消失了。不久，张国疆调任驻苏武官，俞济时让我接任第四科科长，少将高级参谋。我乘机把杨宝贤同学调到四科协助工作。形势一变，我便于开展工作了。

和敏如结婚后，有了一个助手，来访同学大都由她接待，有事她就直接到总统府告诉我。这样，我开展工作方便多了，也比较保密。

#### **（四）因公赴北平，趁机见傅作义**

1948年新年之后，我出差去北平。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统率华北军政，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因为我和他有一定的友谊。1927年涿州战役，傅一战成名。战事结束后，他被张作霖父子羁押在保定。1928年北伐军进到陇海线时，我正在保定河北大学读书。是年夏季的一天，父亲的朋友约我共同帮助傅作义逃出了保定，摆脱了奉军的看押，经白沟河到达天津，接管了天津警备司令部，肃清了张宗昌、褚玉璞的残部，开创了北伐军在天津的胜利局面。我大学毕业后，未再和傅会面。这时华北战事方酣，我希望

见到他，做做工作，推动形势的转变。

到北平后，我首先和陆大同学孙伯举联系。当时他是北平行营的参谋处长。我告他了来京目的，提出想见傅作义先生，顺便看看陆大的同学。从孙伯举、罗文浩（时任河北省保安司令，陆大同学）处我了解到了北平形势，并得知傅作义新任“华北剿总”，家住总布胡同。电话联系后，傅约我第二天一早到他家去。我到后，他牢牢握着我的手说：“已多年不见了”，不禁慨然，若有所思。接着他说：“我原定今早飞天津、唐山视察，伯宇来访，暂缓出发，借叙渴念。”他问我过去学医怎么进了总统府军务局当参谋，对此他表示惊异。我了解傅的治军精神，他初接“重任”，抽空接见机不可再，我决定倾吐真情。

我向他谈了抗战期间我志愿从军报国，以后考入陆军大学，经蒋召见，调到军务局（原侍从室）的经过，并告他这次来京、津是想看看华北情况。我话音未落，他转了口气，说：“你有使命来京吧？”我诚恳相告，自己是以世交晚辈身份来看先生的。他听后转为愉快，叫我坐到近前谈心，我乘机谈了几个问题。

首先谈了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的形势。1946年全面进攻失败，1947年重点进攻又遭失败，损失惨重，军无斗志；解放军已插入大别山区，把战争引入中原腹地；政治上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分裂，蒋家天下岌岌可危。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蒋独裁专断，违背民心，发动内战，国民党内部腐败无

能，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接着，我向他说明危难之中蒋把华北重任委以先生，战则难操胜券，败则责任在身。我与先生情属至交，曾患难与共，所以借来京机会，妄进一言，请先生慎思。我谈了之后引起傅的沉默。接着我讲了一段历史，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又说“楚汉相争，非贤者不能息天下之祸。”我记得讲到此处，傅先生问我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阴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我借此拜别，他送我时颌首示意，表示惜别。

在北平1个月，访问了当时的军政首脑及在北平的同学，基本上了解了华北局势，公事告一段落。1948年春节前回到了南京。

### 于河沿积极分子会议，决定武装反蒋

1947年春季，蒋介石发动了重点进攻。西路胡宗南以23万人进攻延安，结果宜川战役损失6个旅，刘戡被击毙；沙家店之役，以损失三十六师，钟松被俘而告终。东路津浦线上，莱芜战役，被歼7个师，李仙洲被俘；孟良崮战役，号称王牌军的七十四师被歼，张灵甫毙命，汤恩伯被撤职。两路重点进攻，不过半年，均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1948年秋，济南战役中蒋军10万余人被歼，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被俘。济南是山东首府，江淮屏障，济南失守，震



动了蒋家王朝，当时南京气氛颇显沉重。尤其济南战役中，陆大特七期同学张遵光（旅长）被俘，史若愚丧命，孟昭进全师投靠解放军，周力行全师被歼，只身逃回南京。惨败的结局，不能不影响在南京的陆大特七期同学。这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总统府军务局上班，突然接到贾亦斌电话，约我去干河沿 109 号他家中一谈，说有几位同学在等我。我到达时已是黄昏，我被引进一个小房间，有几位同学已在那等了很久，屋内烟雾缭绕，看大家的情绪似乎很紧张。我一到同学们便说：“伯宇也来了，有话就说吧！”听话音他们已争论好久了。我四周一看，除贾亦斌外，还有刘农峻、宋建人、董嘉瑞等同学。这时贾亦斌首先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抗战八年之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弄得民不聊生；四大家族垄断金融，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贪污腐化，失掉人心；前方节节失败，败局已定，我们不能和他们同归于尽。今天大家商议在南京暴动，包围飞机场，对为首的蒋家王朝官僚一网打尽，如果失败就上山打游击。贾亦斌说完后问我意见。我听后感到很突然，又很高兴，同学们有此决心，对我是很大的鼓舞。我沉思了一下，心想既不能泼冷水，也不能盲动。于是我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表示十分同情同学们的义举，但我们能调动的部队无几，南京有重兵驻守，我们的行动无异以卵击石，如暴露了自己，则非常不利。第二，我们要反蒋，是革命行动，但绝不能盲动，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搞。第三，我们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待机行动。我讲完后，同学们都表

示同意。最后我提出，行动要严守机密，今后个别碰头联系，不搞碰头会。

会后回到家中，兴奋过度，夜不能寐。回想10年前在重庆周副主席对我的教导：“共产党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争取好的形势，并使之变为现实的可能”，联想到当晚的聚会是到南京后的一次决定性会议，是几年来从酝酿反蒋到采取武装行动的一个转折点，真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干河沿会议之后，我立即约仲宇和宋光烈分别谈话，通报了会议情况，分别布置工作。宋光烈同学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时就和我党有联系，参加过冯玉祥在察北领导的抗日联军。这时他联系了一〇六军军长王修身，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们都是陆大特七期同班同学，又是西北军将领。段仲宇联系了爱国将领齐国樯和王海峽、崔汝梅等一部分同学。经过多方工作，到1948年冬，贾亦斌利用蒋经国组织新军的机会，成立了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自兼总队长；刘农峻任伞兵三团团长，王海峽任国防部工兵第四团团长，齐国樯任了江苏保安总队队长，段仲宇任上海港口副司令并掌握了所属辎重汽车团两个团。这些部队，西起芜湖，经南京、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我党所能掌握的一条地下战线。

## 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组织

1948年冬，我们掌握的部队已有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工兵第四团、汽车部队两个团，共4个独立团，两个总队和江防部队两个军，布防在京、沪、杭各地，军运任务繁重。为了加强工作，我于年底借病脱离了军务局，到上海集中全力搞军运工作，以便配合解放军渡江。当时段仲宇先到上海安置了家属，住在宝山路1号一座碉堡式的独立楼房内。我到家的当晚，表弟温尚煜告我他已入党了，我当即告他我所联系的部队情况，嘱他速报上级党组织来接我的关系。过了一两天，尚煜陪同张执一（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书记）来找我。我向张执一汇报了我入党的情况，在重庆接受周副主席指示的情况，以及失掉联系后，独立开展工作，联系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共同反蒋的情况。张执一听后非常高兴。他认为我在失掉关系后独立作了大量工作是很难得的。并说我掌握的部队工作量很大，需要专人联系，约定在1949年元旦后介绍李正文和我联系，指导工作。

李正文非常认真负责，几乎每天到宝山路1号我的住处联系工作。我把贾亦斌、刘农峻、段仲宇、宋健人、王海峤等人分别介绍给李正文，谈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和部队的兵力、驻地情况。为了加强今后部队的联系，我建议派党的同志到部队。经策反委员会的同意，选派张文藻到贾

亦斌的预备干部总队，周其昌到刘农峻的伞兵第三团，王声明到王海峤的工兵第四团，陈景明到齐国楮的江苏保安总队。布置就绪后，我和李正文去看望部队。先到嘉兴看了预备干部总队，接着到安亭和杭州，看了伞兵团、工兵团，随后，我们又由宋健人陪同去南京看了一〇六军（驻芜湖）军长王修身，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们均同意我军渡江时不抵抗，策应解放军渡江。

1949年2月，李正文向我传达了上海党组织关于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的决定。当时我非常感动，联系到8年间独立工作的种种困难情况，想到现在终于接上了党组织关系，真是感慨万分！我决心继续把工作做好，争取部队起义。我向党组织提出：介绍贾亦斌、刘农峻、宋健人、段仲宇入党。4月6日组织上批准了这4位同志入党。随后又研究了王海峤、宋光烈的入党问题。这时我所联系的陆大同学、国民党爱国将领均牢牢团结在了党的周围。

### 粉碎蒋氏父子保存基干部队的阴谋

1949年1月，蒋介石发动的三大战役接连失败，东北、华东、华北3个主力集团150万人损失殆尽。我解放大军直指长江，蒋家王朝岌岌可危。此时白崇禧电逼蒋介石下野，蒋被迫于元月21日宣布隐退，实际上仍在幕后发号施令。1月25日蒋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开小型军事会议，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制定



了江防作战计划，同时电令各军“坚守江防”，妄图负隅顽抗。汤恩伯也狂妄地吹嘘：“江防天堑，共军难以飞渡”。

为了策应解放军渡江，解放宁、沪、杭地区，我们掌握的准备起义的部队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加紧准备工作。而在这时，接连发生突发事件，迫使贾亦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和刘农峻领导的伞兵三团不得不提前起义。

预备干部总队在成立时内部就有斗争，该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希望得到总队长的职务，对贾亦斌当时以国防部代局长身份来兼总队长很不满意。总队调驻嘉兴后，我党又派去了联络人员，总队学员在贾亦斌领导下觉悟提高，种种迹象引起黎天铎的怀疑，伺机向蒋经国告了密。小蒋通知贾亦斌去溪口见面。3月初的一个早晨，贾亦斌匆匆来宝山路找我谈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约李正文来共同商讨，提出下列几点意见：（1）去当然有危险性，不去更加深蒋的怀疑，对我们不利，所以应该去见蒋。（2）当时我们的工作非常慎重，没有把柄给敌人抓住。亦斌去表示心怀坦荡，能解除小蒋的怀疑。（3）借此行可以了解蒋氏父子的动静。经组织商定同意后，贾亦斌欣然起程，约10天左右安然返回上海，并讲了蒋氏父子的情况。然而反动派并没有停止活动，3月20日贾亦斌匆匆由嘉兴来上海找我，他得到消息，国防部撤销他所兼各职，由黎天铎任总队长，率领总队开赴福建整训。为了粉碎蒋氏父子的阴谋，我们初步决定尽量拖延移交，积极准备起义，待机行动。

在此紧急的情况下，事态发展无独有偶，在同一时间，刘农峻匆匆来找我，说了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他说蒋介石潜来上海，在黄埔江的复兴岛军舰上，召集军事会议。会后，蒋单独召见刘农峻，对他说：“当年我在黄埔就是一个团起家的，将来到台湾后，即以你这个团作卫队，日后东山再起，你就是第二个团。”蒋在谈话中竭尽拉拢之能事。我听后感到预干总队、伞兵团先后发生事端，形势严重。当即约请李正文、贾亦斌和刘农峻共同商讨，同时约仲宇参加讨论，因为他任上海港口司令兼军运指挥官，一切行动在他的掩护下便于进行。当时我提出先讨论贾亦斌的问题，因为他时间紧迫，处境困难。我提出两点意见，总队在去福建的途中起义，不大可能，因为反动分子黎天铎已接管总队，贾亦斌失掉职权，难以指挥了。因此我建议贾亦斌率总队提前起义，出敌不意率部向天目山挺进，到皖南游击区。从军事上讲，路途近，有游击队策应，成功的希望较大。同时由上级党组织通知皖南游击队，东出天目山迎接；四明山游击队在浙东活动，可牵制敌军。在讨论伞兵团问题时，李正文透露了一个消息：“上级党组织决定，保存伞兵团的实力，作为人民伞兵的基础。”当时根据国民党要把伞兵团水运到台湾的意图，我建议：伞兵乘船出海后，转道北上开赴连云港登陆，因为当时只有连云港解放，可通知当地驻军迎接伞兵上岸。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方案可行，由李正文向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汇报。张执一当机立断，同意上述方案，并经上海局批准执行。

## 预备干部总队嘉兴起义

4月2日贾亦斌接到起义通知，在段仲宇的掩护下连夜离开上海，赶赴嘉兴防地。3日凌晨抵嘉兴隐蔽起来，随即转移到李自成桥附近。4日深夜，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宣布了采取行动的意义，并进行了动员。但这些活动被黎天铎的亲信侦知，他们到处追查贾亦斌的行踪。这时贾亦斌当机立断，争取主动，于6日晚带领大队长李凯寅及10余名队员，持枪来到黎天铎的办公室，贾亦斌把自己的手枪放在黎的办公桌上，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你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国防部领赏，再一条跟我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黎天铎在刺刀手枪的包围下，被迫签发了行军演习的命令。贾立即集合部队，下令以中队长杨今率队为前卫，向天目山方向前进，贾带队断后。1949年4月7日凌晨，预备干部总队在嘉兴起义。

贾亦斌率部起义的消息震惊了蒋介石，他立即调集5个师、1个保安总队，约10倍于预干总队的兵力兼程赶到乌镇，将预干总队包围了。贾亦斌决定率部突围。4月7日夜部队分3路突破敌军包围。在敌军的追击中，由刘异率领的第二路千余人转战数日，4月10日冲上莫干山。这时莫干山的管理局长王正宇假意殷勤，以招待食宿稳住部队，却乘机通报敌军。午夜敌军开上莫干山，封锁山口，层层包围，起义部队仓皇中不及抵抗，700余人被迫缴械。刘异

被俘后被敌投入钱塘江中壮烈牺牲！

由贾亦斌率领的第一路 500 余人，经过两昼夜激战，转移到双林、菱湖一带。由李凯寅率领的第三路 800 人冲到德清、武康一带。4 月 9 日两路部队于双林镇会合。这时国民党集中兵力连日围攻，部队寡不敌众，经几昼夜激战，战士伤亡殆尽，到达安吉附近时，只剩贾亦斌一人，而且身负重伤。他忍着伤痛爬到密林深处隐蔽 3 天 3 夜，4 月 14 日被一小学校长营救，被护送到宁国县境的苏浙皖边区，见到工委书记钱敏，钱敏派人将他送到芜湖转去南京。

贾亦斌领导的嘉兴起义，震动了蒋氏父子。预干总队原是为蒋经国准备成立 20 个师的新军训练预备干部的，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它的起义粉碎了蒋氏父子成立新军的计划，对蒋军部队影响很大，纷纷传说：“太子派投降共产党了”，引起军心涣散。虽然起义的损失是惨痛的，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报纸登载了起义消息，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蒋家王朝大势已去。

### 组织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

在中共中央上海局批准伞兵三团海上起义开赴连云港登陆的计划之后，4 月初李正文、刘农峻、段仲宇和我又共同研究了具体部署：（1）由段仲宇调拨船只，协助伞兵起义。（2）确定船只后，派人与海员联系协同行动。（3）由上海地下党与连云港驻军联系，届时迎接伞兵登陆。



为了保证伞兵团4月15日起义计划的完成，段仲宇特派联络参谋李春华到港口司令部调拨了102大型登陆艇，交付刘农峻接管。

4月13日，伞兵团按预定计划准备出发。当天一早，刘农峻先到102登陆艇巡视了人员、物资、枪械情况，并集合地下党员进行分工，随即召集排、连、营长宣布纪律，命令枪支、弹药集中保管。布置就绪后，中午全团在码头聚餐，团长刘农峻号召全团“风雨同舟，团结奋斗”，同时宣布李贵田为行船指挥官。聚餐后全体上船，各就各位。下午2时刘农峻下令起航，宣布甲板上不许士兵行动，指示纠察队协同警卫连（连长刘锦世）担任警戒，指挥台、电台、轮机室派纠察队持枪监视。下午6时船出吴淞口。入夜，通过了国民党海军警戒线。这时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航道，到达花鸟山转舵北上。10时整，按计划报务员把一份预定的电报送给刘农峻，随即刘召集副团长、各营营长开临时紧急会议，向他们宣读电报内容：“奉蒋总统电，伞兵三团即开往青岛，担任……”他们听了非常惊讶，纷纷猜测事情的原因。这时刘农峻郑重地说：“既然是命令，就应该执行，一切问题到青岛再说。”同时他把船长请来，严肃地下达命令：“船调头开往青岛。”102艇转航时，刘农峻心想：“这是180度历史意义的大转弯”。

刘农峻回到办公室，请来黄牧龙、王慎独二人布置起义的宣言，送周其昌看过后，准备打印散发。

14日拂晓船已进入公海。入夜以后，决定按计划采取

“分头活动，个别转弯”的办法进行工作。刘农峻分别找各营营长和副团长谈话，晓以大义，并告之解放军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随后，又找船长交待了任务。

4月15日清晨，李贵田、孟虎、谢易清分别散发了起义宣言，正式宣布起义。刘农峻立即召集官兵讲话，阐明了起义的意义。随后，102艇准备驶进连云港。这时遥遥望见划来舢板，是来接应领航的，102艇安全进港，伞兵团在连云港登陆。

4月18日，地区党委召开群众大会，特委书记谷牧致欢迎词，刘农峻代表伞兵团宣读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当天新华社发表了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当时，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支部队的起义。5月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祝贺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行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学习，为建立新中国的伞兵而奋斗。”同时宣布102登陆艇编入人民海军服役。

预备干部总队和伞兵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预干总队是太子派的基干，伞兵团是蒋介石预定作卫队的。两支部队在一周之内相继起义，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它们的起义，对于瓦解蒋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都有重要的作用。

## 争取国民党江防部队，策应解放军渡江

抗战时期我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就和王修身、于兆龙结为好友。解放战争时期王修身任一〇六军军长，于兆龙任九十六军军长，由宋光烈与他们保持联系，他们都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个人之间的交情很深。王修身、于兆龙每次到南京时，都约宋光烈见面。淮海战役后，王、于感到前途无望，对宋光烈表示：愿意和我们联系，提出待机立功，走自新之路。宋光烈因工作关系随国防部撤到广州之后，由宋健人负责和王、于联系。解放军渡江前夕，宋健人到上海和我研究工作时，提出建议：长江宽阔，波涛汹涌，江上有国民党的海军封锁，空中有飞机监视，将来我解放大军渡江时，多是木船，行动困难，如敌前强渡，可能损失很大。王、于两军长屡屡表示待机立功，如果联系好，策应我军，当可顺利渡江。于是决定约好王、于两同学在南京面谈。

1949年3月下旬，我和李正文同去南京，由宋健人带领到王修身家中。我们介绍了当前形势，陈说利害，指出前途，王修身边听边表示首肯。最后王修身提出，将来解放军渡江时，保证在他的阵地前沿不抵抗，并相机策应，并与我们达成了协议。

第二天李正文返回上海，我和宋健人同去看望于兆龙。我们约定，在解放军进攻时，九十六军从浦口撤退。谈完

之后，宋健人留住南京与王、于两部联系。

在我军渡江之前，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一〇六军二八二师提前起义，一〇六军被迫退到皖南，芜湖至荻港的防线由八十八军马师恭部接防。该部受一〇六军的影响，布防未稳，军长马师恭即要求辞职，不等命令到达便匆匆离去，该军群龙无首，在我解放军4月21日发起总攻时，全军被歼，芜湖、荻港江防首先被突破。浦口是南京的桥头堡，原由九十六军驻防，由于国民党安庆的防务久悬未决，该军调到安庆布防，浦口防务归刘汝明指挥。刘得到消息，解放军全线渡江发起总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下令全军南撤。于兆龙的九十六军提前于4月21日撤出防线。当时新华社长江前线报道：“我军于4月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防线。当面之敌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所遇抵抗甚为微弱。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国民党官兵希望和平，不愿再打了。”为挽救败局，汤恩伯于4月21日到芜湖督战，但不起丝毫作用。当时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一〇六军、九十六军撤出江防后和我们失掉联系，被迫撤到福建，途中九十六军参谋长黄振涛（陆大特七期同学）率领一个师起义加入了解放军。



## 瓦解国民党江苏保安总队，策 动国防部工兵第四团起义

我解放大军于4月21日胜利渡过长江后，迅即解放南京，紧接着兵分两路指向上海和杭州。在解放军进军途中，驻防金坛、溧阳一带的江苏省保安总队没有抵抗，就自动放下武器，欢迎解放军。这是因为保安总队队长齐国楷是我们的老战友，段仲宇的师友。1948年冬齐国楷应江苏省主席兼第一绥靖区主任丁治磐的约请接任江苏保安总队队长。我到上海后曾和仲宇一同拜访过他，谈了团结合作的问题。不久齐约陈景明到保安总队工作，加强了联系。1949年4月贾亦斌领导预干总队嘉兴起义，向天目山挺进时，曾请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告齐国楷在侧翼掩护，但这份电报错发到常州丁治磐的司令部，丁接到电报大为震惊，他和齐是同学好友，急忙通知齐国楷离开，齐被迫离开部队，被掩护起来。解放军到达后，保安总队群龙无首，识时务的官兵主动放下了武器。

另外，我们策动了王海峤领导的国防部工兵第四团在浙江起义。该团是美械装备的唯一的工兵筑路部队，淮海战役后由苏州移驻杭州。我曾去看过这个部队和王海峤，谈到该团的行动，我提出：为配合解放斗争，由海峤根据具体情况，相机行动。1949年3月间李正文等也先后到杭州联系过。国防部曾于2月电令工兵四团开赴广州，当时海

峽为执行党的任务，采取办法拖延调动，并根据国民党军事运输紧张的形势，将工兵团3个营用逐次移防的办法，散布在浙赣路千里路线上。他将第二营布防在衢州车站一带，将第三营移防南昌车站一带，自带第一营逐步向衡阳移动。工兵筑路团有许多在铁路上行动的作业车辆，这种笨重的车辆沿浙赣路千里路线散布在铁路上，形成了障碍，严重地妨碍了军事运输。王海峽的义举，阻止了国民党溃军和物资的南逃，引起了国防部的震怒，下令通缉王海峽。王海峽在完成任务后，偕同联络员王声明搭上陈纳德的飞机飞往香港，直到解放后才回上海。

## 解放上海的斗争

我解放大军扫荡宁沪路的蒋军残部后，于5月12日进抵上海外围。上海是蒋介石的老巢，因而他派亲信汤恩伯为宁沪杭警备总司令，驻守上海。上海的解放斗争时间最长，工作也最繁重。当时段仲宇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下，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于1948年冬接受了我的建议，争取到国民党上海港口副司令的职务，以其宝山路1号住宅作为地下工作的据点，展开了工作。当时仲宇身兼数职，除港口副司令外，还兼任铁路军运指挥官，上海市政务委员，在军政方面都有发言权。在他的掩护下，我们展开了各个方面的地下斗争。

## （一）支援宁沪、沪杭两路局工人罢工运动

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挫败的同时，其统治区内经济、政治危机也日益加深。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空前高涨。1949年春节期间，南京、杭州的铁路工人集中到上海，包围了上海铁路局，发起索薪、罢工运动。汤恩伯派宁沪、沪杭两路总局长王兆槐和警察局长毛森进行镇压，并调守卫车站的伞兵团的一个营警戒。当时段仲宇担任铁路军运指挥官，伞兵营归他指挥，因此也叫他参与这件事情的处理。段仲宇没有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在这紧迫的时刻，李正文来到他的指挥部，了解情况后指出：首先要支持工人运动，保证工人的要求；同时保护工人的安全，避免流血；要以公开的面目出现，不要暴露身份。段仲宇接受任务后，经过慎重考虑，亲赴现场了解情况。他见了群众代表，了解到了他们的要求。这时伞兵到了车站附近，警察局长毛森下令镇压工人。段仲宇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命令伞兵集合，到车站大厅列队休息。旋即命令营、连、排长：“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情况下不得开枪！”一切部署妥当后，段仲宇来到车站大楼会议室，以军运指挥官的身份向王兆槐、毛森提出：为避免事态扩大，可考虑选派代表谈判，为了达成协议，也可以增派代表。此时王兆槐唯恐事态扩大，因此首先同意段仲宇的意见。毛森妄想凭借武力镇压工人，但当他感到指挥不动伞兵时，也被迫同意了。经过谈判，第二天拂晓王兆槐答应了工人增薪的要求。工人群众取得胜利，毛森等

反动头子镇压工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 **(二) 保护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报务员秦明钧和联络员张固斋先后被捕，英勇就义。仅存的另一部电台遇到了转移的困难，一则没有安全的地点，再则转移中没有安全保障。这时李正文又来找我段仲宇，说明了转移电台的困难。仲宇得知后，毅然决定把电台转移到宝山路1号他的家中，放在他爱人薛纪常的卧室，安全地保存起来。几周之后，组织上选定地点，由段仲宇开着港口司令部的车子，同李正文一起将电台安全转移到指定地点。事后，李正文对我几次提到这件事，一再讲到由于当时仲宇坚定果敢的行为，使电台安全转移，为保证党的通讯联络作出了贡献。

## **(三) 领导国民党辎重汽车部队起义，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进到上海外围后，经过10天左右的战斗，已突破上海外围的主阵地，于23日进到市中心的苏州河一带。这时北岸的守军是汤恩伯的二〇四师，他们占领着百老汇、四行仓库等高大建筑物，封锁着苏州河东段；三三四师沿河占领着外白渡桥、北四川路桥、天妃宫等处桥梁，与南岸解放军形成对峙。这时段仲宇领导的辎重汽车两个团，于5月24日凌晨也沿河布防，在火力对峙状态中他命令团长率部起义，迎接解放军顺利渡过苏州河，插入河北江湾地区，促使五十一军起义，上海全部解放。



段仲宇领导的辎重汽车团由我军三野后勤部接收后，交给聂风智部编成快速部队，继续追歼汤恩伯残部。从5月12日开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人民解放军攻克了蒋军的最后堡垒上海，粉碎了蒋介石坚守6个月等待国际援助的阴谋，完成了解放宁、沪、杭的战斗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我们这条战线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埋头工作，默默地奉献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号召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当年一道工作的同志们，正在全力以赴，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现在虽年事已高，但仍在发挥余热。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一息尚存，不敢后人。

## 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回忆

楚 图 南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派到西南大区，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西南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53年，大行政区撤销，我奉调回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1953年7月参加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并受托筹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担任会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是对外开展友好活动的民间组织，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开展中国人民对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1958年，中央成立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这是政府机构，我兼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是1954年5月3日正式成立的，1966年4月22日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迫停止活动。1969年5月，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友协恢复活动，并与原来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部分机构合并，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从对外文化协会成立，到被迫停止活动，我都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王炳南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党组书记。我于1978年6月恢复工

作，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兼党组副书记。直到1986年我担任六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才辞去友协副会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我虽然不直接参与友协的领导工作了，但我一直关注友协的活动，现已年暮，还兼任友协的若干名誉职务。

回顾我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经历，看到我们中国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世界，感触颇多。

### (一)

建国初期，为什么要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等民间组织呢？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我们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了解，因此从世界范围来说，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还不多，与我们建交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以及我们在南亚的一些近邻国家。西欧、南欧的多数国家未与中国建交，非洲、北美、拉丁美洲更是和新中国鲜有来往的空白地区。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抗美援朝取得了胜利，国民经济已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然而当时我们一方面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因此，我们要发展，就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党中央的意见是要开展人民的外交，通过与人民的来往，宣传新中国，使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以

利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周恩来总理十分强调，政府之间，你反对中国，但人民的工作，我们会做，也必须去做。

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建国初期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此后又成立了中缅和中印友好协会。1952年还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始和各国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经济界及从事和平运动的著名人士进行交往。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汉宸同志为会长。贸促会成立后，通过经济方面的来往，促进了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和交流。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特别是扩大与加强文化教育艺术方面的交流，1954年又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这样，可以在未与我建交的国家官方往来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通过文化艺术同各国来往交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同时还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些组织都是与世界各国政界人士、社会名流进行交往的民间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情况，宣传新中国的政策，让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 (二)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成立，是由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同志具体筹划组织的。根据周



总理的指示，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1953年夏，中央决定由我负责筹备工作。先由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与我打招呼，他说：“扫盲委员会准备在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成立的新政府机构中撤销，要你接受新的任务，中央已有安排，你去找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面谈。”

随后，我去中联部见到王稼祥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与我亲切交谈。他待人诚恳，党性原则强。他把1953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对外文协的经过和有关精神详细地告诉我，并说内定由我担任会长。当我看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文件后，王稼祥同志对我说：具体怎样筹备，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你自己去考虑，我们只是把总的要求、总的方针任务告诉你。通过民间的来往，开展文化交流，这个面非常宽，任务很重，你要全面地考虑。首先成立筹备委员会，名单由你决定，然后告诉我，我们帮助通知，召集大家来开会。他把任务交代后，还告诉我，在他的领导下，中央有一个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研究部署和处理有关外事工作，并将我列为委员会的成员。和王稼祥同志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他在十年动乱中受尽了折磨，并在忧愤中去世，现在想起他就十分怀念。

我按照这次谈话精神，在筹备对外文协时，提出了几个委员名单，有刘宁一、廖承志、范长江、赵沅等人。开筹备委员会时，我把中央成立对外文化协会的意图作了说

明，也把苏联的对外文化协会（简称 VOKS）作了介绍。筹备会拟定了对外文协的组织方针、任务等具体方案，报经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批准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同志讲了话。

周总理对对外文协的工作一直非常重视。有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我向周总理报告和请示关于文协副会长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问：“你意见怎样呢？”我说：“作对外文协工作，应了解国际国内的文化情况，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夏衍同志非常适合。”周总理说：“夏衍同志是华东区文教委员会主任和文化部的部长，任务很重，再说夏衍同志在上海工作，这对你也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和配合嘛。”后来周总理调来了阳翰笙同志作文协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当时副会长还有著名的文化人丁西林、洪深等人。此后，文协就顺利地开展了工作。

随着对外文协等机构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我国对外交往不断扩大。1958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成立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由上海市调来的新任外长陈毅同志担任主任。同时成立了由国务院领导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57年开始筹备），张奚若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仍兼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政府性质的国家外事机构，但仍保留对外文化协会来做民间外交工作。

### (三)

在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中，一直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他不仅关心对外文协的组织建设，还指导我们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同时鼓励我们“走出去”。50年代中期，周总理多次说过，要办好新中国的外交，要办成一种新型的外交，应该有新的格局。除了官方的接触以外，还要广泛地和各国进行民间交往。用周总理后来的话说，叫做：“争取人民，了解人民，寄希望于人民。”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在社会声望上、在学术地位上都很有影响的朋友。同时也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到世界各国访问，其中有很多国家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我们派出的代表团北到北极圈的冰岛，南到南美洲的智利，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

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外文化协会成立以后两次重要的访问活动。一次是1955年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约60多人）去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丹麦访问，还到了当时没有与之建交的冰岛。在冰岛，受到了从总统至普通群众的热情接待。当时我们交往的一些朋友，后来大多数毕生致力于发展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拉克斯奈斯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交谈了一天，我们相互成为很好的朋友。拉克斯奈斯曾说，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就等于

没文化，不到中国就等于没有到世界。这次访问回国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可以以对外文化协会和我的名义邀请拉克斯奈斯到中国访问。周总理对我说，将来还要继续组织出国访问，要随时有这种思想准备。

另一次是1956年8月至12月对南美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四国的访问。当时，南美地区许多国家对中国不了解，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疑问或困惑。不少朋友在想，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命运如何？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在周总理亲自关怀和指导下，我们筹组了一个大型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出访南美。艺术团成员共80多人，其中多数是在国内享有盛誉的艺术家，京剧界有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等；音乐界有刘淑芳、魏启贤、王铁锤等；艺术指导是赵沅。周总理对这次出国演出的节目，包括舞台布景和灯光色彩，都亲自审查并作了重要指示。艺术团出国前夕，周总理接见了全团同志，并和团负责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勉励我们多交朋友，多谈文化，多宣传新中国的发展。同时他告诉我们，做工作不要强加于人，特别是对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疑虑的各国官方，要体谅他们。当时，我国和南美各国没有建交，在南美各国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使馆”，周总理指示，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在私下可以和他们有间接的、个人的接触。此外，周总理还通过外交途径，请印度和南斯拉夫在南美的使馆在我们出访时予以关照。对在南美的华侨，周总理指示我们要深



入细致地做工作，让他们感到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对海外华侨是一种支持和鼓励。要尊重和访问当地的华侨领袖，要特别注意做好上层侨界领袖的工作，逐步使他们对新中国有正确的认识，逐步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总之，周总理勉励我们，要走出去，要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象。

我们中国艺术团带着周总理的嘱托首先到达智利访问。选择智利作为我们出访南美第一站的原因是，我们已在智利交往了较多的朋友，如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后当选为智利总统）、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等人。他们成立了智中友好协会来接待我们，阿连德先生到机场迎接，并亲自驱车把我们送到美丽的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旅馆。我们在智利的第一个活动是全团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的铜像献花圈，以表我们对智利人民、对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当时我们这个看来很普通的活动，却引起巨大的反响，它使国民党政府“使馆”所散布的我们此行的目的是“颠覆”，是“革命输出”等谣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疑虑，对中国还不了解的智利朋友，开始重新认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在智利有90%的人信仰天主教，因此我们也请宗教界的人士看艺术团的演出。智利总统看到人民爱看我们的演出，也招待了我们，同我们照像，并和我交谈，这表明艺术团可以公开活动。这件事，在拉丁美洲报纸上一宣传，为我们艺术团到其它地方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我

个人的感受是很多的，我们在南美的第一次访问演出活动是成功的，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全世界人民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愿望是什么力量也封锁不住的。周总理号召我们“走出去”，是有预见性和战略眼光的。

在智利访问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阿根廷访问。阿根廷当时是拉丁美洲的政治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我们在阿根廷的科隆艺术剧院举行了首场演出，这个剧院在南美首屈一指，首场演出后，影响很大。我们在阿根廷参观了一些地方，游览了一些风景区。阿根廷的教育部长接见了艺术团的部分领导人。

接着到乌拉圭访问。因为其国家较小，由一个官方的文化组织接待了我们。乌拉圭被称为拉丁美洲的瑞士，文化程度较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较高，地方虽不大，但靠近海，风景秀丽。我们艺术团除在乌拉圭演出外，还参观了很多地方。我们在乌拉圭的活动受到了官方重视，乌拉圭执政党领袖接见了我们。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我们出访南美四国的最后一站。我们到巴西后，受到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的接待，他与我们很友好。在巴西首都圣保罗演出时，巴西总统本想来看我们演出，但因他受到的牵制较大，就让其夫人及女儿来观看，并且赠送了一个花篮。艺术团杂技演员送给总统女儿一个空竹。不久，巴西市场上大批塑料空竹上市，一时成为孩子们喜爱的玩具。演出的影响达到如此程度，说明我们从艺术文化方面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的

方针是正确的，演出取得了成功，消除了一些人的疑问和顾虑，不仅民间重视我们的演出，当地的政府也不得不注意我们。

在这四国的访问中，我们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争取得到当地朋友们的协助。拉丁美洲有很多华侨，在当地有一定影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特别注意与当地华侨的接触和交往。在智利访问时，国民党政府“使馆”千方百计阻挠当地华侨和我们接触，但是，由于我们近百人的艺术演出团的影响，不少华侨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和封锁，来买票看戏，有的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宴会、茶会和各种会见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对长期隔绝了的祖国有了一些了解，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例如，有的华侨在我们住宿的旅馆订了房间，在我们的住房附近日夜轮班守护，防止有人捣乱。我们通过一些朋友的联系，拜访了一些华侨和华侨领袖。虽然这些侨胞入了外国籍，但他们仍然是爱国的，我们在那里有很多工作可做。

我们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重点接触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侨胞领袖李玉堂先生。李先生早年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在南美定居。他采用乡长或家长的办法，资助到南美特别是阿根廷的华侨青年求学就业，乃至成家立业。他还注重兴办教育，自己担任不少学校的校董事职务。他的学生不仅遍及侨界，而且在阿根廷政府的高级官员、政府部长、国会议员中也有不少门生弟子。由于历史的因缘，国民党政府驻阿根廷的“大使”也对李玉堂先生执弟子礼。

我和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多次去李玉堂先生家中看望，并几次邀他观看演出，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他亲眼看到新中国艺术使者的演出在当地朝野引起轰动，使他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深深体会到，有强大祖国作后盾，他们才能在侨居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及获得的成果，体现了周总理关于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思想，其影响是深远的。

当时周总理和文化部的夏衍、钱俊瑞等同志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外面的时间很长，有人生病了不能演出，国内又不断地派人来。出去时有80多人，回来时近100人。

出访结束后，我们转道欧洲，分批从瑞士苏黎世乘捷克航空公司飞机经布拉格回国。途中因一架飞机失事，代表团秘书长李德椿、工作人员邓子若及演员、舞台人员共10人不幸遇难殉职。大家对这10位同志的牺牲表示深切悼念，在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10位烈士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所做的工作将永远铭纪在我们心中。

这次南美四国之行，我们先后在圣地亚哥、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五大城市演出58场。通过演出和参观访问活动，我们与这几个国家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文学艺术界人士进行了直接接触和友好交谈，也和这几个城市的广大人民见了面。我们通过中国古典戏剧和民间歌舞艺术的演出、座谈、演讲、报告等活动，具体生动地介绍了有着悠久传统、丰富多采的



中国艺术，介绍了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表达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这些作法收到良好效果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访问中我们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深切感受到了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正如一位巴西朋友所说的：“成千上万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热烈而友好的欢迎古老但又年轻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艺术使节们，欢迎永远摆脱了压迫枷锁的伟大中国人民派来的代表。”“通过对中国艺术家的欢迎，巴西人民得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热爱、钦佩和支援。中国艺术家们的访问和演出，也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的重视和关心。”这些话不仅恰当地说明了我们访问演出的意义，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得到的荣誉，乃是各国人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对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崇敬。我们在这四国的访问是一良好开端，对于今后继续与这些国家及人民保持友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 (四)

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前后，我也接待过一些外宾。这期间，也有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活动。

一次是1957年5月31日至7月13日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尼泊尔是我国近邻。当时，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由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兼任，由一个参赞在尼泊尔

作实际工作。我们先到印度，准备了一段时间，然后和潘自力大使一起到尼泊尔访问。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是一位有思想、有魄力、文化修养很高的年轻君主，他在国内的威信非常高，当时虽然还没有到过中国，但很重视中国代表团，曾先后6次在皇宫接待我们。首相兼外交大臣阿查里亚从我们一到尼泊尔便与我们保持经常的接触。在一次招待会上，国王将我、翻译和他自己共3人安排在一个桌上，而将外交大臣、潘自力大使及翻译安排在另一桌上，实际上是国王为了同我谈话方便特意这样安排的。

国王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古老的、传统的文化及过去的学术研究抱什么态度？他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对我们不了解，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多少有些怀疑。我对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对过去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接受的，对优秀的学术成果也是接受的。列宁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拿过去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都接受人类很多优秀的知识。社会主义对人类过去的文化知识不是抱否定的态度，而是接受这些知识，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进一步发展。

国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宗教问题。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宗教是鸦片，是麻醉剂。社会主义对宗教是否排斥、打击呢？他担心西藏问题，担心喇嘛教是否存在。问题提得很尖锐。我谈到，1954年中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相信宗教的自由。他又问，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宗教？我告诉他，中国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等。当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均是国家的领导人。

国王提的第三个问题更为尖锐。他问，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军事力量强大了，这样会不会侵略其他国家。尼泊尔是一个小国，国王提问的用意我是理解的。我回答说，过去的中国是由封建统治者统治，他们压迫和剥削人民。旧中国有过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但也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对遭受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是十分同情的。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侵略别国。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我们尊重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民族解放斗争。我们相互间谈得很融洽，他谈得很深，我也谈得很透。

访问尼泊尔回国后，我们把这些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对尼泊尔我们要做好工作，要帮助他们修公路，搞建筑，邀请尼泊尔国王到中国访问，到西藏访问。现在尼泊尔到西藏的交通很方便。

这次访问之后，我们又陆续到过一些国家访问。如1957年12月20日至1958年1月20日，以郭沫若为团长、包尔汉和我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埃及参加亚非团结大会；1959年2月12日至3月1日，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朝

鲜，我们以对外联络委员会及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同朝鲜签订了第一个中朝文化合作协定；60年代初我又第二次访问朝鲜；1961年4月24日，我们应邀去古巴进行友好访问，等等。

1965年5月以后，我参加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的工作，并担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的党组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文委党组书记李昌同志被批斗靠边站，经陈毅副总理请示周总理，决定由我临时负责对外文委的工作。文委被军管后，我也被撤消一切职务，靠边站了。

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仍接待了一些外宾。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阿中友协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那时，我们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很好。陈毅同志叫我接待，但造反派从中刁难，陈毅同志请示周总理，由于周总理出面干预，我才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我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延安、武汉、上海、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参观。12月底，参观访问结束。我把代表团送走后，回到文委又被隔离审查。1967年9月3日，越南派了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周总理同造反派打招呼，要我去陪同他们访问。我陪代表团先后到山东、上海、桂林等地访问。回来后，继续受审查。后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68年经周总理过问调回北京。

1978年，我恢复工作，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和党组副书记。当时对外友协会会长是王炳南，副会长是夏衍、我、林



林、侯桐、谢邦定（兼秘书长）。同年11月7日至12月21日，我率代表团访问英国、比利时和法国。周总理曾跟我们讲过，要不忘老朋友。我们在欧洲有许多老朋友，也有一些对我们友好的团体。英国原有英中友好协会，自中国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协会就解散了。后来又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是李约瑟。我们到英国后，李约瑟亲自驾车接我们到他的研究室参观。他的研究室里有很多中国书，包括许多线装书，还有一些中国字画。他还在家里盛情招待我们，并把几十年前拍的有关中国的相片拿给我们看。在英国，我们不仅拜会了过去的老朋友，而且结交了新朋友。

在比利时访问期间，我们在与比利时国王见面时，特别谈到了其已故祖母伊丽莎白王太后的往事。伊丽莎白王太后是欧洲著名社会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反法西斯斗争，救援过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使他们免遭法西斯迫害。在希特勒侵占比利时，比利时王室流亡期间又积极呼吁支持反法西斯斗争。她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在中比尚未建交时，她即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感。在中国国庆10周年前夕，我们以对外文协名义邀请她到中国访问，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盛典，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郭沫若等我国领导人友好的接待。回国后她热情宣传对华友好，为中比建交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国王曾派王室武官将其祖母1959年访华时所摄照片（与宋庆龄等人的合影）及底片送给我作为纪念，这是中比友好交往的佳话。

1980年4月18日至5月1日，我又率中国对外友协、

中朝友协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1年率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罗友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1982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意大利。除此之外还访问了其他一些国家。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自50年代以来中国各民间团体同日本的交往。几十年来，我们接待了大批日本民间的、半官方的友好团体。周总理曾多次接见日本各方面人士，促成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在日本兴起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并使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由于周总理的安排，中国又开始了人民外交的各种活动。1973年4月至5月，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周总理安排我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代表团的成员相当广泛，除廖承志夫妇外，还有张香山、马纯古、华罗庚、荣毅仁、王芸生、谢冰心、孙平化等老同志，以及李季、古元、陈祖德、郑风荣、戚烈云等在中国文化、体育界有过突出贡献的同志。周总理对这次派团访日十分重视，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代表团离京时，他安排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为我们送行。回国时，刚下飞机就被接往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认真听取汇报。这次访日活动相当成功。在日本，廖承志同志在东京、京都、大阪一带活动，其他同志则分别到日本全国各地活动，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岛，西到新潟，东到仙台。大家既访问了老朋友，也广交了新朋友。我们

在日本各地所受到的新老朋友的真诚接待及在日本朝野引起的巨大轰动，使我们再次感受到由周总理倡导的人民外交活动的巨大力量。其后，在1978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充分证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战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从1958年起负责外交工作的陈毅副总理也十分重视人民外交工作。他说过：“中国的人民外交，是通过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的密切结合和灵活运用，构成了我们人民外交的体系，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最大特色。”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倡导、关怀下，60年代初组建了东方歌舞团，学习、排演亚、非、拉各国优秀的民间歌舞，积极开展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文化艺术交往。在陈毅副总理的倡导、支持和促成下，中国和日本围棋界开始进行交往。1960年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接待了第一个由日本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界代表团，影响很大。

60年代中期，西欧、非洲的许多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周总理提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了解”的方针，亲自出访非洲各国，在非洲朝野广泛地开展了工作。看到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发展和进步，我和许多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一样，深受鼓舞，并为自己能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感到自豪和欣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友协的工作在過去的基础上更加生气勃勃地开展，

出现了新的局面。截止 1988 年底，对外友协已同 8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个对华友好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及知名人士开展了友好往来。王炳南同志在这段时间为继承发扬人民外交的优良传统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亲自率领友好代表团对印度、波兰、保加利亚、苏联等国的成功访问，为中国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此外，从对外文协到对外友协，几十年来许多同志在这个领域热情而辛勤地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同时，通过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使外国友人认识了解了中国。

回顾我在对外友协工作的经历，回顾我国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所走过的路程，深感开展人民外交对于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目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已走向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也逐渐了解和重视中国。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贯支持和维护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的。因此，我们开展人民外交，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可以说是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服务的。我们要在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更好地开展人民外交工作，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姚佩莲整理）



## 叶剑英的革命诗篇创作

张 廷 栋

叶剑英是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从青年读书时起就开始创作诗词，一直到 80 年代，前后近 70 年，创作了许多革命诗篇。这些诗篇，绝大部分产生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有些产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今天读着它，仍能使人感到革命先辈蓬勃的朝气，坦荡的胸襟，坚强的意志，以及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英勇斗争勇往直前的精神。为了便于学习，我们把叶剑英创作的散见于解放前后的报纸、书刊、杂志、画册上的诗词手迹和珍藏于国家、军队的博物馆、档案馆、资料室等单位以及有关同志手中的诗词手迹，加以搜集和整理。我们还把他早年留下来的笔记本、日记本中的诗词手迹进行了整理。在学习和整理叶剑英诗词手迹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他有杰出的诗词创作才能，所作诗文生动优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 诗词创作，不拘条件

叶剑英创作诗词不受时间、地点和纸笔条件的限制。他

创作诗词，有时是在会议上，有时是在外出视察的火车上或飞机上，有时是出国访问期间，有时是在外地疗养期间。他的诗词有的是当场作的，有的是事后作的。如《藻鉴堂赠画家》这首诗，就是当场作的。

1979年7月11日下午4时，叶剑英来到颐和园藻鉴堂湖边垂钓时，得知藻鉴堂有来自四市三省的部分国画家要求接见，便高兴地同他们见了面。当88岁的上海老画家朱屺瞻同叶帅握手时，叶帅说：“你比我健康，我真高兴！”朱屺瞻立刻以不老松为题，挥笔画了一棵挺拔耸立的劲松。叶帅看后兴致勃勃地说：“给你们写一首诗吧。”于是，他提笔一挥而就：“‘画家渔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请四市三省画家指正。”叶帅的诗大多数是当场作的，事后作诗一般都是比较长的组诗。

叶剑英创作诗词用纸多半都是普通白纸，宣纸用得很少。他用笔也不光是用毛笔，有的时候用钢笔或铅笔，有的时候用红蓝铅笔。

### 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叶剑英所以能创造出优美的革命诗篇，除了他学识渊博、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写作诗文一字不苟，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他对创作的每一首诗文，都要经过多次推敲修改，哪

怕事隔几年、几十年，只要自己发现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就立即修改。

例如《攻关》这首诗，头两句原作“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厚”，是叶剑英1943年1月22日写于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扉页上的。事隔34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振奋人心的科学春天里，叶剑英为了祝贺大会的召开又作了后两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并将原作的第二句“攻书莫畏厚”的“厚”字改为“难”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叶剑英从几十年战斗、学习的切身实践中得出来的宝贵经验。后两句，他不但肯定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所处的关键地位，而且深信，经过努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定能够实现。

再如《八十书怀》这首诗，叶剑英在写完之后，经过推敲，又作了几处改换。经过字斟句酌的推敲、修改，这首诗更充分地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虚怀若谷的高尚美德。

### 运用古典，博而精深

叶剑英的革命诗篇，按种类区分，有律诗（包括四言、五言、七言律诗）、排律、绝句（包括五言、七言绝句）和词章。其中律诗所占比重较大。

叶剑英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写出了许多革命诗篇。这

些诗篇，显示了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手不释书，口不停吟，从中国古典诗词中不断吸取营养。到晚年，特别是八旬以后，仍能背诵不少名篇佳作。他的律诗、排律、绝句和词章，都是依照严格的诗词规律创作的，在诗文中非常讲究平仄、对仗、字数、句数、韵语、韵脚等。他创作的诗词格律严谨，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叶剑英在诗词创作中极善于引用、点化、借鉴古典诗词和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用法。

### 1、引用古典

在刘伯承 50 寿辰之际，叶剑英写下了组诗《刘伯承同志五十寿祝》（二首）。在第二首的头一句“细柳营中寂不哗”中，他引用了汉将周亚夫屯军细柳、防备强胡的史实。古代诗人经常用“细柳”、“细柳营”、“亚夫营”等来形容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军队。如南北朝庾信的《燕歌行》中有：“自从将军出细柳，荡子空床难独守”；唐代魏征诗中有：“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营”；宋代陆游诗中有：“五丈原头刁斗声，秋风又到亚夫营”等。叶剑英在这里用“细柳营”，是代指刘伯承等同志所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这句诗，热情赞扬了刘伯承带兵有方、治军严明，也生动地表现了我人民子弟兵是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警觉性的队伍。

叶剑英在祖国南疆视察时，一次作了三首词，其中的一首《蝶恋花·榆林港》中的第五、六两句是：“飞到榆林



天已暑，夏秋只隔三朝暮”，其中“三朝暮”是从唐代诗人李白《上三峡》诗中“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引用来的。这里明确写出了此次视察的地点和抵达后突出而强烈的感受。一年之中，季节的变换总是需要较长的时日。然而诗人用“三朝暮”就表达出了在短短时间内经历“夏”与“秋”、“寒”与“暑”两种时令、两种气候，从而充分表现了祖国的幅员辽阔和大好河山的丰采多姿。

## 2、点化古典

叶剑英参观成都草堂时，曾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下了《成都草堂》一诗，诗的后两句是：“广厦万间粮亿吨，草堂公社足千秋。”

成都草堂是唐代诗人杜甫居住过的地方，他在居住时曾写过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不仅描述了自身“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贫困境遇，抒发了“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爱国忧思，而且由己及人，想到了天下众多的受苦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襟抱啊！但是，这种理想在一切剥削阶级掌权的时代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之变成美好的现实。叶剑英的这后两句诗，紧扣《成都草堂》这一诗题，巧妙地点化了杜甫当年在草堂写下的名作，由古及今，热情地歌颂了今天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

### 3、借鉴古典

叶剑英率我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时，写下了《访波杂咏》（八首），第一首《菩萨蛮·华沙公园怀肖邦》的上阕后两句是：“风柳扫残阳，搔头念故乡”。“搔头”，在古代诗歌中是经常用来表现深切的思念之情的。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望》一诗中“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两句，极为逼真地写出了诗人因感伤国破家亡而搔短白发，无法插簪的悲痛情景。叶剑英在诗中巧妙地借鉴了古典诗歌，用“搔头”一词深刻地表现了肖邦的爱国心志。

### 4、批判地继承传统的用法

在抗日战争胜利 20 周年之际，叶剑英重读毛泽东《论持久战》这篇著作，回忆自己自抗日战争以来走过的革命历程，更加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感慨之余，他写下了《重读〈论持久战〉》这首诗。诗的结尾一句是：“眼底吴钩看不休”。吴钩是春秋时代吴国的一种锋利弯刀。在古典诗词中，“看吴钩”、“看剑”，常常用来表现作者急于为国立功、期待理想抱负能够早日实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唐代诗人杜甫曾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之句（《后出塞》其一），李贺也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诗句（《南国》其五），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曾写过“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等诗句。叶剑英批判地继承了这个传统的用法，赋予了新意。诗中的“吴钩”显然不是指个人佩带的刀剑之类，而是借喻为革命斗争的武

器、人民的武装。“看不休”，是看了又看，看个没完。这里表示十分珍爱、永志不忘的意思。

## 题材丰富，内容广泛

叶剑英创作的诗词，题材丰富多采，内容广泛充实。他在题材的选择上，能及时地把握时代性，摄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珍贵镜头，本质地反映时代的特征。如50年代末写下的组诗《十三陵水库》（二首），通过对广阔雄伟、热火朝天的工地场面的描绘，来表现水利大军势不可挡、团结奋斗的精神。

在意境的创造上，叶剑英能正确地处理抒情和写景的关系，作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如《蝶恋花·海南岛》、《蝶恋花·榆林港》、《朝中措·鹿回头》三首词，抒发了诗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海南人民无限热爱的强烈情感。但是，这种强烈的情感是通过“海滩拾贝趁朝霞”（《鹿回头》）、“丰收处处秧歌鼓”（《海南岛》）的活跃场景，“红豆离离”、“浅水兰鱼梭样去”（《榆林港》）的斑斓色彩，“椰树凌霄”（《海南岛》）、“风卷浪堆沙”（《鹿回头》）的鲜明形象所构成的一幅幅独特而动人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读了这样的诗歌，如入其境，如闻其声，我们好象跟随诗人一起饱览了南疆宝岛的明媚风光，感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正是诗歌艺术力量之所在。

叶剑英创作的诗词在语言的表达上，朴实自然，平易

明快，不事雕琢。读起来，如诉肺腑，如话家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如组诗《重游延安》，其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就是通过质朴感人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诗中“一别延安十二年，延安已改旧时颜”、“乡亲呼我最情真，枣子南瓜宴故人”、“王家坪上杨家岭，鸿爪从头细细看”等诗句，把诗人对延安和陕北人民的深厚感情，用朴素语言表达了出来。

叶剑英的诗词内容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 缅怀革命先烈。如：《香洲烈士·调寄满江红》、《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满江红·一九四二年七七悼左权同志》等。

《香洲烈士·调寄满江红》作于1925年10月。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正式创立了建国粤军，叶剑英任该军第二师参谋长兼新编团团长。孙中山、廖仲恺决定在第二师中成立一个拥有8个连、900余名士兵的实力雄厚的独立营。叶剑英兼任独立营营长，设营练兵于香洲。1925年4月25日，一小撮隐蔽的反革命分子，趁叶剑英东征未归之际，策划反革命兵变，把独立营的25位军官士兵当场残害。叶剑英闻讯后立即率军赶回香洲，连日收殓烈士，并将潜逃澳门的叛乱者10余人引渡香洲，就地正法，为死难的先烈报仇。同年8月，叶剑英在狮山为牺牲的25位烈士兴建陵墓；竣工后，在10月3日联合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并书写了这首悲壮的词篇。

“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犹记得，谈兵虎帐，



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看槐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

在词的开篇，诗人首先通过对“英雄埋骨”的狮山的自然环境的勾勒，表达了对先烈崇敬的心情。接着用“犹记得”三字，自然带出对往事的回忆。“谈兵虎帐，三春眉月”，概括写出了自独立营成立1年多来作者和牺牲者之间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也充分表现了作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叶剑英平易近人的优秀品格以及和下属军官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以悲惋的心情追述了突然爆发的香洲兵变和在这次兵变中牺牲的烈士们。叶剑英用盛开的鲜花飘落，比喻英俊有为的爱国志士骤然遇难。“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表达了作者悲愤的心情和对烈士的深深怀念。“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诗人指出他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的历史，就是成千上万的志士仁人奋斗献身的历史；革命党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就应当不怕流血牺牲。“看槐枪满地，剪除军阀”，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斗争胜利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对死难者的告慰。“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这是对革命斗争前景的热切展望。待革命胜利了，先烈的父母每当想起亲人的牺牲，仍不免悲痛忧伤；诗人强烈地期待着胜利之日的到来，使烈士的遗孤得

到抚育，烈士的父母得到赡养，天下的穷苦人得到解放，以此酬答忠心耿耿为革命而献身的先烈。

(2) 抒发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如：《登祝融峰》、《过五台山》等。

《登祝融峰》作于1938年11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祖国北方的大好河山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借登南岳祝融主峰的机会，抒发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写下了这首五言古诗。

“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诗人在山顶眺望浩瀚的云海，俯瞰奔涌北去的湘江，感叹祖国江山是多么雄伟壮丽！然而，如不驱除日寇，这尚未沦陷的国土和世代在这土地上劳作生息的广大人民，也都不免为倭寇所蹂躏！雄劲的天风掀动着诗人遍布征尘的戎衣，阵阵涛声激荡着诗人的胸怀。这天风有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风暴，而这山涛又恰似在党领导下声势浩大的抗日洪流。此时此刻，诗人无法按捺满怀的激情，喊出了：“誓荡扶桑儿”这山呼海啸般的强音。这既有力地表示了诗人矢志救国的决心，又形象地表达了我党抗战到底的立场，同时又集中地道出了中国人民一致的意愿。

(3) 颂扬国际友谊与交往。如：《访波杂咏》（8首）、《西行杂诗》（14首）等。

《访波杂咏》这组诗作于1958年10月。

这年，为了庆祝波兰人民军建军15周年，叶剑英率中

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参加访问过程中写下了这组诗词。

组诗第一首是《菩萨蛮·华沙公园怀肖邦》：

“金黄秋色华沙好，肖邦作曲巴黎老。风柳扫残阳，搔头念故乡。春来花竞秀，遗曲人争奏。莫叹少知音，伯牙悔碎琴。”

这首词形象而概括地写出了波兰作曲家肖邦在祖国沦丧后，流落异乡的音乐生涯，表现了肖邦时刻眷念故乡，关切祖国命运的爱国情怀。

组诗第五首是《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

“毒尸四百五十万，希姆莱真野兽狂，奥斯维辛翻作教，教人团结教人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希特勒的主要帮凶希姆莱等人在波兰建立了4个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大的一个。他们采取惨绝人寰的手段，将成千上万的无辜居民（特别是犹太人）和战俘一批一批地残杀掉。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400多万人。叶剑英这首诗是对德国法西斯所犯罪行的强烈谴责和愤怒申讨，同时站在时代的高度，说明人民要永远牢记这惨痛的教训，团结，自强，以使这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4) 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如：《西游杂咏》(7首)、《十三陵水库》(2首)、《蝶恋花·海南岛》、《蝶恋花·榆林港》、《朝中措·鹿回头》(3首)、《草原纪游》(10

首)、《大庆油田》、《官厅水库》、《长江大桥》等。

1956年11月，叶剑英到祖国西北视察时，写下了《西游杂咏》这组诗歌。

第一首《甘肃》是全组诗歌的总括：“铜铁煤油遍走廊，当年人道是沙场。伫看工厂林立日，戈壁阴成瓜果乡。”作者在诗中用对比的手法深情地赞美了甘肃人民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二首《永登》是诗人对永登壮丽的大自然景色的歌咏：“拔海二千七公尺，昔日平番今永登。车上东滩滩上望，乌鞘白衣卧云天。”

第三首《武威》是诗人在旅程中途经武威的即景之作：“气压低过乌鞘岭，机车夜入古凉州。五梁故事谈遗老，西夏钟文在土楼。”诗的后句写的是武威老人们兴致勃勃地闲话五梁旧事和武威的名胜古迹的情景。

第四首《高台》是诗人对当年牺牲在高台的英雄董振堂的感怀：“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第五首为《酒泉》：“风雪关山访古来，评泉品酒看光杯。班超不解安帮计，定远端从睦远开。”前两句表达了诗人对酒泉和酒泉人民的仰慕、挚爱之情。后两句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班超只知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征服西疆民族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说明安定边远地区的确应该对兄弟民族采取和睦友好的政策，从而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和正确。



最后两首是《玉门》：“戈壁滩头建厂房，最新人物最新装。业将同位诸元素，用到和平建设场。”“引得春风度玉关，并非杨柳是青年。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前一首热情讴歌了玉门的崭新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后一首着重抒发了由于这种巨变而引起的诗人的无限感慨和赞叹。

1958年5月25日，叶剑英跟随毛泽东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时，欣然写下了《十三陵水库》诗两首。

第一首：“十万愚公势莫当，移山挡水筑堤防。朝阳赤帜平沙幕，一幅诗图一战场。”短短的四句诗，生动地表现了首都人民改造山河的浩大声势和伟大壮举，赞扬了他们那种顽强战斗、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

第二首：“万众吹呼毛主席，普通劳者出堤旁。一锄一篓成规范，创世人人动手忙。”生动记述了领袖以“普通劳者”置身群众中间，表现了领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永葆劳动人民本色的崇高形象，同时说明全国人民将以自己的领袖为榜样，人人都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献力量。

1960年7月22日，叶剑英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作了7天草原之行。7月28日，他写下了《草原纪游》这组诗，全诗共10首。作者以他那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捕捉了一些能够反映事物本质或富有生活情趣的情景，写入诗篇。组诗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有“烟突凌霄显异姿”的草原城市，也有“人工湖水与云平”的美丽边城；有“连天芳草见羊群”的牧区风光，也有“雨过斜阳

照晚红”的边陲暮景；有鲤鱼争跳、鸿雁换羽的趣事，也有夏夜草原歌舞联欢的盛会。组诗中更着意赞美的还是活跃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人人采得花盈把”的牧民姑娘，“马头琴里起雄风”的文工团员，“神枪猎得七羊还”的边防战士和“一曲民歌妙入云”的民间歌手。诗中热情歌颂了翻身牧民的幸福生活，歌颂了草原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

(5) 歌颂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如：《重读〈论持久战〉》。

这首诗作于1965年9月4日。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弗运筹。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这首诗以精炼的笔触回顾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歌颂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6) 祝愿科学、文艺工作者。如《题岳美缙同志画竹》、《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赠广西刘三姐剧团及演员》、《攻关》等。

《题岳美缙同志画竹》作于1963年6月17日。是题写在画有竹子的扇面上的。

“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它启示人们要以竹为师，胸有成竹，具有竹子那样搏

风击雨的风骨；要像竹子那样凌云壮志，高风亮节，经得起艰难困苦的考验，坚信共产主义，毫不动摇。诗人所阐明的哲理，是他自己多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自我品格的写照。在中国革命转折的重大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总是成竹在胸，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

《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这首词作于1978年3月27日。

“追科学，西方世界鞭先着。鞭先着，宏观在宇，微观在握。神州九亿争飞跃，卫星电逝吴刚愕。吴刚愕，九天揽月，五洋鳖捉。”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我国解放以来新老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济济一堂的空前的科学盛会。会议期间，叶剑英写下了这首词，既指出了我国科技发展同世界科技发展现状间存在的差距，又生动地表现了全国人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争相飞跃的革命精神。认识落后，方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诗人通过对我国成功地发射并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而使月宫吴刚惊愕的描绘，形象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但有志气，而且也有能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7) 切身感怀。如《八十书怀》、《八一年春节》等。

《八十书怀》作于1977年5月14日。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导师创业垂千古，

侪辈跟随愧望尘。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这是1977年叶剑英80寿辰之际，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欣见当时的大好形势，瞻望未来的光辉前景，激情澎湃地写下的感人肺腑的壮美诗篇。

“八十毋劳论废兴”，诗人的80个春秋，是在战斗的风雨中度过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不畏艰难险阻，风霜劳苦，顽强奋斗，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卓越的功勋。然而诗人却谦逊地认为，个人的这一切是不值得去说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人提出了一个“论废兴”的问题。这一方面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要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否则就失败，甚至历史可能出现一时的倒退。“长征接力有来人”，是诗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兴奋感情的真实流露。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毛泽东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千古永垂的，叶剑英紧跟党和毛主席，忠心赤胆，奋斗不息，为这一伟大事业历尽了千辛万苦，功绩卓著。然而他自己却认为是“愧望尘”，表现了诗谦逊质朴的崇高品德。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诗人放眼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人民群众的伟大。说明要成就



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但有力量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有力量建设一个新世界。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诗人把夕阳描绘得光华夺目，把夕阳下的山峦描绘得郁郁葱葱，生意盎然。这充分显示出“老夫”不老，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和高尚的革命晚节。

(8) 自勉自励。如：《绝句》、《松园》等。

《绝句》作于1978年5月3日。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

1978年“五一”前夕，叶剑英来到广州，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欢度佳节，并在木棉树下摄影留念。触景生情，诗人于5月3日挥笔写下了这首七绝。

“百年赢得十之八”。这80年是祖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80年，也是叶剑英寻求救国真理、参加领导中国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80年。当诗人回顾自己度过的战斗年华，联想到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怎能不感到分外自豪和无限欣喜呢？这句诗就是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

“老骥仍将万里行”。诗人自比老骥，要在新的革命征途中继续作“万里行”，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境界。

“小憩羊城何所遇”。大意是：我来到羊城稍事休息，羊

城用什么来款待我这个老朋友呢？叶剑英对广州有着特殊的情感，这句诗正表明诗人对羊城人民的那种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

“英雄花照一劳人”。木棉树被誉为“英雄树”。满树盛开的木棉花，那般红的颜色，有如烈士的鲜血染成。望着这木棉树和英雄花，怎能不令人想起为祖国和人民在这里喋血的无数革命先驱呢？如今，叶剑英站在这象征着广州光荣革命传统的木棉树下，摄影留念，缤纷的英雄花映照在他的身上。这对诗人来说，是多么丰厚的礼遇！

这首诗表述了诗人的革命心志和宏伟抱负，抒写了广州的革命先烈和英雄的人民对自己的激励。从中可以看出叶剑英时刻以“普通劳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的高尚品质和谦虚谨慎、奋斗不息的精神。

叶剑英创作的革命诗篇，内容是很很多的，这里只反映了一部分。读了这些光辉作品，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远大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他们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向前！

# 延安整风前后的张闻天

程中原

## “还帐”与“补课”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把主要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在党中央领导下，无论是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干部教育、理论宣传、文化运动以至普通教育，都按部就班地逐步开展起来。张闻天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但也没有发现党内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则不同，他高瞻远瞩，看到在党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其根源就在于思想作风的严重不纯。

诚然，遵义会议批判并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并纠正了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以往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是非没有分辨清楚，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指导思想上又会产生分歧以至对立，在另一种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就是说，从遵义

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上批判并纠正左倾或右倾错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必须端正思想作风、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特别是在当时日寇向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抗战形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大批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党内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好思想路线和作风的问题，要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将是不可能的。

严重的突发事件，尖锐的党内矛盾，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阴谋策划了“皖南事变”。导致新四军皖南部队主力几乎全部覆灭这样惨重损失的内部原因，正是项英犯了右倾错误。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新四军有功绩，他的失败（他本人在突围后遇害），说明已被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甚至在某些地区还严重地存在。

王明在延安，问题就更为突出了。王明与博古同为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给予党和革命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者；王明又是抗战初期提出右倾投降主义并在长江局推行右倾错误造成严重损失的主要责任者。可是，他从1938年底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两年多来不仅始终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反而坚持错误，甚至将错误说成正确，还进而攻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实际



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抗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1939年5月，王明撰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1939年6月，他又将1938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改题为《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刊载，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特别严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将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版书名为《两条路线》）一书第三次出版。1940年11月，他又在《共产党人》第12期上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大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点不作自我批评，俨然以“国际路线”正确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面坚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并兜售自己的错误理论，另一方面又诋毁、攻击毛泽东的著作。他说，《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王明宣扬的观点和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挑战，它尖锐地提出了怎样看待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战初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怎样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澄清，不解决，就无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就无法“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条件实现。

张闻天负责干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届六中全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经中央讨论通过，得到毛泽东同意。可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干部教育中确实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张闻天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中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并专门写文章提倡过这个方针，可是，从“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样的要求来看，也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残余。而追根溯源，学风上的问题正是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毛泽东面对当时这样的情况，即“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sup>①</sup>，遂于1941

---

<sup>①</sup>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194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年春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并由此开始，从上而下，逐步在全党发动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为出版他的旧作《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sup>①</sup>。接着，毛泽东5月19日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批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都是极坏的作风；“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倡导树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sup>②</sup>。此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中间，自然地引起了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是否正确，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张闻天竭力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进，1941年6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文件《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至803页。

毛泽东领导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及其思想根源问题，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并于1941年9月10日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0月22日结束）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9月10日会议开始时作重要报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他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张闻天听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之后，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痢痢头给人家看。”除了“还帐”即“清算”历史错误之外，张闻天还就怎样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提出“补课”的要求。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



在要补课。”<sup>①</sup>

从九月政治局会议起，张闻天停止了自己的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及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自己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观念此时在张闻天心中建立起来，张闻天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感觉也从此时发展起来<sup>②</sup>。在9月29日的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系统发言，确认土地革命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错误，明确地承担责任。他说：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

---

① 《张闻天选集》，第313页。

② 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已发生了“左”的错误<sup>①</sup>，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有这样有力的发展<sup>②</sup>。

张闻天是从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中首先觉悟而分化出来的成员。他在遵义会议前就同左倾的中央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遵义会议上为结束左倾的统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遵义会议以来，又坚持了正确路线，立下了大功。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居功诿过，掩盖历史上的错误。对于1931年初至1934年底期间的错误，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洛川会议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他一再进行过检讨，以期记取历史的教训而避免重犯。只是受环境与认识的限制，在这之前，没有认识到是政治路线

---

① 关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发展的过程，全党有一个认识过程。1941年10月13日组织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为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说：四中全会虽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认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萌芽或胚胎”；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或出胎”。这些观点反映了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看法。张闻天发言中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时间的看法同这次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

② 《张闻天选集》，第314页。

的错误。经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明，张闻天即诚恳地承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并承担错误的责任，深刻地检讨错误的根源。不仅如此，张闻天还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且明确表示离开中央机关，到下层去做实际工作的愿望。

## 陕北、晋西北调查

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整风的号召，张闻天在参加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下决心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9名干部（包括张闻天夫人刘英），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由张闻天担任团长，前往农村调查。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率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送行至道旁。

张闻天最初选定的调查研究地区是晋西北<sup>①</sup>。这一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北起左云、右玉，南至汾阳、离石，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根据地。这里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四大动员”（又称“四大号召”，即动员

---

<sup>①</sup> 晋西北区是晋绥边区的前身。1940年2月党中央指定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同时，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张闻天离开晋西北，时在1942年9月11日，故本文均称晋西北。

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大军队)等抗战时期的农村政策,因而比陕北老根据地更有普遍意义。调查团离开延安后即向山西进发,张闻天用的化名就叫“张晋西”。

调查团经延川、清涧,于2月2日到达绥德。这里是三五九旅的驻地,旅长王震对张闻天很敬重。当时住房条件差,王震把自己住的窑洞让给他,他执意不肯。经再三劝说,他才勉强答应,还笑着吟诵《诗经》上的两句诗说,这才真是“唯鹊有巢,唯鸠居之”了。张闻天一行在这里住了3天。他同王震、袁任远、苏进等同志推心置腹地交谈。谈及自己30年代初所犯错误,毫不隐讳,也没有一点消沉之意。

1942年2月14日,正是旧历除夕,张闻天一行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村渡口。这个村子颇似“塞上江南”,属于当时新设的位于神木、府谷两县之间的神府县。张闻天原打算由此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由于当时敌人的冬季“扫荡”仍在继续进行,调查团在这里过了春节以后,只得折回陕甘宁边区。张闻天率领调查团来到贺家川,这是神府中共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规;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到自然村。关于调查的对象、重心,张闻天认为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此而及上层建筑。



张闻天将调查团分成4组，在神府县直属乡调查了8个自然村：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尚家庄、西山上、路家南坨、崔家岭。张闻天亲自调查贺家川，调查很深入，统计非常具体。

4月初，各组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调查材料，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闻天综合研究后亲自写成调查报告。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sup>①</sup>。这篇调查报告在1943年10月即公开出版，全文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用确凿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1942年4月13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兴县，又因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自4月22日起即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兴县碧村及兴县范围内的村庄做调查。张闻天住在碧村对面的任家湾。张闻天和他的调查团原来只准备调查几个村子。晋西北区党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这样，兴县调查的队伍就扩大了许多，晋西北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参加进来，调查的范围为14个自然村：碧村、

---

<sup>①</sup> 《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书名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86年9月人民出版社将这篇调查报告同《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合在一起，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的书名出版，署名张闻天。

任家湾、黑峪口、唐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冯家庄、花园沟、柳叶村、碾子村、高家沟。

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订实施方案。出发之前召开全体调查人员会议，作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的报告。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着重研究土地占有变化和租佃关系。其他同志在张闻天指导下分别写出各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可惜这些材料都已亡失，估计是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

张闻天在兴县调查时还写了《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sup>①</sup>。这个研究报告大纲对这一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占有的变化、借贷关系的情况等作了分析，特别着重分析了租佃关系的变化与执行政策的状况，提出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离开兴县后，张闻天在10月7日写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出我们现时的任务，是在农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济<sup>②</sup>。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不久，敌人于1942年5月起对晋西

---

① 《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当时没有刊印。1986年9月收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题目改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

② 这篇文章题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有材料说，此文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曾经印发。1989年3月《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首次公开发表，改题为《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

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直奔晋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兴县。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争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3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神府县境。张闻天虽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却一点也不松懈。6月底，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材料分别整理完稿以后，他即有计划地在7、8两月连续召开座谈会，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阶级关系问题、土地问题、租佃关系问题、村政权工作问题等座谈会上，张闻天作了多次重要发言（留有记录者7次）。此外，还有两次正式的报告会：7月27日至30日作《土地问题研究》报告；8月30日至31日作《村政权及其他》报告<sup>①</sup>。

在第二次紧急疏散到神府县的后杨家沟村之后四五天，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的生日。为纪念党的生日，参加兴县调查的全体成员，连同驻在该村的晋西北后方机关的干部，共约六七十人，于当晚参加由张闻天在打麦场上召集的会议，张闻天发表讲话，专门论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他反复强调，21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转胜为败。他极其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21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

---

<sup>①</sup> 均见《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

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在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sup>①</sup>。

从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张闻天对毛泽东的领导是由衷地钦佩和拥护的。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时，全党整风已经开始，他注意将调查研究同整风结合起来，注意从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1942年5月7日，张闻天在晋西北区党委座谈整顿三风的会上发言，结合实际事例具体地分析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强调整风学习要“从实际工作中学习。研究二十二个文件，了解其精神，根据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他还指出，晋西北同样存在着主观主义、党八股，而且很严重。在8月31日报告中谈基层领导工作时，张闻天也指出，领导方式的严重缺点是三风不正<sup>②</sup>。

曾有人以为张闻天出发调查是为了“躲风”。其实，从张闻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可以判断，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张闻天曾说，九月政治局会议后，“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

---

① 张闻天1942年7月1日晚“纪念党的21周年”的讲话内容，有当时听讲者马洪、尚明、段云、曾彦修、雍文涛、薛光军、薛一平的回忆文章，题为《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载197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收入《回忆张闻天》一书。

② 据《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



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还说，当时“以为我好好的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接触群众，也就等于整风了”<sup>①</sup>。可见，张闻天出发调查，不但不是为了“躲风”，而且正是为了搞好整风。他在兴县将调查研究同整风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他拥护整风，用实际行动参加整风的很好注脚。

张闻天一行在晋西北调查之后，遂转回到黄河西岸的陕甘宁边区。从9月26日起开始了以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心的农村调查。

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里聚居着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最大的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是当地地主集团实际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着起自清道光25年(1845)直到眼下近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帐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帐簿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张闻天一本一本翻阅，还亲自同调查团的秘书马洪一道核算。马洪打算盘，张闻天拉计算尺（这把计算尺还是他在美国留学时买的，已随身带了十五六年），刘英帮着抄数据、材料，忙了几十天。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帐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帐本子”啊！

---

<sup>①</sup> 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在算帐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张闻天同马洪、刘英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由马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初稿，交给张闻天反复修改写定。这部《杨家沟地主调查》<sup>①</sup>，细致地解剖了马维新这个地主从18岁代替父亲管理家务起39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以及他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商号经营情况，统计出1912—1941年30年来马维新一家的收支情况，还参照其它材料统计出1894年以来近50年杨家沟一带的年成。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至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这样一种具体充实的同类性质的调查和报告，在中国是少见的。

离开杨家沟之后，张闻天在米脂县城内作了短期调查。从12月10日起至1943年1月15日，主要在绥德西郊河川地区及双湖峪（今属子洲县）作经济调查，涉及盐滩、煤窑等工业。从1月18日起至2月24日，在绥德市作商业调查。就在这时，张闻天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知。于是张闻天本人即中断调查，在1943年3月3日回延安。其他同志仍继续调查，但绥德调

---

<sup>①</sup> 《杨家沟地主调查》于1957年5月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的书名由三联书店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重版。

查搜集的材料，大多没有来得及整理。

通过陕北、晋西北调查，张闻天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实际进行了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得到关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调整办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真知灼见，有的当时就受到重视，有的以后才为人们所注意。

### 出发归来

张闻天离开绥德赶回延安，是为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于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不过，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新设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两个助理机关之一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委员<sup>①</sup>。

对于自己在党内职务的变动，张闻天安之若素。他集中精力总结1年多来调查研究的体会，于3月27日写成《出发归来记》<sup>②</sup>，作为向党中央的报告。

张闻天出发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补课”，补缺乏基层实际经验这一课。他总结1多年的调查工作，认为最重

---

<sup>①</sup>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60页。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sup>②</sup> 《出发归来记》全文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述均见该选集。

要的收获在于“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主要是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因此带有根本性质。从此，他完全地、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

张闻天体会到，只有同实际、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把握生动活跃的、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他说：“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了实际的效果”，可以拿他是否从实际出发办理一切事情这个标准加以测量。张闻天从自己到陕北、晋西北调查的实践中概括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实现自我改造的途径：首先是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然后是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他认为延安1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张闻天还进而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他从哲学的高度阐明，这个方向没有尽头，但只要努力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地体现出



来”。反之，“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张闻天认为，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于口头上是否承认和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主要看实际行动是否真能这样做。张闻天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一旦把握了真理，就身体力行去实践真理。出发归来后，他又立即投身于对陕甘宁边区工业的调查；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即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这都说明他是言行一致的真正的唯物论者。

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还结合着1年多的切身体验，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对象、原则、方法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领导干部同实际、同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是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研究；而“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是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关于调查研究的对象，张闻天指出：“‘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至于具体的调查对象的确定，张闻天提出“着重典型”的原则，即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张闻天具体阐发了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

文中对于“对立统一”方法的论述，提出“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他指出：分析与综合是一个对立统一。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在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方面，张闻天在实践中也有丰富与发展。除了开调查会之外，采取了按户调查、个别谈话、实地考察等方式，同时重视书面文献、材料的搜集。张闻天还强调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材料应经常整理，补充校正；调查初步完成，即应在当地加以研究。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闻天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接受并且阐发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张闻天参加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就在延安进行工业调查。这可以说是绥德工商业调查的继续。1943年4月20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上就“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必须明确认识“公营工厂的任务有三，即供给公家的任务，发展边区经济的任务，培养管理工厂干部的任务”（“公家”指政府和军队）。为了办好公营工厂，张闻天提出，必须把统一供给、统一定货及分散制造的原则确定下来，以解决供、产、销的矛盾；必须改变工厂是行政机关供给部门的性质，实行“经济核算制”，计算成本与利润，定出各种指标，使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价廉物美”；必须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在厂长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地为完成生产任务奋斗，反对同厂方对立的经济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

义的偏向。他特别指出，工厂内党和工会的工作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内容”，党和工会的教育与活动必须“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否则应该停止。5月9日，张闻天还给难民工厂写信，号召参加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赵占魁运动”。张闻天的讲话和信先后发表在1943年5月1日和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对边区国营工业贯彻整风精神，纠正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倾向，对国营工厂的改革与建设，对边区职工运动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就在公开发表张闻天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讲话同决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从1943年秋天起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张闻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和高级干部党史上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和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参加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春，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成立中央政治材料室，张闻天兼任主任。这时，他迁居枣园。工作任务不多，生活轻松愉快，闲来下下围棋，还种点草莓、西红柿之类。

1944年6月以后，筹备出版《参考资料》，张闻天亲任主编，他的秘书邓力群、徐达深做助手。他亲自动手，搞了一本大事记。每两个星期，材料室的几个同志到他住处商讨一次，议论形势，商量选题。选题商定以后，他总是亲自承担一两个题目，从收集、整理材料到起草和誊写，都自己动手。写成后送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亲自改定，一

一丝不苟。他确定将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和研究国民党分别作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重点。在这个铅印的内部刊物上，他以“记者”名义发表了亲自撰写的《最近美国对华动向》、《十二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动态》等9篇详尽的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为党中央和党内高级干部及时提供了对于国内外形势与动向的有分析的具体材料。对于其他承担选题的同志，张闻天总是叮嘱首先要占有大量确凿的材料，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材料，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切忌主观臆测，凭空推断，切忌看到一点皮毛就妄加引申。政治材料室的同志写出文稿以后，张闻天总是和作者一道反复讨论、修改，直到定稿。经过他的言传身教，政治材料室的同志提高了各自的研究水平，在研究工作的实践中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学风。

## 总结历史经验

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张闻天出席了在延安举行的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0月10日起，张闻天又开始参加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的重新学习和研究。中央组织的这次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是整风运动的深入与提高。出席“七大”的代表和高级干部700多人参加了学习和讨论。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开会进一步讨论



“六大”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检讨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4年间的路线是非。张闻天同李富春、杨尚昆、聂荣臻等编在一个学习组里，讨论的地点就在杨家岭张闻天的窑洞里。毛泽东在9、10月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次高级干部研究党史，正是按照这种方针进行的。

在这次集中学习之前，已经经过了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汇集已经先后编出，所以通过这次学习、回顾、讨论，对“六大”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非的认识与评价，就比1941年9、10月政治局会议的认识与评价更加完整、深入与全面了。在此基础上，中央要求每个“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写一份“自传”。张闻天对自己进行了无情面的解剖，于1943年12月16日写成一篇近4万字的自传，题曰“反省笔记”。笔记分10个部分：一、入党以前；二、入党；三、莫斯科学习时期；四、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五、从遵义会议到十二月会议前；六、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七、从六中全会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八、出发一年；九、一九四三年；十、最后的几句话。

张闻天的这篇笔记，后来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

记》<sup>①</sup>。在笔记中，张闻天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几乎绝口不谈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而对于自己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发、批判，毫不含糊地承担应负的责任，表现了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在“笔记”中，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他都负责地一一说明事实的真相，客观地评价其功过是非。这篇“笔记”，既是张闻天从自我批评的角度写出的一部自传，又是从一个重要领导人的侧面反映党的曲折发展历程的珍贵史料。

张闻天写完这篇“笔记”之后，便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过目。毛泽东看后立即到张闻天的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sup>②</sup> 1943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明确指出：“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sup>③</sup>。这些论断，包含着对张闻天历史功绩的肯定，也包含着对张闻天的自我

---

<sup>①</sup> 这篇笔记的部分内容以《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为题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称这篇笔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sup>②</sup> 访问刘英谈话（1985年10月22日）。张闻天在1969年6月28日写的一份材料中也提到，他的“口头和书面检讨，在‘七大’上也作了自我批评，都得到过毛主席的鼓励”。

<sup>③</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博古不久也有了转变，1944年5月19日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批评精神及整风笔记的肯定。

对于两条路线学习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参加了这些讨论。1944年3月，政治局对几个重要问题，如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关于党的“六大”的评价问题；对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分析；关于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等，作了结论。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就路线学习、时局和作风问题作讲演（两次讲演后来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结论，对自1941年9、10月政治局会议开始的几次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和1943年10月起进行的全党高级干部的两条路线问题学习、讨论作了一个总结。持续将近4年的党史中两条路线问题的讨论，使全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达到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为1945年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作了重要的准备。

本来，在1941年9、10月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中央就组织了“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并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

案》)①。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内高级干部尚未深入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结论草案》也有待充实、修改，所以就暂时搁置起来了。到了1944年春天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对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结论以后，党中央又重新提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为：任弼时（召集人）、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补了秦邦宪。从5月21日起，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从此时开始，《决议》的起草工作经过了将近1年。直至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在毛泽东本人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完成的一个集体创作，张闻天作为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准备委员会的成员，认真参加了总结历史经验的讨论，他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他曾对历史决议的某一草案稿进行了修改，使之成为后来通过的《决议》的基础。毛泽东在1945年春对《决议》草案稿的修改，就是在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

---

① 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于1941年10月13日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5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委托王稼祥起草文件。档案中存有当时起草的文件，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结论草案》。



上开始的<sup>①</sup>。

从现存《决议》的有关档案来看，张闻天动笔修改《决议》稿是在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阶段以后。在这之前，任弼时在1944年5月起草过一个稿子，这个稿子主要来源于1941年的《结论草案》，在结构、内容和文字上，与《结论草案》基本相同。在“任稿”之后，有一份胡乔木起草的《决议》草案稿。此稿共4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和第三个问题（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根源）一些基本思想也是来源于《结论草案》。在结构和写法上，“胡稿”与“任稿”有较大不同，主体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接近后来的《决议》。任弼时对“胡稿”修改过两次，主要是集中了集体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提纲式的7个要点。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工作情况和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可以认定这7点意见显然是集中了集体讨论中提出的意见。

张闻天的修改是在这之后进行的。档案中有一份张闻天修改的稿子，他修改所用的底稿是毛笔抄写的（其中只有两页例外，是“胡稿”的复写件），没有题目。可惜的是，档案中所存的张闻天修改过的这份文稿不全，缺后半部分，只有前面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概述了1924年第一次国

---

<sup>①</sup> 见冯蕙的两篇文章：《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经过》（《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2期），《再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经过》（《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共合作至 1937 年抗战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党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在这个问题的末尾，张闻天加写了 3 段话，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充分的评价。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一段：“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第二个问题，叙述大革命失败到抗战爆发这一期间党的历史，讲到了八七会议、1927 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张闻天在末尾也加了一段话，指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已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第三个问题，讲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的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 4 个方面分析的写法，而是综合地讲 7 点，基本上是按照提纲式的 7 个要点写的（后来还曾有稿子增加为 8 点）。对这个问题，张闻天作了较多的修改和增补。

张闻天修改过的稿子有一个抄清件，共 5 个问题，包括了张闻天修改稿手迹所缺的第四个问题（第三次左倾路

线的社会根源)和第五个问题(克服党内错误的态度和方针)。至于在这两个问题上,张闻天作了哪些修改和增补,因材料缺失,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所讲的5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后来《决议》的(二)、(三)、(四)、(五)、(六)部分。

1945年春天,毛泽东在“张稿”上亲自动笔修改。他把题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内容、结构、文字先后修改了6次,补充了重要的内容,增写了《决议》的第一部分,将第六部分最后两段独立出来成为第七部分,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重新改写,将原来讲的8点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组织、思想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到7月24日的印稿又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成为4个方面)。其间,毛泽东在作了第二次修改后于1945年3月24日在稿子首页上写了一个短筒给任弼时:“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可见,张闻天在《决议》最后定稿阶段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张闻天对于毛泽东从1941年到1945年通过整风解决党内历史问题的的工作非常佩服。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来采取郑重与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不为自己的与群众的一时的感情冲动所支配;他善于调查研究,善于吸收各方面关于某一

个问题的各种意见，而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他善于反复考虑一个问题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权衡其各个方面的轻重，并且善于等待其成熟后，然后加以处理。这次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的经过，就是他怎样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方法的范例<sup>①</sup>。

###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4月21日，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毛泽东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号召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张闻天被选入“七大”主席团。预备会通过的“七大”主席团由以下15人组成：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任弼时。

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毛泽东在24日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5月2日的全体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着重论述毛泽东政治报告最后

---

<sup>①</sup> 洛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草稿》（1945年5月2日），第13至14页。



一段关于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sup>①</sup>。

张闻天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以错误的教训，说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对于党与中国革命，会起一种怎样的破坏作用”；张闻天又说明，“遵义会议后（实际上我从长征开始，即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中央内部反对当时中央的另一部分同志的军事路线），一般说来，我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故没有发生路线错误。”张闻天实际上以亲身经历的遵义会议前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生动、具体地论证了毛泽东代表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作风，是领导党和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作风；党内同左倾错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我们党的车子就不能继续前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张闻天向“七大”全体代表坦诚地叙述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切身体验及思想转变过程中的痛苦历程，说明“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慢慢的在斗争中占了上风”。他通过两种思想作风的对比，深刻地分析了小资产阶

---

<sup>①</sup> 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弱点：一是“骄傲”，一是“轻浮与急躁”，其本质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作风，它无限深刻而同时又是无限浅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全部精神，就是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向人民负最后和最大责任”的精神。张闻天指出，把握这种精神，建立群众观点，是我党当前的迫切任务。能够这样做了，“那末，我们的骄气就可消失了，轻浮与急躁的态度就可改正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就可没有了”。张闻天表示：“我以后必须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以达到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

张闻天这篇发言，不仅又一次虚心诚恳地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不仅对自己3年来参加整风运动的收获和体会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而且以切身的体验，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地解剖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阐发毛泽东代表的党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全党3年来的整风运动也给予了科学的概括与评价。

张闻天在“七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大会代表的欢迎。毛泽东在5月24日的大会上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我们大会同志都一致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周恩来和张闻天。

毛泽东在大会《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还明确地

肯定了张闻天以及其他犯过路线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的历史功绩。他说，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5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10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4个，25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这样一个中央，我们和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10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个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帐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的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中全会，大家晓得，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局面不会有这样大。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说，如果对放手动员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惧，把自己束缚起来，甘心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今天的局面就不相同。六中全会是什么一些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个路线的赞

助、主张，六中全会不可能纠正那个偏向<sup>①</sup>。毛泽东在6月10日的大会上，因王稼祥在前一天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没有当选，所以特地向代表们讲王稼祥的功劳，“希望大家选他”。讲话中又一次肯定张闻天的功绩。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人。”<sup>②</sup>

在1945年6月9日“七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张闻天以较多的票数当选，成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44名正式委员之一。“七大”闭幕后，在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张闻天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

① 据档案。

② 毛泽东：《关于王稼祥的评价》，《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

许翰如 仲秋元 梁泽楚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一条重要战线。这段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它是五四运动以来，广大革命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以文化艺术为武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真实记录，是展现文化战线经过艰难曲折斗争而取得的丰盈灿烂的史迹，也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我们党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文化军队所创造的累累硕果。这支文化军队和手里拿枪的军队一样，历尽千难万险，披荆斩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过严酷的考验而成长壮大起来，它积极有力地配合了弥漫着硝烟炮火的军事战线，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1919—1924 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革命文化运动新纪元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

泛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化史新的一页。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史料中追溯历史的源流，可以寻觅出历史的轨迹。

五四运动前，以上海、北京为中心发轫的新文化运动，使许多有识之士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在北京与李大钊创办白话周报《每周评论》，他们团结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倡导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组织社团宣传进步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同溟蒙中的一炬火光，照亮了人们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劫难之中的前进道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热情满怀地撰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著作。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首次以他的睿智和胆识较完整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鲜明地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著名论点。鲁迅发表《圣武》一文，赞扬俄国革命为：“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各地先后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翻译著作。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还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天津等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马列主义学术团体；

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周恩来在天津成立觉悟社并创办《觉悟》杂志，深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基础上，又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远在海外的旅日、旅欧的革命者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出版了陈望道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全译本；同年11月又创办了由李达任主编，于全国秘密发行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还出版了以工人为对象的《劳动界》、《工人月刊》等通俗读物。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如同春笋破土而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这为革命文化工作开辟了新的局面：党的一大通过了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建立中央出版发行机构，创办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机关刊物《先驱》；由党创办的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党团工会以及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亚东图书局、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马列著作、进步文艺书刊；瞿秋白访问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罗斯后写的著作《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也相继出版。

戏剧演出产生了新文明戏，陈独秀、周恩来等撰写了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茅盾、柯一岭等在上海组织了“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它为人们提供了谈论戏剧问题的园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研究戏剧运动的刊物。

这时还出现了鞭挞时弊、启迪思想和鼓舞斗争勇气的政治时事漫画和传单。如漫画《京汉工人流血记》刊登了“二七”大罢工中流传的诗歌：“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颈可断，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消灭，劳苦的群众们，快起来团结！”陈独秀、鲁迅等还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有关美术革命的文章。

虽然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反动势力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迫害和摧残，但注入无产阶级革命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却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漫布山野的青青幼草，在焦土之中顽强地生长和繁衍。1922年，李立三在工人学校教唱《工农联盟歌》；瞿秋白译改的《国际歌》的发表，犹如狂飙席卷大地，在安源、开滦煤矿以及海员、铁路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无数工农群众高唱革命歌曲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 1924—1927年

### 大革命高潮中奋勇前进的革命文化工作

1924年，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召开“一大”，



孙中山宣布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这不仅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也给革命文化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我党加强了自身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出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号召共产党员深入工农群众、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革命启蒙教育；组建党中央机关报编委会；创办党的第一张通俗报纸——《热血日报》；成立中央出版部并筹建长江书店、崇文堂印刷所，出版我党领导的各种报刊；各地党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农会出版了《政治生活》、《战士》、《人民周刊》、《中州评论》、《青年工人》、《平民之友》、《农民协会》等刊物。毛泽东主办农讲所时还亲自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除此之外，还有进步人士编印的《中国青年》、《中国学生》、《少年先锋》等刊物。

与此同时，我党与国民党合作出版了《政治周报》、《新民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松江国民日报》、《湖南民报》等等，这些报纸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各地国民党省党部主办，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六如、李维汉、董必武、茅盾、谢觉哉、侯绍裘等任主笔、主编或经理。

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作家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他们创作了优秀的文学、杂文作品，并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鲁迅支持并领导成立了文学团

体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出版了《语丝周刊》、《未名丛刊》、《莽原周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建立了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和《创造》月刊。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以满腔激愤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执政当局的血腥罪行。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进步图书，并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编辑出版了一套《国民丛书》。郭沫若发表了引人注目的《革命与文学》的文章，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正当农民运动日益深入，斗争十分激烈尖锐的时刻，毛泽东于1925至1927年相继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大革命时期各阶级的现状和农民运动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赞扬农村的群众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这两篇重要文章，登载于《中国农民》、《战士周报》等刊物上。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革命文化也在大革命浪潮中奔涌向前。除了正蓬勃发展的印刷出版业，其它各类文学艺术活动也异常活跃。在1922年省港大罢工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鼓动宣传教育作用的歌曲、诗歌、漫画、戏剧等文艺作品在大革命高潮中大量涌现出来，并发挥了显著的战斗作用。革命歌曲《国民革命歌》深受士兵、群众喜爱，流传甚广。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流行一首《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民歌：“天不怕，地不怕，哪怕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老虎凳，绞刑架，我倔咬紧钢牙。阴沟里石头要翻身，革命的种籽发了芽。折下骨，当武器，不胜利，不放下。”作家蒋光慈也在此时创作了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小说《短裤党》。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苏联电影导演B·A·史涅伊吉洛夫、雅可夫·布里奥赫等电影工作者先后来华拍摄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新闻记录影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和《上海纪事》。

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大江南北。正当北伐军所向披靡，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和北洋军阀政府同时把屠刀挥向革命队伍，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查禁进步书刊，发布捕杀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密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萧楚女、邵飘萍等文化战士惨遭杀害。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屠刀下，革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以笔代枪投入战斗，强烈声讨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出版了《讨蒋特刊》。郭沫若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即愤笔发表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胡愈之、郑振铎等联名给国民党写抗议信，怒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大革命高潮中的革命文化工作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1927—1937 年

## 十年内战中革命文化工作的艰难斗争与发展

十年内战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也是革命文化处于艰难发展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创建的红色区域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对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进行残酷的“文化围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我党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党领导进步文化工作者巧妙地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继续坚持文化战线的斗争。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同年8月发出第4号通告，制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方针；1928年8月和1929年6月中共中央六大以及六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宣传工作决议案。

此时，革命虽处于低潮时期，但革命的出版工作并没有“歇业”。我党出版了秘密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1933年2月出版了《斗争》；创造社继《创造》月刊后又出版了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蒋光慈、钱杏邨等成立太阳社并出版了《太阳月刊》；还有《幻州》、《战线》、《畸形》、《我们月刊》、《洪荒》、《流沙》、《日出》等刊物也相继出版。这些刊物积极倡导文学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发表文艺作品，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一些有影响的进步戏剧团体，如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应云卫领导的戏剧协社，朱禩丞、罗鸣凤领导的辛酉剧社，陈白尘、左明、郑君里等组织的摩登剧社，夏衍、冯乃超、郑伯奇等创建的上海艺术剧社，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先后演出了《生之意志》、《苏州夜话》、《炭坑夫》、《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西线无战事》、《卡门》、《马特加》、《回声》、《阿珍》、《娜拉》、《怒吼吧中国》等戏剧，成为沉闷的政治空气中不时开放的朵朵浪花。

进步美术也日趋活跃。鲁迅、柔石等在上海创建了我国最早介绍版画的团体——朝花社，出版了《朝花月刊》。各地区进步美术社团也相继成立，积极开展反映人民群众苦难生活和顽强斗争的美术创作活动。

国民党政府对这些进步的革命文化活动横加阻挠和限制，相继颁布了《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条例，戏剧审查委员会颁布了有关审查规则，妄图扼杀进步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在太阳社、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持贬低甚至否定的态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将鲁迅等作为异己力量加以攻击。党中央发现后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周恩来、李一氓、潘汉年和成仿吾等对此进行了调查了解。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指派共产党员参加创造社等文

学团体，以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经过党中央一系列有效的工作，创造社、太阳社部分成员停止了同鲁迅的争论。

在此期间，鲁迅和革命文学工作者对于鼓吹文学上的“唯艺术论”和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月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并征得鲁迅的同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革命文学运动中一些方向性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宣言，确定了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瞿秋白到上海后，与左联取得了联系，建议左联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为左翼文化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中国电影领导小组、中国左翼音乐小组等组织也相继成立，并建立了领导机构，创办了宣传马克思文艺理论和发表各类战斗性文艺作品的刊物：《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化月报》、《文学》等。左翼进步文化工作者各个联盟的成立，增强了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团结，进一步协调了对敌斗争的行动，革命文化工作又日渐兴盛起来。对此，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培植一批御用文人竭力宣扬封建文化和法西斯文化，与左翼文化运动相对抗。同时颁布反动法令，禁止出售进步

书刊，查禁、捣毁进步书店，下令通缉、逮捕、监禁、杀害进步文化工作者。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5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秘密杀害。作家应修人与敌人搏斗时坠楼牺牲。这些史实既反映了我们党及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艰难斗争，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摧残进步文化运动的反革命面目。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后，为反对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团结抗日，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等作家发表抗议日军侵占东北、进犯上海告文艺青年书、告全世界书和宣言。鲁迅的杂文集、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蒋光慈的《一个女性的自杀》、柔石的《二月》、巴金的《死去的太阳》、老舍的《二马》、丁玲的《在黑暗中》、张天翼的《畸人集》、黎锦明的《烈火》、郭沫若的《前茅》、朱自清的《背影》、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萧乾的《篱下集》等左翼文学作品，以及具有广泛影响的艾思奇、李公朴的《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都于此时冲破“文化围剿”的藩篱而陆续问世。

左翼美联的画家勤奋创作，涌现出大批反映人民呼声的进步美术作品；如《到前线去》、《言论自由》、《贫困》、《斗争》、《不愿做奴隶的妇女》、《负伤的头》、《她的觉醒》、《帝国主义的汉奸》等。此时还出版了鲁迅编选的《木刻纪

程》、《无名木刻集》等等。

左翼音乐家深入工厂、女工夜校开展民众歌咏活动、教唱聂耳、冼星海等创作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抗敌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旗正飘飘》、《毕业歌》、《救亡进行曲》、《开路先锋》、《青年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新编九一八小调》、《心头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上起刺刀来》等爱国歌曲。一些音乐出版物，如《中国呼声集》、《民众歌声》、《大众歌声》、《民族呼声集》、《叱咤风云集》、《抗战歌曲集》、《民众歌咏集》等，为千百万群众提供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抗日救亡歌曲。

舞蹈艺术家吴晓邦在上海创作演出了《送葬曲》、《浦江夜曲》、《傀儡》、《和平的幻想》、《吟游诗人》、《爱的悲哀》等舞蹈。

左翼剧联领导下的剧社以及各地戏剧组织演出了《雷雨》、《回春曲》、《钦差大臣》、《醉生梦死》、《赛金花》、《罗密欧与朱丽叶》、《武则天》、《原野》、《太平天国》等大量戏剧。夏衍、钱杏邨、阳翰笙、田汉和郑伯奇等人进入电影界后，使电影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明星、联华、艺华、电通等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出一批进步影片：《春蚕》、《时代的女儿》、《狂流》、《女性的呐喊》、《压迫》、《铁板红泪录》、《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的女性》、《共赴国难》、《奋斗》、《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吼》、《挣扎》、《桃李劫》、《夜半



歌声》、《迷途的羔羊》、《生死同心》、《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等，进步电影已成为银幕上的主流。影片《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已为千万人民广泛传唱，成为大家奋起抗日的共同心声。

左翼出版事业虽屡遭查禁，但仍有很大发展。其中尤以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新生》、《大众生活》等刊物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出版的书刊影响最为广泛；党秘密建立的上海华新书局、天津华新印刷厂、浦江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秘密出版了伪装发行的进步书刊。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中国人民中长期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为迎接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适应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文化界在组织动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产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郭沫若、茅盾等著文，正确阐述了二者的关系；鲁迅也发表文章，全面地分析两个口号，并郑重指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通过争论，大家逐步统一了认识，也深化了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重心

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爱国的文化工作者，1936年春，“左联”宣布解散。同年9、10月间，鲁迅、郭沫若、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洪深、林语堂、茅盾、陈望道、夏丏尊、周瘦鹃、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傅东华、郑振铎、郑伯奇、黎烈文、赵家璧、丰子恺等21位作家签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化界在抗日救亡新形势下的大联合、大团结。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救亡组织相继成立。绥远抗战爆发后，陈波儿在上海组织率领妇女儿童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以鼓舞士气。

1936年10月19日，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在上海病逝。全国广大人民深为悲痛，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特致唁电，上海各界人士和革命群众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悼念送葬活动。数以万计的送葬人群高唱挽歌及救亡歌曲，掀起了一股表达人民抗日救国心愿的热潮。

十年内战时期，苏维埃区域的革命文化有很大的发展。

在苏维埃区域，党、政府和红军都为开展革命文化工作做出决议，发布指示，并创建宣传出版机构、剧团和俱乐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色文化运动，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初期建设。

在苏区建立的专业文化团体有八一剧团、工农剧社。沙可夫等油印了几十种剧本，以活跃戏剧演出活动。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演出了大型话剧《黑人吁天录》、《最后的晚餐》；为庆祝8月1日定为建军节，演出了大型话剧《八一南昌起义》，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演出了四幕话剧《庐山之雪》，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等军团领导人都参加了演出。1933年苏区成立了兰衫剧社（后改为苏维埃剧团），开办了训练班培养艺术人才。瞿秋白返回苏区后，将短训班改为培养艺术人才的正规专业学校，成立了由李伯钊任校长的高尔基戏剧学校。瞿秋白主持制定了《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在险恶环境和频繁战斗中创作了《西江月·井冈山》、《赣南游击词》等众多诗词，抒发革命豪情，极大地激励了红军和苏区人民。

红军歌曲以及注入革命内容的山歌、民谣成为中央苏区人民爱唱的红色歌曲，如《我为穷人打天下》、《盼红军》、《恩人毛委员》等。兴国被誉为山歌的故乡，脍炙人口的兴国山歌更是人人争先传唱。有歌必有舞，舞中必有歌，这已成为活跃苏区人民文化生活不可少的一种形式。闻名苏区的三大舞星李伯钊、石联星、刘月华对开展苏区舞蹈活动起了重要作用。李伯钊是红军舞蹈的积极传播者，她把外国舞蹈《国际歌舞》、《乌克兰舞》、《海军舞》介绍到苏区，与石联星等人共同创作了《中国农民舞》、《工人

舞》；组织了有来自各区乡农民群众参加的万人灯会，表演《龙灯》、《马灯》、《船灯》、《茶灯》、《狮子灯》、《鲤鱼灯》等20多种彩灯舞。苏区的专业和业余舞蹈工作者也共同创作了不少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如《送郎当红军》、《刺刀舞》、《大刀舞》、《马刀舞》、《儿童舞》、《战地演出》、《打破旧世界》、《分田歌》等等。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美术宣传工作者利用简单易行的政治宣传画、漫画、壁画等进行革命宣传。廖承志、黄亚光、农尚智、胡烈等创作了《挣断枷锁》、《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漫画。

在苏区和红军中，开展群众性俱乐部活动较为普遍，虽设备简陋，但群众十分喜爱。毛泽东很关心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为此专门作了指示。

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建立了出版局、总发行部、党报编委会等机构，出版了《红色中华》报，编印了许多书刊。鄂豫皖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南方游击战的部队都开展了群众性的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鼓词、美术等创作及演出活动，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红军撤出苏区，开始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保留下来的文化史料有战士宣传队的快板、鼓词、标语，毛泽东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抄件）、《七律·长征》诗词，萧克《北渡金沙江》手迹，贺龙赠中甸归化寺红布匾，朱德总司令签发的布告，黄镇创



作的《中央红军过泸定桥》、《红军过雪山》、《夜行军中的老英雄——林伯渠》等绘画作品。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宣传领导机构，《红色中华》报复刊，其它各种书刊陆续印刷出版。戏剧音乐活动也逐步开展起来。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随着著名作家丁玲等陆续来到陕北也日趋活跃，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讲话。红军剧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积极创作、排演剧目。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苏区后撰写出版了《西行漫记》，轰动了世界。此时大型回忆录《红军长征记》也正在编辑出版工作，毛泽东、杨尚昆非常关心该书的出版，发去了信函和电报。

## 1937—1945年

### 抗日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起草了宣传鼓动提纲。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夏衍，对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工作作了详尽指示和安排。1936年冬，被南京政府非法拘捕监禁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以及田汉、阳翰笙、丁玲等被释放出狱。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抗日的文化宣传活动终于取

得合法地位蓬勃开展起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战地服务队及戏剧救亡团体等相继成立，并先后出发到各地进行救亡宣传演出活动。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出版。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等地也纷纷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出版抗日书刊，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创办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大后方的革命文化运动得到了党的直接领导。当时武汉的进步文化活动极为活跃，创办了一大批进步刊物，如《全民抗战》、《世界知识》、《文艺阵地》、《妇女生活》、《抗敌新闻》、《报国月刊》、《抗战文艺》、《战时青年》、《民族阵线》、《抗战戏剧》、《时事月报》、《抗战电影》等，这些刊物连同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洛甫等著的《抗日民主的原则》等图书，都以武汉为集散地大量发行到全国各地。各界全国性的文化组织相继建立；蚁社、东北学生移动宣传团、华北青年救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友联剧社、楚剧戏曲剧团、上海救亡演剧队、孩子剧团等上百个民众救亡团体在武汉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活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武汉组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宣传厅）厅长。我党通过这一合法机构领导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运动。三厅成立后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抗战宣传周和台儿庄大捷庆祝大会。在武汉三镇的通衢街道、广场

及轮渡上，宣传员作抗日讲演；黄鹤楼悬挂起百幅抗日宣传画；10万人参加了火炬大游行，郭沫若手执火炬走在队伍前列，带头高呼：“坚决抗战，反对投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游行队伍此起彼伏地唱起《大刀进行曲》、《八百壮士》、《洪波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等激奋人心的抗日歌曲；10余家影剧院门前人如潮涌，争看《塞上风云》、《打鬼子去》、《血战芦沟桥》、《汉奸末路》、《岳飞》、《木兰从军》等抗战话剧和戏曲；各处揭露日寇暴行的抗日宣传材料吸引了广大观众。不久，三厅又举办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救国献金活动，在世界大戏院等地设有20多个固定及流动献金台，前来献金者有工人、农民、店员、士兵、华侨、儿童、妇女、乞丐、文艺工作者、人力车夫等，人们从早到晚川流不息，争先恐后为抗战捐献纸币、铜钱、衣物、药品、首饰、金银制品等，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

为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三厅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收编），还有漫画宣传队、电影放影队，组织了10个民间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6个楚剧宣传队，先后深入四川、湖南等地或奔赴前线进行抗战宣传工作。第三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等影片。著名荷兰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来武汉拍摄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周恩来致信郭沫若嘱三厅予以支持协助。

在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武汉文艺界举行了纪念会，郭沫若、胡愈之、冯乃超、周恩来、博古、田汉等先后讲话。周恩来为纪念会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地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革命圣地延安是革命文化运动的灯塔。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开展文化工作的指示和决议；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组织；延安中央剧团、烽火剧团、民众剧团以及各个音乐、美术团队深入农村或分赴晋西北、冀鲁豫、晋察冀前线进行创作、演出活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著名文化工作者，如丁玲、周扬、艾思奇、吕骥、张庚、冼星海、陈波儿、贺绿汀、李初梨、欧阳山、草明、萧军、陈荒煤、艾青、周立波、刘白羽、林默涵、周巍峙、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古元等纷纷奔赴延安。在延安成立了以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毛泽东为欢送该团赴前线工作作了指示。

陕甘宁边区的出版事业日益发展。《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成立了解放社，出版机关刊物《解放》和党中央政策文献、毛泽东著作、马列主义著作。此外，还出版了各种刊物，如《八路军军政杂志》、《团结》、《边区文化》、《文艺战线》、《前线画报》、《山脉诗歌》、《大众文艺》、《中国文化》、《歌曲月刊》、《中国青年》、《中国妇



女》，以及文学、戏剧、诗歌等书籍。新华书店亦于此时创办，开展书刊发行业务。

为培养抗战艺术工作干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7位领导人联名发表《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发表成立宣言。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参加该院的成立典礼，并于5月中旬给师生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谈到文艺队伍的团结问题，深入生活的问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等等问题，给鲁迅艺术学院指明了教育方针和文艺工作者应遵循的方向。冼星海来延安后，与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合作创作了著名大型合唱歌曲《黄河大合唱》。鲁艺师生首次演唱后，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此甚为赞赏并予以高度评价。此后，《黄河大合唱》即飞越千山万水，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宣传团队演唱不衰的曲目。

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讲话，并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中华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延安此时又涌现出大批文化艺术组织：西北文艺工作团、抗大文艺工作团、青年艺术剧院、评剧团、烽火剧社、延安电影团、陕北公学剧团、联政宣传队、延安鲁迅研究会、边区文协诗歌总会、山脉文学社、陇东剧团、业余杂剧团、民

众娱乐促进会等，它们犹如灿烂的山花开遍了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原。

1942年5月，延安文艺界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党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使中国革命文艺从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解放日报》发表了《讲话》全文和社论，中央宣传部、中央总学委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和学习《讲话》的通知，陈云发表了关于学习《讲话》的文章。陕甘宁边区文艺界学习《讲话》后，掀起“文化入伍”热潮，各剧团下乡宣传演出，大力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鲁艺秧歌队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和腰鼓旱船等，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在《讲话》指引下，鲁艺师生创作了新型歌剧《白毛女》，该剧在延安演出后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群众的称颂和赞赏。鲁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艺术剧院等先后演出了《周子山》、《农村曲》、《同志，你走错了路！》（周恩来为演出此剧给作者姚仲明、导演陈波儿写了亲笔信）、《把眼光放远一点》、《丰收》、《粮食》、《前线》（苏联话剧）等剧目。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版了《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吕梁英雄传》等作品。美术方面的漫画、木刻、年画、宣传画以及民间窗花、剪纸等在延安颇为风行。中央文委和西北局还发出了《关于评剧改革的指示》，成立了延安评剧研究院，实施“推陈出新”的方针，对评剧试行改革，创作演出了

《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毛泽东看了演出后，给有关编导写了祝贺信。为推广评剧改革的成果，延安评剧院到边区各县进行了巡回演出。

在《讲话》的指引下，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各中央局、边区政府做出了关于文化工作的指示和决定。文艺协会研究了贯彻《讲话》精神的具体措施。各文艺团队、艺术院校深入生活编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文艺创作及书刊出版日趋繁荣。

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亲自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工作。《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迁渝后继续出版发行；一些进步书店和出版社迁渝后继续出版书刊，并扩大发行销售网络。周恩来曾两次会见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建议他们派人去延安、华北及苏北抗日根据地设店。

第三厅和各文艺组织迁渝后，重庆的文化工作显得更加生机勃勃。由王礼锡、宋之的等 13 名进步作家组成的战地访问团临行前，周恩来、郭沫若、老舍等前来欢送，周恩来的讲话使作家们深受感动和鼓舞。木刻界举办了第三届全国抗敌木刻展览，木刻协会被国民党当局解散后，又成立了木刻研究会。全国漫画家抗敌会也继续开展抗敌美术活动。周恩来把延安美术家的木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促进了两地之间的交流，受到重庆美术界的欢迎和赞赏。各文艺团队举办的民歌演唱会等各种抗战音乐歌咏活动十分活跃。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拍摄了《东亚之光》、《火的洗礼》、《塞上风云》（根据话剧改编）等影片。各个剧团上演了《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儿童剧）、《农村曲》（歌剧）、《扬子江暴风雨》、《雾重庆》、《国贼汪精卫》、《秋子》（歌剧）、《刑》、《名优之死》、《民族万岁》、《蜕变》、《凤凰城》、《荣誉大队》、《法西斯的丧钟响了》（歌舞剧）、《边城故事》、《乐园进行曲》（儿童剧）等戏剧，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演出了日本作家鹿地亘创作的《三兄弟》。

国民党反动派害怕革命进步力量的发展，于1940年下半年下令改组第三厅，免去郭沫若厅长职务，原三厅组建的抗日宣传团队被强迫改组，或被解散。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进一步控制文化人，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画地为牢，妄图限制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同时，对《新华日报》进行干扰破坏，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除设在重庆的总店外，分布于全国的70余所分店全遭封闭，部分店员被逮捕。国民党反动派还密函各地政府，非法取缔进步文化书刊。据1941年7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表”记载，被查禁书刊达960种之多。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为掩盖事实真相，封锁禁发新闻。《新华日报》在被开“天窗”的空白处，刊登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对国民



党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邹韬奋为生活书店被封，愤然辞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职务，出走香港。戏剧家洪深因生活贫困和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举家自杀（经抢救脱险）。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向国民党提出释放被捕人员，启封书店，解除扣寄书报等禁令；周恩来指示电影工作者转入戏剧阵地；为保护进步文化人免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大批文化人安全转移到解放区或南下香港开辟海外文化阵地。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进行了反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艰苦斗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以郭沫若为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运用巧妙的斗争方式，持续开展进步的文化活动，如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举办历史、哲学、文艺理论、时事问题讲座，著书写文章，为著名文化人郭沫若、沈钧儒、茅盾、老舍、洪深等举办祝寿会、创作经验会等。

1942年，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受到周恩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屈原》的演出，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艺和爱国民主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重庆举行的四个雾季公演中，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电剧团、中国艺术剧社等先后上演了《愁城记》、《天国春秋》、《钦差大臣》、《忠王李秀成》、《棠棣之花》、《法西斯细菌》、《结婚进行曲》、《长夜行》、《风雪夜归人》、《家》、《面子问题》、《虎符》、《北京人》、《蜕变》、《南冠草》、《杏花、春雨、江南》、《孔雀胆》、《山城故事》、《天上人间》、《猴儿大王》（儿童讽刺剧）等 120 多个剧目。在音乐方面，涌现了一批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歌曲，如《你这个坏东西》、《跌倒算什么》、《民主是那样》、《茶馆小调》等。在舞蹈方面，有吴晓邦、戴爱莲、盛婕演出的《义勇军进行曲》、《血债》、《思乡曲》、《游击队的故事》、《流亡三部曲》、《合力》、《出征》、《红旗进行曲》等等。进步的戏剧、音乐、舞蹈活动蓬勃发展，迅速占领了重庆的文艺阵地。

在文艺理论领域，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对美化特务、汉奸的反动戏剧《野玫瑰》及为适应蒋介石独裁反共的需要而宣扬法西斯唯权力意志论的“战国派”的批判。

《新华日报》用“提要”的形式介绍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反响，郭沫若、冯乃超等多次主持了学习座谈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解放日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社论，支持、指导着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运动。

进步出版事业虽屡遭国民党当局干扰摧残，但仍然在

斗争中前进。《文艺阵地》、《中原》、《希望》、《文哨》等文艺刊物以及民主党派主办的一批进步刊物有的恢复，有的创办。潘光旦、吴晗、闻一多先后任社长、罗隆基任主编的《民主周刊》在昆明创刊。群益、峨嵋、作家、文林、五十年代、中外等一批中小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的文章、剧本、诗歌以及外国文艺作品、历史著作、有关国际问题及主张民主宪政的读物，广泛传播进步文化。

1943年，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写书写文章进行批判，《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迂回方式发表文章揭露其反动思想及法西斯罪行。出版界以《曼殊小说集》、《醒世恒言》、《论说指南》、《大东亚之路》等伪装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了《评中国之命运》。

临近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对进步文化又严加摧残，颁布进一步扼杀出版事业的图书杂志补充条件和书店、印刷所管理条例，公布剧本演出审查办法，查禁书刊500余种，剧本160种。

为反抗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化的压迫，文化出版界向社会及国民参政会发出呼吁书；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和戏剧演出审查制度，并向国民党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惩办文化汉奸，挽救文化危机。1945年2月，由文化工作委员会发起，有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老舍、沈钧儒、沙千里、周谷城、冯乃超、邓初民、阳翰笙、杜国

痒、翦伯赞、谢冰心、顾颉刚、柳亚子、陶行知、马寅初、胡绳、徐悲鸿、傅抱石等 300 余人签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实行民主，建立联合政府，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派人多方追查，并下令于 3 月 30 日将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但斗争并没有停息，争取民主自由的浪潮仍以强大的声威呼啸向前。同年 8 月，重庆八大杂志《中华论坛》、《宪政月刊》、《国讯》、《民主世界》、《民宪半月刊》、《文汇周报》、《再生》、《中学生》联名发起“拒检运动”，函请国民政府明令废止“战时审查制度”，并声明不再送审原稿。成都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其它城市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响应。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这是民主运动，也是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抗战期间，由于许多进步文艺团体和文化界人士转移到桂林，因此桂林成为文化工作比较活跃的城市。周恩来曾 3 次到桂林，就党的工作和统战、文化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在桂林成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国际新闻总社；《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李宗仁等为复刊题词。广西艺术馆以及许多文艺团体的成立，促进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新中国剧社先后演出了《大地回春》、《秋声赋》、《大雷雨》、《重庆二十四小时》、《钦差大臣》、《海国英雄》、《风雨同舟》（即《再会吧香港》）等剧目。广西艺术馆、桂剧实验



剧团、国防艺术社、抗敌演剧队、铁血剧团、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在桂林多次举行演出活动。

1944年，在桂林的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瞿白音、吕复等人倡议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参加演出的有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演出话剧、评剧、桂剧、歌剧、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共计175场，观众达10万多人。同时展出了许多珍贵的戏剧资料，这是西南地区戏剧会展的大检阅。桂林的美术界也很活跃，经常举办抗敌画展、木刻漫画讲座，出版了《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漫画专刊》等刊物。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也蓬勃发展，桂林曾举办了有万人参加的抗战歌咏大会，创办了《每月新歌选》、《音乐阵线》等刊物。

桂林的出版事业也十分发达，进步书刊销行内地、港、澳、南洋等地。一部分进步文化人抵桂后，办起不少书店和出版社，如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开明书店、广西妇女社等共180多家，出版刊物有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和《文化什志》、《戏剧春秋》、《国民公论》、《野草》、《文艺阵地》等近200种。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其它省市，进步的文化运动也在艰难的斗争中前进。

云南成立了文艺界、戏剧界抗敌协会。新中国剧社、云南农民花灯剧团、西南联大学生剧团、昆华新剧社、戏剧音乐教育队、四维儿童剧社等演出了《阿Q正传》、《风雪

夜归人》等戏剧。在出版方面，除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昆明设有分店外，云南地下党创办了云水出版社，李公朴开办了北门书屋，还有华侨书店等，均出版销售进步书刊，传播抗战进步文化。

在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党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开展新疆的进步文化工作。杜重远、茅盾、张仲实、赵丹等一批进步文化人来新疆后，文化工作日趋活跃。成立了新疆各族文化促进会、维文会、塔文会；戏剧演出有《古城的怒吼》、《心防》、《佃户》、《三江好》、《最后一计》、《前哨》、《血祭九一八》、《打日本》等抗战救亡话剧，也曾演出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于伶、曹禺等创作的剧目，对新疆的戏剧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歌舞演出很普遍，维族舞蹈家康巴尔汗演出的《大坂城》、《那孜库木》、《阿拉木汗》、《黑走马》、《木都格拉提》等舞蹈很受群众欢迎；以杜重远为院长的新疆学院，戏剧歌咏活动十分活跃，学生排演了《战斗》等话剧，下乡教群众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刀进行曲》、《反帝军军歌》等抗战歌曲，使振奋人心的歌声传遍天山南北；画家在新疆举办了美术作品展览，出版画报画刊；进步文化工作者不仅创办汉文刊物，也办维文刊物，翻译出版了马列著作等书籍。

对于迪化和新疆三区的进步文化运动，国民党政府同样进行扼杀和破坏。军阀盛世才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之时，与蒋介石相互勾结，撕下他伪装进步的面目，大肆拘

禁、逮捕共产党人以及来新疆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各族劳动人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等惨遭杀害。林基路被囚禁时，谱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囚徒歌》：“……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与新疆相邻的几个省，都有共产党人、进步文化工作者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为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印发了《告全国回教同胞书》；郑君里在青海导演了话剧《最后一计》，与韩尚义共同举办抗敌画展；新安旅行团在兰州进行了抗战救亡宣传活动，王氏姊妹剧团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兰州地区出版了《部队画报》、《宣传画选集》等进步刊物。谢觉哉、伍修权、彭加伦、茅盾、张仲实、顾颉刚、塞克、萧军等均在甘肃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宁夏也组织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等团队，排演抗战文艺节目，并创办了《曙光》、《银光》等刊物。

上海于抗战初期沦陷，在日军未进入租界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留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继续坚持“孤岛”的抗日战争。由于租界的特殊条件，进步文化活动仍可以迂回的方式开展。早期成立的青鸟剧社演出了《雷雨》、《女子公寓》、《日出》、《大雷雨》等剧目。于伶、阿英等人组建的上海剧艺社，演出了《爱与死的搏斗》、《花溅泪》、《夜上海》、《这不过是春天》、《碧血花》、《正气

歌》、《家》、《北京人》、《李秀成殉国》、《赛金花》、《明末遗恨》、《武则天》等几十出戏剧。此外，中国旅行剧团、中法剧社、天风剧团等也演出了《蜕变》、《边城故事》、《复活》、《林冲夜奔》、《李香君》、《花木兰》、《洪宣娇》等剧目。

“孤岛”时期的业余戏剧活动，在专业剧团推动和帮助下，逐步发展起来。姜椿芳、殷杨（杨帆）等利用合法形式创办了“艺林星期小剧场”，各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先后组织了上百个业余剧团。上海业余戏剧交谊社等联合演出了《永久的朋友》、《日出》、《花溅泪》、《醉生梦死》、《阿Q正传》、《生死恋》、《外祖父的死》、《破旧的别墅》等剧目，成为进步文化运动中一支颇有影响的戏剧队伍。

“孤岛”时期虽环境险恶，但经进步爱国的电影同人的努力，仍拍摄了《木兰从军》、《花溅泪》、《乱世风光》等影片。进步出版社、书店以各种名义作掩护，坚持出版进步书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军占领，“孤岛”全部沦陷，进步文化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态。在此期间由于美国电影被禁，娱乐性的戏剧演出有所活跃，涌现出了上海艺术剧团、苦干剧团等戏剧团体。其中有些剧团接受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影响，以隐晦的方式演出了一些进步中外戏剧，如《结婚进行曲》、《林冲》、《云南起义》、《夜店》、《乱世英雄》、《视察专员》等。艺术大师梅兰芳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演出京剧《抗金兵》，以表达他的爱国思



想，此后蓄须以明志，绝不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海外文化工作也是党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保护进步文化人不受迫害，及时将渝、桂等地的文化工作者分批疏散到香港、南洋等地。周恩来派夏衍赴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并致电在香港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廖承志要妥善安排照顾好赴港进步文化人的工作和生活。1941年4月8日，我党领导的《华商报》在香港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在香港先后出版的刊物还有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张铁生、黄秋耘主编的《青年知识》周刊，郁风主编的《耕耘》，孙慎、联抗主编的《新音乐》，林润青主编的《自由丛刊》以及其它多种刊物。

进步文化工作者疏散到香港后，在廖承志领导下由夏衍总负责组成了旅港剧人协会，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宋之的创作的《雾重庆》，随后又演出了《马门教授》、《北京人》，轰动了香港，传播了进步文化，开拓了香港的进步剧坛。金山、王莹组建的中国救亡剧团赴新加坡、南洋各地巡回公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宣传抗战并进行募捐活动，扩大了进步戏剧在海外的影响。进步电影工作者在香港还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前程万里》、《孤岛天堂》等粤语影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占领九龙、香港。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在港文化人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对在港文化人的撤退工作作了详

尽指示。廖承志等与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密切配合，于1945年5月将大批进步文化人（包括国民党左派元老及国际友人）撤离香港，分别安全地送回内地或送往海外。

## 1945—1949年

### 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革命文化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违反人民意愿，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运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积极参加了这一伟大斗争。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文艺界代表，并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赠词作《沁园春·雪》。这首词在重庆《新民晚报》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并为人们热情传诵。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9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不久，重庆文化界、出版界、戏剧电影界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中共中央上海局通过于伶、田汉在上海以召开“菊花会”的形式邀集文化界的梅兰芳、郑振铎、熊佛西、叶以

群、翦伯赞、洪深、应云卫、熊复等 50 余人商谈，落实周恩来离沪前提出的文化界应为争取和平民主，增强团结，努力工作的指示，让大家注意安全，警惕国民党的迫害，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专业和业余戏剧团体，演出了《清明前后》、《升官图》、《丽人行》、《孔雀胆》、《女人与和平》等剧目，发表了大量揭露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漫画，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和平民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5 年底为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斗争而形成的“一二一”运动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大专院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在街头宣传，高唱《我们反对这个》、《民主是那样》、《团结就是力量》（外国歌曲填词）、《五块钱》、《凶手你逃不了》、《告兵士》等反内战争民主歌曲，出版了《学生报》。

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紧密团结合作，经过艰苦努力，摄制了一批进步影片。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夜店》、《还乡日记》等。

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出版工作者，出版发行了大量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传播进步思想的图书报刊，如《文萃》、《民主》、《群众》周刊、《民主报》、《大众文艺丛刊》、《民主周刊》等等。还有许多革命出版物，为了避开反动派的检查，采用《文史通义》、《大乘起信论》等作封面伪装出版。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指派特务制造了重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上海“文萃”事件，向袁雪芬抛粪事件，杀害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对进步文化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各解放区的文化工作，紧密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而蓬勃开展。各级党、政、军领导部门，为加强文化工作，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开展戏剧、歌舞、音乐等文娱活动的指示，并为迎接解放，在发展电影事业、加强新区出版工作、保护文物古迹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规定。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文化艺术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文工团（队）、剧团（社）大量建立，并深入农村、部队，开展各种革命文艺活动，如演出《血泪仇》、《赤叶河》、《白毛女》、《刘胡兰》、《李国瑞》、《送郎参军》、《大生产》、《兄妹开荒》、《土地还家》等文艺节目，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在淮海战役中，一些文工团（队）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宣传鼓动，开展火线文艺演出，对活跃阵地文化生活，鼓舞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区的电影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得到一定发展。在西北成立了延安电影厂（后改为延安战地摄影队）；在华北有华北电影队；在东北解放区，接收敌伪制片厂后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了《边区劳动英雄》、《自卫战争新



闻》、《松花江上》、《民主东北》、《北平入城式》等影片。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故事片《桥》、美术片《皇帝梦》、《瓮中捉鳖》和科教片《预防鼠疫》等，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

解放区的出版、发行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新华书店迅速发展，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三联书店亦到解放区设店，两支革命出版队伍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列著作，以及配合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图书、报刊。特别是大量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使广大人民便于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国现代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化队伍会师北京。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

1949年10月，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两支出版队伍也会师北京。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为会议题词。至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进步文化运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闯过了无数暗礁险滩，终于到达了光明胜利的彼岸。

##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组建 新四军中的特殊历史作用

贺 琦 洪建军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于1938年8月成立的。它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办事处在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的领导下，代表中共中央继周恩来之后继续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的一系列全局性的问题。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使国民党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围剿”，实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最终组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主力军——新四军。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至撤离南京短短的3个多月中，办事处一方面直接而具体地指导南方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新四军编制、隶属关系、干部配备、军需给养等问题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交涉，并最终搭起了新四军建军的框架。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参与了新四军组建从酝酿至初成的全部工作，在新四军组建中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第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直接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原则，保存了有生力量，成为新四军强有力的建军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他们长期同中共中央隔断消息，大多是根据国民党报纸登载的有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开声明、宣言等，间接地大致了解党中央的政策转变。因此，在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时，难以准确地把握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关键的政策性问题。而国民党当时表面高谈国共合作抗日，暗地继续加紧向南方红军游击队进攻。1937年1月至7月，正是各红色游击区域又一个最残酷的时期。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在和国民党军一五七师的谈判中，由于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信国民党的承诺，将部队开到漳浦县城驻防，使8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被全部缴械，造成震惊一时的“漳浦事件”。因而，南方各游击区域迫切需要全面了解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党中央正确的策略指导。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但由于各地距离陕北党中央太远，还不能及时与党中央联络，因此，代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南方各游击区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肩上。从1937年8月至11月，办事处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各游击区域工作情况的同时，及时采取多种方式，给予各地红军游击队以有力的指导。

1、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名义，公开合法地派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的文件、指示。9月下旬，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项英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关于游击队改编的谈判，同意将红军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10月1日，博古将项英向中央报告“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的电报转报中央。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关于南方各游击队改编问题致电博古、叶剑英等，指出要坚持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十分不利的；必须集中时，则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保证部队安全。并明确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10月2日，洛甫、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能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博古于1日夜即给项英写信，2日即派顾玉良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和他的信件，以八路军上尉副官的身分，去江西寻找项英。顾玉良由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派人护送，先见了陈毅，给他看了中央文件。随后找到项英并陪同他返回南京。博古、叶剑英同项英商谈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所面临的形势，并将他送往延安。11月初，办事处再次派顾玉良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去江西、福建等地与黄道、叶飞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并根据中央精神解决当地在谈判中的有关问题。是年底，黄道、叶飞等与在南



昌的新四军军部取得直接联系，并亲自到军部与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商谈部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具体事项。

此外，中共中央派往红军游击队传达指示的人员，如奉命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也曾前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由博古、叶剑英传达中央新的电报指示，再将中央新的精神带到游击区域去。

2、收集、听取各红军游击队的工作情况，及时指示工作任务和方针。1937年8月至11月期间，办事处与上海、武汉等地中共和八路军办事机构加强联系，及时收集各地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情况。9月29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浙南红军游击队代表吴毓、龙跃到达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博古、叶剑英在听取了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后，对今后的行动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10月6日，中共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到南京，与博古、叶剑英共同研究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情况，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10月8日他们郑重向中央建议：红军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长期分散将消耗力量。南方各地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这个建议为党中央所接受，同时也有力地指导了游击区域的工作。

3、经过坚决斗争，遏制和打破国民党削弱以至吞噬红军游击队的企图。“漳浦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为粉碎国民党利用集中改编各个吞并红军游击队的企图，党中央明确指示博古、叶剑英，坚决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责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退

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国民党军队不得调入游击队驻地 200 里范围，不得派任何人员、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游击区问题。据此，博古、叶剑英多次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谈判交涉，终于迫使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释放了被扣的红军游击队员，交还了 300 余枪支。

**第二，不妥协地反对国民党干涉新四军的人事安排，切实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

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改编组建成新四军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国共两党对新四军领导权的激烈斗争。蒋介石最初在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按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时，就煞费苦心，妄图对八路军最高指挥机关和各师加以控制，甚至打算对连以上各级副职均委以国民党人，但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而算盘落空。蒋介石并不甘心，因此千方百计转而力图控制新四军的领导指挥权，不愿坐视新四军成为八路军第二。再则南方各游击区域互相分割，各游击队之上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又远离党中央的领导，客观上也给国民党以可乘之机。因此，新四军组建初期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斗争，更呈现出其特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坚决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又艰苦细致地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满腔热诚地关心争取抗日爱国名将叶挺，从而挫败了国民党的企图。

1、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中拒绝国民党委派任何人员，纯洁新四军的队伍。1937年8月至9月期间，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曾一度接受国民党派进的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一批人员；粤赣边游击队也在谈判中承认国民党向游击队委派人员。这引起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9月，中共中央在致博古、叶剑英等关于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进入游击区。此后一再强调国民党不得干涉我一切内部人事，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插入任何人。即使在游击队改编的一切问题解决之后，游击队开始集中改编时，所集中的部队指挥及作战，国民党也不得干涉。遵此精神，博古告诫项英，党中央对此严重注意，指出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党的绝对领导等原则，及时纠正项英的错误做法。博古、叶剑英还将党中央对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的批评意见转告郑位三，使鄂豫皖红军游击队提高警觉，避免错误。实践证明，由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以及武汉、广州等地党和八路军办事处机构的适时工作，使各地红军游击队保持了部队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使国民党染指新四军的图谋彻底落空。

2、帮助叶挺坚定政治态度，实现中共对新四军完全的指挥权。选择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1937年7月，周恩来利用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机会，在上海会见了满怀抗日激情的叶挺将军。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向叶挺介绍了国共合作的形势，

分析了西北红军改编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必将提上谈判议程的情况。他坦诚地希望叶挺能参加改编工作，并示意叶挺可利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的关系争取蒋介石同意。蒋介石迫于危急的战事，于9月28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蒋介石事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抢先发布命令，怀着希望借此把新四军改造成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叵测居心。鉴于复杂的情况，中共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党中央一方面了解周恩来与叶挺会晤的情况，一方面多次致电与叶挺保持联系的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其后进一步明确“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指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此时，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热情诚挚地做叶挺的工作，使他理解中央慎重的方针，并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1月初，叶挺在办事处的安排下亲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负责同志，商谈新四军组建的具体问题。中共中央对叶挺担任军长的认可，加快了新四军组建的进程，有力地保证了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3、通过多种渠道，争取实现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领导干部的配备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办事处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根本不经过国民党，直接向中央提出请调我党干部赴各省游击区域，加强各游击区域党、政、军领导力量。二是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由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为



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的意见，由叶剑英、叶挺一起同蒋介石谈判交涉。11月21日，叶剑英、叶挺面见蒋介石。蒋对新四军领导干部全为共产党员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同意。对新四军编制2师4旅8团和陈毅、张云逸、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任命百般刁难。12月初，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到武汉后，又与周恩来等继续与何应钦谈判，至1938年1月，最终迫使国民党按中共中央的意见发表了新四军干部任命。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存在的时间虽是短暂的，但它在新的四军组建的关键时期和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作为新四军组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其卓然的历史功绩应载入新四军的光荣史册。

# 争取昆明起义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接着，驻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外，其余国民党专区、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起义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时驰援和滇桂黔边纵队的配合下，在昆明地下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全力支持下，起义部队胜利地进行了昆明保卫战，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扑，昆明市和云南尚未解放的地区实现和平解放。

昆明起义是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总形势下实现的。解放战争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妄图利用云南地处边陲、有国际通道的条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把云南作为大陆上最后的反共基地。针对蒋介石的最后顽抗计划，中央军委作出了对西南各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略

方针，先后解放了贵阳、重庆、南宁等地，形成了对云南之敌的围歼之势，这是昆明起义能够举行和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南各族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在长期发动组织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在云南全省范围内发动和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游击战争和群众革命斗争，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10块游击根据地，解放了数十座县城，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这也是起义成功的重要条件。

昆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云南地方实力派进行长期的争取工作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中共中央在科学分析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统治集团中央势力之间的区别和矛盾的基础上，长期以来，坚持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实行了团结、争取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罗炳辉等同志都亲自做龙云和滇军将领的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方局领下的云南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云南上层人士中的爱国进步分子，争取地方实力派坚持团结抗战。1943年，南方局派华岗为中共代表和龙云直接联系，设置了和中共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发动全面内战，决心翦除龙云，瓦解云南地方实力派。他以受降的名义，把滇军8个师全部调往越南，随即于1945年10月3日在昆明发起突然袭击，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免去龙云省政府主席职务，把他调到重庆、南京软禁，又委任原第

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蒋、卢之间继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任务，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始终坚持做争取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贯指示精神，采取了利用蒋、卢矛盾，实行区别对待，对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又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从1945年“一二一”运动开始，中共云南省工委发动和领导了持续不断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虽然卢汉也曾出面配合蒋介石实行镇压，但地方党组织尽可能争取他在一定程度上保守中立。1948年，全省农村武装斗争逐步开展，地方党组织在领导武装斗争中，着重打击蒋系中央军，注意对地方保安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和争取工作，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争取地方势力。这些，都是争取昆明起义的重要条件。

卢汉将军审时度势，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顺应民心，举行起义；广大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拥护起义，为争取起义的胜利而团结战斗，为云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争取昆明起义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



反动派玩弄和平阴谋的同时，表明了争取各个地方实力派的愿望。

1949年2月12日，卢汉下令枪杀迫于生计，自发捣毁国民党中央银行昆明分行的无辜群众21人，中共中央把卢汉列入第二批战犯名单，新华社发表短评，对卢汉镇压人民的血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给予卢汉以极大的震慑。

1949年2月下旬，卢汉委托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了他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件，卢在信中表示了反蒋的政治态度，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到云南，以及和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分局有关负责人潘汉年接见了宋一痕，并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答复卢汉：云南、四川均可按北平方式行事，并且可以更多地照顾地方实际。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今后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的战略方针。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共云南省工委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武装斗争，发展游击根据地；同时，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大量秘密翻印散发中央文告，以地方实力派为主要对象，发起广泛的政治攻势，并深入发动群众，促进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以新的形式和规模发展，以配合野战大军的胜利进军，积极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

1949年4月，卢汉再次派宋一痕为代表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联系，同时又派人与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滇军中从事

军事统战工作的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根据桂滇边工委书记周楠的报告，5月，中共中央指示：可以和卢汉建立联系，配合消灭蒋军，但不可受任何约束，不可存幻想；关于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则要卢汉派全权代表到中央谈判。5月底，桂滇黔边纵队领导同志和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磨盘寺举行第一次会谈，商谈了联系、配合问题，卢汉并输送武器弹药和经费给桂滇黔边纵队。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以后，针对蒋介石的最后顽抗计划，中央军委作出了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这时，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从起义滇军中选派人员回云南对地方实力派进行争取工作。原滇军军官、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代理参谋长张秉昌受命抵达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愿望。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和军情部部长李克农，委派参加北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返回云南策动卢汉起义。

1949年7月，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方针。这时，宋一痕经华南分局介绍到北平，代表卢汉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反蒋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接见宋一痕，对卢汉愿意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应在

解放军逼近云南时举行起义，以免遭致失败。

这一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在昆明建立了两个统战工作小组，由担任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地下党员杨青田和担任省参议员的地下党员唐用九、马曜组成的统战小组，以省参议会为阵地开展工作。统战小组利用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结合上层人士的切身利益，以“维护地方利益”、“表达民意”的合法形式，团结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开展反蒋斗争。在斗争中，逐步扩大了爱国反蒋统一战线，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和影响。以地下党员郭佩珊、李剑秋、吴邦彦组成的另一统战小组在社会上层人士、新闻界和国民党军、政机构及部队中进行工作。昆明地下党组织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深入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店员、市民、妇女、农民，形成了反对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争取和平解放的强大声势。同时，加强了敌工工作，在国民党保安部队、警察中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加强宣传和政治攻势，设法从特务组织中获取情报，并在卢汉的警卫营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相当一部分警卫营的官兵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1949年8月，云南全省人民游击武装与桂滇黔边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后，朱家璧、郑敦、张子斋代表“边纵”与卢汉的代表龙泽汇在路南石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根据争取卢汉的工作情况，8月26

日，中共中央电示滇桂黔边区党委，派人到昆明通过宋一痕对卢汉转达中共中央的5点要求：1、要让云南人民武装发展，并支援武器弹药钱粮；2、发动省参议会群众团体拒绝蒋桂军队入滇；3、地方保安部队集中应变；4、控制特务；5、卢汉部队要严明纪律，保护国家资财。

1949年8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胜利进军，蒋介石集团加紧了退守西南的部署，控制云南成为他们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8月24日，蒋介石亲自到重庆部署在西南负隅顽抗。这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曾主张用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撤换卢汉，但蒋介石不愿桂系势力进入云南，接受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意见，召卢汉到重庆面谈，意图通过卢汉来控制云南。卢汉经过一段时间拖延，在蒋介石施加强大政治、军事压力下，于9月6日去重庆。8月末，边区党委负责同志听取了中共昆明市委的情况汇报后，估计形势可能逆转，已布置全市党组织作了应变准备。蒋介石软硬兼施要卢汉反共到底，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卢汉被迫答应：“围剿”边纵；在昆明进行反革命“整肃”；同意蒋军入滇；云南几个飞机场和滇越、川滇路交蒋军控制等条件。蒋介石则同意云南地方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并拨给经费和装备。9月8日卢汉返昆。接着，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为首的大批特务先后来到昆明，实行“整肃”。9月9日，解散省参议会；封闭报馆、学校；逮捕民主人士、编辑、记者、工人、学生等400余人；随后追



踪暗杀了潜往香港的民主人士杨杰，昆明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整肃”开始前，卢汉曾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把即将“整肃”的消息告知参议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唐用九。昆明市委抓紧贯彻了各种应变措施，加强了对党员和革命同志的气节教育，领导开展了监狱内外的斗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滇桂黔边区党委也始终密切注视着卢汉的动态和昆明情况，连续向中共中央报告。

9月中旬，卢汉让宋一痕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要求中共速派人联系，“共商挽救与保护之策”。虽然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仍按中共中央8月26日指示，于9月19日派执委郑敦到昆明。经负责领导昆明等地工作的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和郑敦共同研究，根据中共中央一贯指示精神，虽然“九九”事件后形势严峻，但对卢汉仍应采取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于是，由郑敦代表党组织通过宋一痕向卢汉指出其错误，要他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并寻机释放，表示只要他有靠拢人民的实际表现，中共仍将和他联系。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国防部总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督促、部署“围剿”云南人民武装。蒋系中央军向滇东南、滇东北、滇南进攻；地方保安部队向滇西北、滇西进攻。卢汉曾密令龙泽汇把蒋系中央军在滇东南、滇东、滇南等地的一些军事行动告知滇桂黔边纵队领导人朱家璧。根据这一情况，“边纵”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反“围剿”斗争，同时继续加强统战工作和对保安团的工作，深入发动群众，作

好配合大军解放云南的准备。

10月初，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委派的周体仁第一次会见卢汉，向卢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用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一些顾虑。10月中旬，卢汉约见周体仁，表示愿意起义，但“九九”事件后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已中断。以后，周体仁经过调查，确信卢汉有起义诚意，才向卢汉表明他是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委派返滇推动云南和平解放的，并具体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云南起义的最好时机，是解放军歼灭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之时。经过周体仁传达，卢汉得到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具体指示，决心起义。周体仁同卢汉商谈了起义的准备和部署。在此期间，蒋介石集团企图借卢汉之手屠杀“九九”事件中被捕的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迫使卢汉为他殉葬。卢汉以“证据不足”为由，拖延到11月，得到地方耆老李根源、周钟岳等支持，趁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到昆明之际，利用蒋、李矛盾、取得李宗仁“交卢主席酌请处理”的批示后，分批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

“九九”事件以后，蒋介石也加紧控制云南，蒋系第八军5个师、6个宪兵团、陆军总部部分直属部队以及一些军事机构陆续进入云南。驻云南蒋军中央军的兵力由1万余人增加到4万人以上，同时，还有大批特务撤退到昆明。特务组织为防止卢汉起义，进行了大量“应变”的阴谋部署。这时，中共昆明市委估计昆明形势发展有3种可能性，即：

1、蒋介石集团控制昆明；2、敌军逃出昆明；3、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据此，市委作了配合解放军解放昆明和配合卢汉集团起义的两手准备，在工厂、农村积极组织和掌握武装；全市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迎接解放、接管和肃反肃特作好准备；继续深入广泛组织群众，开展政治攻势。

11月下旬、12月初，卢汉通过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吴少默、刘淑清、杨克诚告知昆明地下党组织，他已决定起义，通报调集部队，寻机扣押蒋系军长李弥、余程万等准备部署，提出6点具体要求。中共昆明市委表示欢迎和支持卢汉起义，起义时机则望密切注视局势发展、蒋方动态，并待我方向上级报告请示。当时，负责领导昆明等地工作的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在滇中游击区，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副书记赖卫民商定，立即向东去广西百色地区迎接野战军的边区党委领导同志，并向在滇中的郑伯克报告；同时向率领“边纵”西进部队在滇西地区作战的“边纵”副司令朱家璧和滇西、滇西北地委通报情况，要他们对卢汉将进攻滇西、滇西北的地方部队东调昆明时不予阻击，并注意防堵西康蒋军窜滇。因时机紧迫，未接区党委复示，市委又请在昆明治病的边区党委执委李雨枫迅速赴香港转广州，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报告，并请电告滇桂黔边区党委。同时，市委向全市党组织作了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

1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已接近云南，蒋

介石先由台湾到重庆，后到成都，准备立即把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迁入昆明，以抢先控制云南。12月6日晚，卢汉召集杨文清、龙泽汇、马谏、佴晓清开会，认为时机紧迫，必须加紧调集部队，迅速准备起义。

12月8日，周体仁受卢汉委托经香港到达广州，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叶剑英汇报卢汉将于20日以前起义，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支援，并指定起义后的指挥机构和负责人，同时转达卢汉表示承认9月执行“整肃”的错误，提出6点具体要求，包括：起义部队按约法八章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权机构；对起义军政人员不究既往，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并予录用；释放被俘滇籍将领；云南各地的地霸游杂武装不予收编等。华南分局即于当夜电报中共中央，中央随即通报第二野战军前委。卢汉还派了林南园于12月3日到香港，通过在港的滇籍民主人士龚自知和中共香港工作组张铁生、吴获舟联系，转达了卢汉起义的决心及要求。香港工作组按中共中央指示，要卢汉在解放军接近云南时起义，并要卢汉与邓小平政委联系。7日，林南园返昆向卢汉汇报了到香港找中共联系的结果。

12月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卢汉让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碍难照办。张群奉命于8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个军长飞成都见蒋介石。形势十分紧迫，如果蒋介石的计划实现，起义的可能性就将丧失。卢汉当机



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通报。当时，昆明市委负责同志认为不失时机立即起义，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只要起义部队和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的力量坚持斗争，就能够在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的驰援和“边纵”的配合下赢得起义的胜利。于是，市委于8日晚派专人携信赶赴滇中向郑伯克报告，并进一步作了应付事变的部署。

12月9日，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一同再返昆明。卢汉乘机软禁了张群，并借张群来昆为名召集在昆明的蒋介石集团的主要军事、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童鹤岑、沈延世、石补天等开会，当晚将其全部扣押。起义部队随即出动，解除了蒋系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的武装，控制了市区和飞机场。卢汉正式宣布起义，通电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二野刘、邓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执行约法八章、四项号召，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中共中央并向二野前委和华南分局作了相应的指示。

卢汉起义后，按照中共中央通知的方法，中共昆明市委派杨青田以中共联络员身分与卢汉建立正式联系，协商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以促使中共中央和刘、邓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党组织估计到蒋军要对昆明进行反扑，与卢汉商定，双方立即进行保卫昆明的准备，并对卢汉起义后未

向中共中央和刘、邓报告而擅自放走张群的错误作法作了批评。

卢汉扣押了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曾希望通过他们争取这两支部队起义。刘、邓也指示尽可能争取他们投向人民。但这两个军和几个宪兵团以及陆军总部一部分直属部队拒不起义，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向昆明进攻。12月16日，昆明保卫战全面展开。

昆明保卫战开始后，“边纵”各部队积极主动在昆明外围攻击敌军侧后，迟滞和牵制敌军的进攻；起义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作战；昆明地下党组织领导全市人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起义部队保卫昆明，调集武装群众3000多人，成立“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参加对敌作战；刘、邓命令驻贵州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四十九师疾进云南策应起义，进抵滇东曲靖地区。敌军攻昆明不下，又惧怕被解放军围歼，于12月21、22日先后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昆明市委组织领导成立了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进行了迎接解放军入滇全面接管的各项工作。1950年2月6日，新的中共云南省委在贵州安龙成立，宋任穷、陈赓任第一、第二书记。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云南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 1958年北戴河会议

韩 钢

1958年北戴河会议，是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

## 会议前的形势

北戴河会议前，经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各项工作的全面“跃进”。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为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应当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决定提出要在

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因此，决定提出不但对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对于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计划工作，充分采取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决定认为195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区性协作会议的决定已不完全适应形势的要求，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各协作区的作用，逐步扩大各协作区的职权。决定规定了协作区的任务，主要是在几个省、市、区范围内对新建大型的冶金、煤炭、电力、机械、炼油、化工等企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作平衡；组织工业基础较强的省、市、自治区帮助工业基础较差的地区，实行重点和全面相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合理地使用各地人力、物力、财力，避免某些基建项目不应有的重复和缺漏；通过协商方式，互相支援，统一步调，千方百计地解决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划分为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下设立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这7个协作区是：东北协作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欧阳钦为主任委员；华北协作区（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林铁为主任委员；华东协作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柯庆施为主任委员；华南协作区（广东、广西），陶铸为主任委员；华中协作区（湖南、湖北、河南），王任重为主任委员；西南协作区



(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李井泉为主任委员；西北协作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张德生为主任委员。协作区成立后，各协作区先后召开了协作区计委主任会议和协作委员会议，分别讨论了中央和各省市市委布置的重点建设问题、农业问题和 1959 年年度计划等。

在决定成立协作区的同时，中共中央于 6 月 2 日又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 4 个特殊纸厂和 1 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大部下放，下放的单位约占全部的 60%—70%；各工业部门下放的单位和产值（除军工外）约占全部的 80%左右。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除保留北京通讯枢纽和通各省的长途通讯干线及北京通各省的邮政干线管理权以外，全部下放；交通部所属公路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除留必要的部分支援国外以外，全部下放；农垦部除直属 3 个地方的国营农场外，其余的国营农场均交地方管理；森林工业管理体制改变后，关内的全部下放；粮食、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全部下放。中央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于 6 月 15 日以前一律完成。

随即，中共中央于 6 月 6 日批转了冶金、第一机械、化学、水利电力、石油、建筑、轻工、纺织等工业部党组关于企业下放问题的报告。

建立协作区，下放企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目的都在于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八大二次会议以后，速度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高速度的强调，导致高指标风的兴起，各部门、各地区对本系统、本地区的生产指标层层加码。不久，各协作区先后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制定1959年钢铁生产计划。各地区均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钢产量指标。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干脆翻一番，即搞1100万吨钢（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毛泽东还估计，1959年钢产量可能达到2500万吨，两年就可以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6月21日，冶金工业部党组重新提出1959年产钢计划。这份计划在向中央汇报了各大区关于钢铁生产规划会议的情况后认为：“根据这种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约可能争取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第二天，毛泽东向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转发了这个文件。

钢铁生产指标的加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指标的追加。6月中旬，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工农业大跃进已成定局，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3年基本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

展的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报告估计，到1967年我国钢产量能够达到1亿吨。6月16日，国家计委又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报告。报告预计1958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其增长速度将达到35%；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4000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二五计划财政支出中，基建投资为3050亿元，占总支出的70%以上。6月17日，国家经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报告认为：1958年第二本帐肯定可以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sup>①</sup>6月27日，中央又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25亿元分配意见的报告》，决定1958年再增加基建投资25亿元。

伴随高指标风的兴起，浮夸风也越来越盛行。其中农业方面的浮夸尤为突出。一时间，报纸、电台、广播里竞

---

<sup>①</sup> 这三个报告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149页。

相传出亩产高产纪录的“奇迹”。7月1日的《今日新闻》报道：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所谓“双星”是指两个高产“卫星”：一个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36900多斤，一个是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0000多斤。而1957年我国水稻单季稻亩产最高纪录是2400斤，花生亩产最高纪录是1500斤。浮夸风表现的另一面，是大批“粮食增产有限论”、“定局论”。认为粮食增产要受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限制的观点，被概括成“粮食增产有限论”。而“粮食增产有限论”被认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异途同归的”。所谓“定局论”，是指一些人认为农作物的生长后期，收成是丰是歉已成定局。这种观点从防止松劲情绪的角度看，是应该批评。但是当时主要是把“定局论”作为妨碍全面丰收的思想来批判的，把“定局论”当成了农业生产上促进派的对立面。这些批判反过来助长了虚报、浮夸之风的蔓延。

就在这个过程中，急躁情绪也开始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方面表现出来，并逐渐形成“共产风”。6月，《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公开发表这年4月15日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尚未完成改造的部



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个别地方即试办过共产主义公社。7月，《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随后第4期又发表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两篇文章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关于公社的思想。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陈伯达在文章里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建立人民公社，当时不仅被认为是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设想，而且也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

建立人民公社的最早实践，还是从农村开始的。河南省新乡县成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遂平县成立了嵒岈山人民公社，这是最早的农村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视察

了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9日，毛泽东在视察山东历城县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和谈话公布之后，一些农村争先恐后模仿七里营、嵛岬山，创办人民公社。

在农村，还出现了农业社公共食堂。办公共食堂最早是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的部分农村，农业社在生产紧张、劳畜力短缺的情况下，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所采取的一种办法。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件事要提倡》认为：“湖南、福建等地一些农业社开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农村新事。它标志着农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新发展、新趋向。在个体经济时代，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适应着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制度，吃饭也是一家一灶。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广大农村已经合作化，生产再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社为单位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广泛开展着的技术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村经常处于紧张的突击状态，劳动力普遍感到不足。集体的生产和紧张的劳动，必然要求有同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由一家一灶发展为公共食堂，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使得平均主义之风也开始滋长起来。

总之，北戴河会议之前，左倾错误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建设主要是抓住钢铁和粮食 8月11日和12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

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当时，由于正处于夏收，粮食问题不突出。许多人甚至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但是钢铁的问题则不然。由于追求高指标，许多地方和部门、企业只注重搞计划，而忽视抓生产，各地“我自为政”，中央指挥调度不灵。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指标的层层加码，使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实际情况，与计划指标的距离越来越大。到7月份钢产量只完成380万吨，离1100万吨的年产量指标悬殊很大。这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担心。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为了促进全面跃进的进一步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北戴河会议。

### 北戴河会议的情况

195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北戴河会议的通知，决定于8月16日举行会议，要求参加会议的各同志于15日以前到达。通知还附了会议要讨论的17个问题。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正式开始，8月30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8月25日至31日，中央还同时在北戴河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计委主任和有关厅、局的主要负责人。8月30日，参加

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旁听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其主要内容是：

### **第一，关于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

关于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的讲话中作了说明。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每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第一个问题，是明年和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第二个问题，也是工业问题，即今年的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达到 1100 万吨，到年底只有 4 个月零 13 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要保证完成。中心问题是搞到铁。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 6500 亿斤（一说 7000 亿斤），6.5 亿人口，每人 1000 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 1500 斤，后年达到 2000 斤。是否搞到 2800—3000 斤，到底多少好，以后再议。是否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恐怕超过每人 3000 斤就不好办了。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每年参加劳动 1 个月总是可以的。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第十个问题，从明年起，搞 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



势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恐怕不会打。还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党内外都有怕西方的情绪，有恐美病。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要搞大辩论、大字报。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第十五个问题是我提出的，深耕问题。目前，总而言之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不深耕，水装不了，肥放不进，不能分层施水，肥再多也不行。深耕可以使土地变成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北方要深耕1尺，南方七八寸。密植的基础是深耕，深耕有利于除草，把草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草翻到底下又可以变成肥料。这样一来可以1亩当3亩，我们的土地多了。苦战3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用不着那么多地。将来可拿1/3的土地种树，有2/3的土地就够了。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8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不成问题。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会真正节育了。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用6年时间4人发一支枪，全国共1亿支枪，每人一年发几十发子弹，下一道命令必须打光，不打光不算完成任务。全民皆兵，有个壮气作用，吓人作用。

与会者根据会议的安排，围绕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对上述17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讨论。8月17、19、21、24、29、30日，毛泽东在会上先后讲话，其中19、21、24日是他同

各大协作区委员会主任的谈话。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也在会上作了讲话或插话。李富春就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薄一波就工业生产问题，谭震林就农业问题，陆定一就教育问题分别在会上作了说明和发言。除了上述17个问题之外，会议还讨论了交通运输问题。会议还涉及整风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会议采取逐日讨论、逐个通过的办法，先后通过了近40个文件。

## **第二，关于工业和计划问题**

这是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之一。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对与会者说：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亩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上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产钢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农业上了轨道，工业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工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各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

一年，主要是指抓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

钢铁生产是毛泽东多次讲话的内容。他说：冶金部汇报原计划 600 万吨，以后又讲 700 万吨，后又讲 900 万吨。我说：索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 1100 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 1100 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 3000 万吨，后年再增 2000 万吨，苦战 3 年，达到 5000 万吨，基础就可起来了。剩下两年，到 1962 年搞到 8000 万吨到 1 亿吨钢，就赶上美国了。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统一和纪律。毛泽东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设，枝叶扶持（枝干相联）。”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2/10（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8/10。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毛泽东还说：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有几项东西，非下命令不可了。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他说：三令五申，凡有铁拿不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毛泽东说：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马克思主义，靠开会，靠政治，

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统一与分散、死与活的关系。他说：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1959年的钢如果是2700万吨，2500万吨必须卡死，200万吨是活的；如果是3000万吨，就有500万吨是活的；如果超过3000万吨，还可以分成。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总结说：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散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

### **第三，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养猪都归公，自留地暂时还留一点），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



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谈到我国人民公社的由来，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有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但是，毛泽东又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15000个到25000个社，每社5000到6000户。两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

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此，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讲话过去讲的都灵了，抗日、打蒋介石、土改、合作化都灵了，农民相信。这次提出办公社，全民所有制，农民也会很快接受。

关于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毛泽东很欣赏河北省徐水

县的经验。河北徐水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在公社内部设团、营、连、排、班。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搞军事化，我看是好的。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生产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公社“三化”很好，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事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公社，城乡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政合一，政社合一，挂一个牌子。

#### **第四，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从人民公社的建立，讲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农民先走一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毛泽东说：在所

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的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

毛泽东说：八级工资制这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表现。现在不分级，工资一律也不行。将来要实行各取所需，无所谓八级工资制，要做到没有区别，而现在又搞那么多的区别也不好。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搞供给制并没有出懒汉，而且打仗还是死人的，还不是靠政治挂帅？！那也不是少数人，当时实行供给制的人数有几百万。战争中组织民兵坑道作战，没有报酬，拼命打仗。徐水县能够搞军事化，也是因为有这个经验。但是进城以后说供给制不行了，要实行薪水制，说它能够刺激生产，结果由军事共产主义倒退一步，向资产阶级法权让了一步。现在还是要靠政治，政治和科学结合。

毛泽东还由此谈到干部问题。他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

城以后变了。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他说道：不劳动不好，官作久了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还有几千万干部子弟，近水楼台易做官，搞久了我们也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有人说，平均主义不分高低，要出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懒汉，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3年，到1952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



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跟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工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三四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把农业工厂化，实行工资制，土地国有行不行？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说：讲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还可以。

### **第五，关于上层建筑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法治问题。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还讲了意识形态问题。他说：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

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我们政治思想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毛泽东说：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

毛泽东还谈到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我们的农业学校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农业学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

毛泽东还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来展开。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41年的经验，我们有31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毛泽东还谈到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他说：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批评我们的，或者是以苏联正规化来对我们批评。实际上，农村作风、游击习气，

这才是正规化的马列主义的作风。这样大的事情，不搞运动怎么行？办工业和办农业一样，不能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办，必须由全党和广大人民去办。要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北戴河会议讨论的问题、制定的文件很多，但是中心问题是工业生产问题，其中钢铁工业生产的问题更为突出。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会议始终是围绕上述两个重点进行讨论的。

### 会议主要文件的基本内容

北戴河会议的主要文件，在会议结束之后分别由国务院公布和《人民日报》发表，这里就不再概述了。除了已公开发表或公布者外，北戴河会议的另一一些重要文件情况如下。

**一、《中共中央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1959 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大协作区会议之后，国家计委、经委的有关同志搞出来的，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之后又经过修改，再次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然后，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讨论。经过各大协作区会议讨论后，又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提出要调整计划的意见。根据这个意

见，国家计委对原计划作了4个方面的调整，一是调整项目，重大项目增加148个，减少38个项目，净增118个项目；二是调整收入和投资，投资比原计划的480亿增加了21.22亿元，财政收入增加了22.5亿元达到722.5亿元，其中地方增加了15亿元，中央各部增加了7.2亿元；三是保证重点，电力由原来520亿度增加到580亿度，保重点，保生产指标，保新增生产能力；四是预算外投资各省要做计划。另外，二五计划也作了调整。

会议最后通过了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铜40万吨，铝30万吨；机床产量达到30万台；发电量达到550亿度；煤产量达到3.7亿吨；石油产量达到800万吨；水泥产量达到3000万吨；化肥产量达到530万吨；棉纱产量达到1000万件；新建铁路1.05万公里。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1960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1959年国家财政收入的722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将为500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在外。实现1959年这个计划，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以外，都将超过英国；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都将提前8年超额完成。

决定说：在1959年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



右,在科学技术方面基本上掌握原子能技术和喷气技术。经过1958年、1959年、1960年这3年的苦战,再加上以后两年的继续努力,即到1962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并且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在主要的科学技术部门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就是说,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决定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全国和各地方在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合理地分布工业生产力,按照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目前多建中小型企业的方针,使企业的布置适当分散,以适应国防安全,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全国走向平衡发展的共产主义要求。

决定要求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建设,加强协作,共同负责。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抓紧1958年最后4个月的工作,特别是要保证完成1100万吨钢和冶金设备、发电设备、机床的生产任务。决定指出:在保证今后农业继续跃进的条件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立即把主要

力量转到工业战线上，要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由第一书记挂帅，抓紧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的工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采取能够迅速发挥作用的措施，开展评比、竞赛运动，交流经验，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一个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对上述文件的具体化。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为3516—3706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2060亿元，比上年增长91%；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为1456—1646亿元，比上年增长44%。1959年财政总收入为722.5亿元，其中基建投资支出预算为501.22亿元。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是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意见》说：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5700亿元，将比1957年增长7.4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53%左右（比1958年预计数增长4.3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51%左右）。1962年农业总产值约为2400亿元左右，将比1957年增长2.5—2.8倍，平均每年增长30%左右（比1958年预计数增长1.2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0%左右）。在1962年工农业的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将达到70%左右。《意见》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合计的基本建设投资约需3850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6.8倍左右。重大建设项目，初步安排1000个以上。需增加职工2800万人左右。

## 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具体规定》

这个文件强调经济协作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对经济协作作了 3 条规定：

1、所有列入国家计划的协作任务，必须由协作双方具体订立合同，严格执行，保证按时完成。

2、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现有的协作关系必须继续保持。某些协作关系需要改变的时候，必须进行协商，双方同意后，再加改变，不得单方面废除。

3、凡是超过省、市、自治区界限而未列入计划的经济协作，包括技术力量的支援和培训，必须统一归口，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互相协商解决，并报有关的中央机关备案。各专区、县、乡、社和企业单位不得直接向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提出协作要求，以免影响正常计划的执行。

### 三、《中共中央关于 1959 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决议》指出：1959 年农业生产安排的方针是，在保证粮食总产量达到 8000 亿—10000 亿斤的前提下，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到 1 亿亩，总产量达到 8000 万到 1 亿担；大力增产油料作物，保证 1960 年生产年度生产 600 万吨食用植物油的原料；注意粮食品种和各种小杂粮的生产，注意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和蔬菜的生产。在数量大体满足之后，应该注意质量和花色品种，以适应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

关于粮食生产，《决议》认为主要关键是：增加小麦和早稻的播种面积，提高夏收作物在全年粮食总产量中的比

重；实行以深耕、密植为中心的精耕细作，努力提高亩产量。《决议》提出了有关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生产的几项具体措施。

关于畜牧业，《决议》要求 1959 年底毛猪存栏数达到 5 亿头，屠宰数达到 2 亿头，大牲口达到 1.05 亿头，羊达到 1.7 亿头。

#### 四、《中共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

《决定》认为，1958 年我国农业空前高额增产的形势已成定局，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有粮食近 1000 斤。《决定》认为，这种新情况表明我国的粮食局势已经开始根本改变，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有计划地进行粮食储备。《决定》指出：粮食储备应该以农业社储备为主，同时，国家也应该作必要储备，原则上 80% 由农业社和农户储备，20% 由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储备，根据可能和需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全国争取储备粮食 4500 亿斤左右，相当 7 亿人一年口粮和十几亿亩耕地一年种子的需要，其中 1958 年应该争取储备粮食 1000 亿斤。

#### 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

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是北戴河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会上，一些同志提出公社积累要扩大。有的同志谈到积累与消费问题时，提出将生活水准放在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会议最后通过的这个文件认为：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原则，应该是：在苦战 3 年期间，尽量多地积累一些，以利迅速发展生产；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



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而不是单纯地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指示》说：1958年社员个人的实际收入，一般应该比1957年略有增加，以利于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增加不可过多。农业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不应该超过当地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社收入很多，已经普遍超过了这个水平的，要向社员解释清楚，不再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有的社收入低于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应该根据1958年的增产程度，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但是，必须增加一定的公共积累，以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指示》说：根据以上的原则处理之后，不少的社积累的比例可能是很大的。迅速增加的公共积累，首先应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增加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公共积累，除了用于本社的生产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该采取县联社统筹资金的形式或者其他适当的形式，抽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全县、全省、全民的生产事业或者文化、教育、福利事业。这也要向农民解释清楚。

## **六、《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到人民公社的时代，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因此，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把生产、工作、学习的组织军事化，把全民武装起来，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实行全民皆兵，把军队的后备力量建立在全民的基础上，这对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决定》说：全民皆兵，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1962年，预计全国有7亿人口，除了地、富、反、坏、右和残疾人员之外，把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预计约3亿左右。其中又以复员退伍军人为骨干，把年满16岁至30岁的男性青壮年组成基干民兵，预计大约5000万。在农村中，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根据生产组织情况和民兵多少，以基干民兵为主，编为民兵大队、中队、小队。在城市，以厂矿、企业、学校、机关为单位，或者视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建立民兵组织。这种武装起来的人民，既是民，又是兵；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

《决定》还对民兵组织的体制、领导方式、各项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规定。

### 七、《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

这是1958年8月31日由新华社公布的，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介绍了北戴河会议的简况。公报说：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1倍以上。

公报说：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按照今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 620 万吨，比去年增产 85 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 5 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 800 万吨至 850 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 1958 年生产 1070 万吨钢，即比 1957 年的产量 535 万吨增加 1 倍而奋斗。

公报说：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是在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必须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

公报还强调了高速度发展经济，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要严格保持全国范围建设事业的计划性、纪律性。

## 会 议 的 影 响

北戴河会议对当时的各项工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

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首先是加速了“大跃进”运动步伐，特别是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北戴河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为炼钢“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提高各大中钢厂的生产指标，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支援炼钢。据195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介绍，在生铁方面，仅9月上旬全国各地建成的土高炉和小高炉有11万多个，使土高炉和小高炉总数达到35万多个。全国各地约9000万人脱离本职岗位，投入炼钢炼铁的运动。大批的工人、学生、士兵、教师、居民为炼钢炼铁找燃料，找原料，以至砸锅炼铁，把家庭日用的钢铁也当作原料回炉。大炼钢铁的运动，一是导致了工业内部结构的失衡，过分偏重于钢铁生产，使能源、运输、铁路、电力等行业全面紧张，纷纷告急；二是浪费了许多森林、矿产资源，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原始，土炉炼出的铁基本上是废品；三是破坏了其他行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其次是直接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之后，原来零星的个别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便成了铺天盖地而来的高潮。各省在会后未经过充分



准备，就匆忙进行并小社转公社的工作。据1958年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全国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公社的总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0.4%，平均每社4797户。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规模都相当大。据10个省、市的统计，5538个公社中，5000户以下的公社有3343个，5000—10000户的公社有1628个，10000—20000户的公社有516个，20000户以上的公社有51个。此外，据13个省的统计，有94个县是一县一社或一个大联社。人民公社还实行政社合一，政权机关与经济组织不分。这种规模和体制，在管理上引起很多混乱和漏洞。公社新建时，实行社一级所有制，把贫富不一的农业社统统拉平，社员自留地全部交公，公社无偿调拨社队的劳力、物资。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共产风”日盛一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北戴河会议不仅在实际工作方面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也在一个长时期内造成很多失误。

比如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只提出过一些基本的原则，并没有详尽地论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必然的但又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这个过程，这是需要不断探索才能解决的，而且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但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却轻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简

单地把“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当作进入共产主义的两个条件，在他看来这两个条件在中国都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因此进入共产主义就成了并不遥远的事。这就在当时以至后来使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十分简单和狭隘，而且极易在这种对共产主义作图解的情况下产生幼稚和狂热的举动来。

又比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是翻译的错误，这个词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这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劳动者工作能力的不同，家庭负担的不同等等。这些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时，才能完全消除。马克思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混为一谈。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社会要取消的对象，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

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毛泽东的理论上的误解，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和错误，在实践中也导致了严重后果。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顶点。

再比如法治与人治的问题。法制完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社会主义社会应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得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健全同时远为先进的法制。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纪律、政策同社会主义法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适用领域，但是却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彼此替代。在纪律约束、道德规范的同时，社会主义也需要法律保护和法律制裁。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多数人不能靠法律，而要靠习惯，靠开会，靠文件。开会、文件属政策范畴，习惯属传统。政策和传统固然可以作为人们行动的规范，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带有弹性。法律则不然，具有强制性，是一种硬

约束。毛泽东过分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经验，而没有看到法制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这在当时和后来也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历程。

当然，北戴河会议在总体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包含一些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会议十分强调干部联系群众，提倡学校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要求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防止特殊化，这些思想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干部队伍的建设，对于改进学校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情操与技能，都有值得借鉴的意义。因此，在研究它时，我们应该做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



## 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部分史实的订正

郭述申 刘 震 刘华清 陈先瑞

1986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下简称《长征》），在中国出版了。在此之前，《参考消息》曾以《长征新记》为题连载。作者在书中用不大的篇幅叙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是将其作为整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部分来展现这一历史侧面的。作者不顾年迈多病，不辞劳苦地沿着长征路线进行实地采访，并期望通过这部著作，使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精神是感人的。

《长征》中有关红二十五军部分，篇幅虽然不长，却也出现了一些漏失和舛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对涉及红二十五军的几个问题作以下补充和订正。

一、《长征》第60页写到：“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这样写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时，带走的兵力是4个师、13个团，两万余人，其中包括红二十五军的

七十三师。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是5个完整建制的主力团，即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的两个团，红二十七师的3个团，加上地方部队和红军伤病员约两万人，并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11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以下简称省委）决定以5个红军主力团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从组建到长征，在两年的斗争中，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人民群众一起，英勇地坚持了大别山的武装斗争，主力部队发展到3个师9个团1万余人。当时，国民党投入20多万兵力，包括从华北地区调来的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对红二十五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围剿”。红二十五军已成为一支威震大别山区、多次成团成旅地歼灭敌人的坚强的红军正规部队，并不是一支残余部队。

二、该书在同页中又写到：“红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红二十五军在重建初期，全军确是7000人。但是，在这以后不到5个月，主力部队就由两个师5个团，发展到3个师9个团，共12000余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部队。即使在1933年秋末，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招致了作战失利，部队大量减员，红二十五军的兵力也还有6000人，远远大于该书所写的数字。长征出发时，虽然带走主力部队2900余人，但留下一部分部队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该书还写道：红二十五军“没有一个懂行的领导

班子”（1986年1月31日《参考消息》连载该书的译文）。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是由省委兼军党委并实行直接领导的。省委是一个富有战争经验和战略全局观念，并能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的坚强领导集体。红四方面军转移后，省委很快就作出重建红二十五军、独立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决定，并迅速扭转了不利的斗争局面。红二十五军相继取得了郭家河、杨寨、潘家河等战斗的胜利，一些丢失的根据地先后得到恢复。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招致根据地斗争严重受挫以后，省委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自觉地转变斗争方针，红二十五军又在罗山县的长岭岗歼敌东北军一一五师两个团，远程袭占太湖县城，恢复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两块根据地。长征前夕，还在光山县的斛山寨打退了敌军10个团的进攻，毙伤俘敌4000余人。这些事实充分证明，省委领导和以吴焕先、徐海东为首的红二十五军领导班子，在政治上已经逐步成熟起来，领导是坚强的，得力的；在军事上是有指挥才能的，能从战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切合实际、具有自己特点的战略战术，在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围剿”下，歼灭了大量敌人。这不能说是不懂行的班子。

四、该书写到：“周打算派程子华去领导二十五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并写到：程子华“于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接管了二十五军”（1986年1月31日《参考消息》、《长征》第337页）。这样写是不妥当的。1934年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鄂豫皖省委的要求，派

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做军事工作。长征前夕，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在讨论红二十五军领导成员的时候，认为程子华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又在中央红军大学学习过，对外部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决定由程子华担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决定程子华担任军长，反映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对党中央和中央派来的干部的信任和尊重，不存在所谓“接管二十五军”的问题。

五、《长征》第61页写到：“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红二十五军转移到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样表述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不确切的。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决策经过，实际情况是：1934年初，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成仿吾代表鄂豫皖省委所作的汇报；1月下旬，“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向中央提出了鄂豫皖红军转移到桐柏山的建议；3月下旬，省委接到了中央转发的这个建议；4月下旬，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苏区，改向原根据地的边沿，恢复和开辟根据地；中央在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对省委的建议表示“目前原则同意”。按照中央的批示，进行恢复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实践使省委认识到上述建议的方案行不通，红二十五军只有转移才有出路。但是，由于不了解根据地以外的情况，省委一时又下不了决心。当程子华带来周恩来副主席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后，使省委坚定



了决心，立即定下战略转移的决策并作了安排。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并经省委花山寨会议讨论决定的，而不是作者所写的那样。

六、《长征》第61页还写到：“程子华率领二千九百人出发了”，“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里没有提省委，没有提吴焕先、徐海东。这种表述是不全面的。红二十五军长征，自始至终是在省委领导下和以政治委员吴焕先为首的军首长指挥下进行的。许多重大决策，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省委独立自主地作出的。从挺进陕南，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到西进甘肃，北上陕北，留下鄂豫陕特委领导红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都反映了省委对红二十五军领导的集体力量和智慧。这是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所公认的。

七、该书中写到，程子华、徐海东途中负伤以后，就一直坐着担架到陕北（《长征》第337页）。这个写法也有出入。1934年12月，程子华、徐海东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都负了重伤。此后，他们坐着担架行军。徐海东的伤仅3个月就基本痊愈，丢掉了担架，亲自参加指挥了一些重大战斗。书中写的徐海东在担架上接任军长、军团长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八、《长征》一书在评述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时，把红二十五军扯了进去，这是不公正的。关于陕北错误肃反问题，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和1983年中央转发的《五

人小组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已有明确结论，红二十五军的个别同志在这一事件中是有责任的，但不能说成是红二十五军整体，这与红二十五军的广大指战员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指出《长征》一书中有关红二十五军部分史实的漏失或舛误，并不是抹煞作者的功绩。正如作者所说：“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我们深信，作者的这个愿望是能够实现的。我们殷切期望再版时的《长征》，在现有的基础上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的史实。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七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